

# 邓力群文集

第三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 邓力群文集

第三卷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力群文集 第3卷/邓力群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12

ISBN 7-80092-736-9 (精)

ISBN 7-80092-737-7 (平)

I. 邓… II. 邓… III. 邓力群-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445 号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446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北京顺义向阳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25.25 印张 2 插页 238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精装定价:41.30 元

平装定价:35.90 元

## 目 录

- 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 (1)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
- 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 …………… (14)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结合起来 …………… (28)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
- 党委集体领导和厂长(经理)行政指挥的  
关系问题 …………… (50)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 人民在看共产党员的行动 …………… (53)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 功不在禹下 …………… (60)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 现在是青年人多作贡献的时代 ..... (66)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 江西老区调查报告 ..... (72)  
(一九八六年六、七月)
- 为促进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多做实事 ..... (82)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 关于企业党委工作的几个问题 ..... (88)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
- 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编辑人员  
的谈话 ..... (96)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 人民教师的光荣 ..... (111)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 领导干部不学理论是不够格的 ..... (119)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 附录：邓力群同志在湖南长岭炼油厂视察** ..... (122)
- 湖南老区情况调查 ..... (129)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下旬)
- 关于开展文明生产、文明经商、文明消费等  
问题的意见 ..... (135)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 (138)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145)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说资本主义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没事”  
这种说法对吗？…………… (174)  
(一九八七年四月上旬)
- 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80)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 党政职能分开，党要管好党…………… (184)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
-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表述历史…………… (189)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
- 决不可低估或忽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 (195)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 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编写工作总结会上  
的讲话…………… (204)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 (220)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 理论准备和实际锻炼二者不可缺一…………… (230)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
- 依靠集体，依靠党组织，依靠工人阶级，  
依靠人民群众…………… (247)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九日)
- 一次可贵的尝试…………… (265)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一日)
- 序《她的中国心》…………… (269)  
(一九九〇年九月)

- 注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271)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
- 关于编写《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的几点建议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 …………… (278)
- 在北方地区城郊经济研讨会上的讲话…………… (296)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305)  
(一九九一年六月)
- 记住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两句话…………… (321)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
- 调查必须真实…………… (328)  
(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
- 反“和平演变”三论…………… (331)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 要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345)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  
主动权…………… (351)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 关于“毛泽东热”…………… (358)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 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 (369)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

- 
- 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 (378)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谈谈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实基础…………… (391)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

---

---

# 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 政策的基础\*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

全党正在学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文件。文件包括两部分：一是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和人事安排的决定，二是五位中央常委的讲话。文件提出和解决的都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意义极为深远。我们要通过认真学习文件，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持进行改革，推动国民经济继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以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团结奋斗，再展宏图。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不到七年的时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两件事的顺利发展和巨大成功，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大、很好的变化。这一点不仅国内的人民看清了，

---

\* 本文是由邓力群同志同《红旗》杂志编辑部共同起草、用评论员名义发表的。

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

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

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们常说，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2】

邓小平同志的这两段话，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是理解、掌握党代表会议文件丰富内容的一把钥匙。我们应当认真领会、反复思索。抓住这个要点，学习就可以提纲挈领，就可以提神。

两段话概括地指明了我们的内外政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这就是：内外政策的基础是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完整不可分割的、决定我们国家性质和前途

的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建设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我们党制定和执行各项内外政策，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为前提的。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所遵循的基本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因此，需要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我们的四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我们各方面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经济改革来说，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3】党中央反复提醒全党，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下开展的。吸收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举办合资、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是把它们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有益的、必要的补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各项政策得以制定和贯彻执行 的保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这两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纠正了过去的错误。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它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已经纠正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同时也指出，剥削阶级虽然消灭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它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专政职能，必须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主义的严重犯罪活动。决不可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谈民主，搞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我们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样必然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四个现代化事业造成严重破坏。

我们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都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进步的要求。领导中国人民争得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是共产党；在十亿人口的大国开辟按照自己的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是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领导全面改革，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国出现了今天这样欣欣向荣的局面。没有党的领



导,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坚持党的领导包括改善党的领导,这方面有丰富的内容。恢复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整党,采取梯队形式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等等,都使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尽管目前在党风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还是一个必须努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党几年来在这些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成效,是人民看得见的。以任何借口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都是违反历史发展要求的,是十亿人民不能允许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的指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共产主义。在长期奋斗中,在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理想一直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有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从而有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没有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的道德,我们不可能取得过去的胜利,更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过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些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也就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同志讲,这是我们最根本的经验和原则。我们在农村的改革,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对外开

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都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提出的。就是说，我们不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实践中变化着的新问题，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来制定、丰富和发展各项对内对外政策。我们的政策是统一的、连贯的。正是因为贯彻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我们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从而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大好形势。

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在执行、宣传和理解党的政策时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的同志有时在这个问题上，有的同志有时在另一个问题上，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偏差，原因往往就在于没有把各项政策同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础的关系搞清楚。人们常讲，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存在着互相脱节的“两张皮”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有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还没有自觉地运用四项基本原则来指导具体政策的执行，或者说还不能自觉地、经常地考虑怎样通过执行具体政策来保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现，往往就业务论业务，就政策讲政策，忽略了它们是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作

基础的。另一方面，我们有些做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宣传工作的同志，则不能有说服力地说明各项政策怎样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各项政策的执行又怎样体现和保证四项基本原则的实现，而是就业务宣传业务，或者脱离开现实斗争任务就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讲一些空泛的道路。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现象：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现行政策互相脱节，而不是紧密结合。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有的同志也许会说，既然各项内外政策是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基础的，那末只要执行政策，自然也就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两者的联系有什么必要呢？这里的问题，是怎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政策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正因为我们党在各方面采取的政策，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当前历史条件下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正因为执行政策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就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因此，就更有必要让我们的干部深刻理解并牢牢记住各项政策的基础和前提是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对党的各项政策才能有统一的完整的理解，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不至于在执行一项政策时，忘记或者违背另一项政策。这样，对党的各项政策，才能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坚定性，不至于在受到干扰时摇摇摆摆，忽“左”忽右；也不至于在执行中对政策产生曲解，或强调过头，或束手束脚，从而尽量避免片面性和失误。这样，对党的政策在实践中随着情况变化所作的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才能正确理解，既看到它们的变

化及其根据,又看到它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上的一贯性。毛泽东同志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总路线、总政策和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政策的关系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sup>【4】</sup>这段话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具体政策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的关系是适用的;对于我们认识执行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解决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两张皮”的问题,固然需要从事各项业务工作的同志和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但应当说,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在这里负有更大的责任,更需要作出努力。我们常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这主要就是指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工作中得到贯彻和体现,从而保证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使它避免走到邪路上去,取得应有的成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是空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是不行的,必须把四项基本原则的丰富内容和经济工作的实践真正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真正贯彻到各部门、各

单位执行内外政策的过程中,使它们成为指导干部、群众行动和辨别是非的准则,成为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样,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对经济工作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才不会迷失方向,而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不脱离实际,真正起到“生命线”和“保证”的作用。当然,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宣传工作也不可能对经济工作中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作出回答。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和执行政策的实践相结合,其重点应当是研究和阐明在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如何才能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更好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改革经济体制的僵化模式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系,坚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和有计划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的关系,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关系,分配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和防止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政治生活的关系,等等。理论宣传工作要研究、回答在处理这些重要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思想政治工作要保证在处理这些关系时,服从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总的要求。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政策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误解:好像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而讲执行现行政策是反“左”。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们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既反对“左”的错误,又反对右的倾向的。试想:如果不拨乱反正,不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

误,怎么可能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当然,如果不反对右的倾向,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可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过程中,既会有来自“左”的干扰,也会有来自右的干扰。同样,贯彻执行内外政策也会遇到“左”的或右的干扰,这实质上也是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干扰。因为贯彻执行内外政策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紧密结合的、统一的。这一点,《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讲得很清楚:“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5】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说过:“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思。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6】邓小平同志这些意见,在今天仍然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一方面确实还有“左”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右的错误倾向,例如,有些人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倾向虽然形式不同,但是,都表现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方针政策的背离,而且有时还互相结合、互相呼应或互相转化。“左”的错误往往

给右的倾向提供攻击、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政策的把柄，而右的错误也往往给“左”的倾向提供这样的把柄。无论是防“左”反“左”或防右反右，都要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不是“左”或右的问题就不要硬扯到“左”或右上去。也不要以“左”反右，或者以右反“左”。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正确地宣传和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左”右两种错误倾向。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和部分调整党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决定，中央五位常委的讲话，都充分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当前实际的紧密结合。我们学习党代表会议文件，首先要领会好这个精神。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所谓连续性，其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贯彻执行各项现行政策。我们要按照“四化”的方针选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四化”，第一位的是革命化。而怎样看是不是革命化呢？主要就是看在实际行动中，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首先表现出干部的“德”，同时也表现出干部的“才”，即看他能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执行各项政策结合得很好。

关于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体现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七五”计划的指导方针，把改革放在首位。改革，沿着什么方向去改呢？中央明确指出：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切改革都是为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根本原则。我们在学习“七五”计划的建议时,首先也要认真领会这个精神。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基础和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当然,实践在发展,客观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一方面,在制定和贯彻执行某项政策的时候,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一定领域中一定时期实际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我们的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检验以及补充、修正各项政策,从而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始终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 注 释

- 【1】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1页。
- 【2】 同上书，第146页。
- 【3】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2页。
- 【4】 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316页。



- 
- 【5】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第 1 版，第 320 页。
- 【6】 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2 版，第 379 页。

# 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 几个问题\*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这次会议是要交流搞好形势政策教育和理想纪律教育的经验,探讨怎样贯彻执行党代表会议精神,加强和改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志们的发言给了我很多启发。我的发言,只供同志们参考。

##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sup>【1】</sup>这里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也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势。在我们党领导的经济、政治、思想这三条战线上都出现好的形势,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种共同努力,当然包括全体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说,这些年,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企业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这都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在这些任务的实现过程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七年来，党总结过去的经验，重申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根据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制定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党同志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而使我们的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成绩越来越大。事实证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一支经受住了考验、得到党和人民信赖的好队伍。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志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不断总结经验，进行新的创造，使得各条战线上的思想政治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次会，就是对于我们过去工作的一次回顾。在座谈会准备过程中，各省、市、自治区送来一百多篇工作经验的介绍或总结。这一百多篇，各有特色，反映出各方面都已经有了日益成熟的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个会也是百花齐放。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说根深叶茂。好花还须绿叶扶，没有广泛的工作基础，这些花是放不出来的。在座的同志，如果把本地区、本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情况，把这次会上提供的情况，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做一个比较，我想谁都可以看出，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用说内容，就是连方法、语言、提法，也准确、生动、丰富得多了。

小平同志肯定我们在建设精神文明上做了不少工作，同时又说：“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2】陈云同志在党代会的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现象，然后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同我们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应引为教训”【3】。这些批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对于我们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有的同志或许会发生一个疑问：既然这样，是不是说在好形势的形成和发展中，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起作用呢？我想不能这样理解。

同经济战线情况一样，思想战线、思想工作在前进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发生了一些毛病。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十二大文件以及新宪法的学习和贯彻，十二届二中全会整党决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学习和贯彻，大家都感到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干起来比较顺心。后来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不健康出版物、淫秽录像带的泛滥，低级趣味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的出现，农村封建迷信、赌博、盗窃、宗族活动的增加，意识形态领域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对党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相互关系的侵蚀，等等。这正像同志们说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确正在腐蚀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

党代表会上常委同志的讲话，总结了我们以往的各项工 作，其中也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严肃

地、郑重地提出了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发挥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维护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权威，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代会的精神，五位常委的讲话，加重了我们的任务，提高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和所有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庄严职责，认真学习党代会文件，奋发工作，克服缺点，发扬成绩，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 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

这个问题，党的十二大报告已经从理论上、原则上做了正确的、完整的阐述，建议同志们研究、讨论、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的时候，经常地重温十二大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不断地加深和提高认识。

陈云同志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阐述了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包含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也不可能先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再来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现在确有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而且相当普遍。他强调指出，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者是统一体，这是我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有一种观点认为，物质文明建设好了，精神文明就会自然而然地上去。事实越来越证明，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是从旧中国变过来的。我们这些人头脑中有旧社会的影

响,年轻一代也会多少接受这种影响。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作风一定要涌进来,不能不对一些人发生影响。在思想领域,不是受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支配,就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这一两年来的很多事实,再一次地提醒我们,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加深认识。例如,我们主张勤劳致富,守法致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分步骤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不在农民中间、工人中间反复地、切实地进行思想教育,只是讲一个万元户,讲一个恭喜发财,讲一个吃喝玩乐,会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还有一种看法是,少搞一点精神文明建设,可以集中力量把物质文明搞上去。经验也证明,如果不同时搞精神文明建设,势必反过来妨碍、损害物质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物质文明的建设才能获得巨大的精神动力。天津的同志说,他们那里有四句话: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任务一起下,两副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这四句话很好,有普遍意义。经过这样的工作,要争取逐步做到,户是双文明户,家庭是双文明家庭,企业是双文明企业,单位是双文明单位,地区是双文明地区,整个国家是双文明的国家。同志们说,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恩格斯关于建设全新的社会、培养全新的人的预言。

在党代表会议上关于“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专门论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问题,指出:“七五”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

的计划。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其他腐朽思想的侵蚀；要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四有”教育，在经济领域中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抵制各种歪门邪道和腐朽的经营作风。李先念同志在党代会闭幕词中也指出，那些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左”的思想影响，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影响，必须继续克服。同时，一定要加强“四有”教育，抵制和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抵制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抵制和反对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思想的影响。党代会以后，中央书记处正在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为起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进行酝酿和准备。

我想特别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间，尤其是企业、基层单位，首先要想到我们的后代。过去为儿童少年做了不少事，但是还很不够。我们革命是为了后代。要首先想到孩子们，多给他们做些好事，使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能够品学兼优。应该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像学前教育，孩子们的营养、保健、卫生、娱乐活动、智力开发，合格幼儿教师和保育人员的培养、提高，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各级各类合格师资的培养和提高等等。另外就是为老职工、老干部、老年人多做点事。现在许多地方反映，五十多岁的人，不能提拔了，摆在一边算了。这件事很值得引起各级重视。其实五十多岁不仅不能算老，而且经验丰富、精力旺盛，“五十而知天命”，处理问题的能力比较成熟，正是为党奋发工作的时

候。对老职工、老干部不在政治上、生活上、工作上做适当安排,会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对第一线的同志也有影响。老干部的今天,就是中青年干部的明天。要尊重老同志,尊重老职工。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们社会里,对待少年儿童,对待老同志,一定要很好照顾,一定要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做好。

### 三、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是搞好党风的决定性环节

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注意这个问题。这里想先对中青年同志讲几句话。

小平同志讲:“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4】陈云同志讲:“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5】早在一九八〇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就说,老同志第一位的庄严职责,就是选拔中青年同志接班,其他工作少做一点不算错误,如果这件事做不好,要犯历史性的错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特别是这一次党代会,我们顺利地实行了新老交替、新老合作。香港一家报纸讲,我们是老年人掌舵,中青年划桨。大批合乎“四化”条件的中青年干部进入各级领导岗位,大批老同志自觉自愿从第一线退下来,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老同志懂得,共产主义事业不是靠一代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靠几代人继续不断艰苦奋斗才能够实现。中青年同志把老同志的共产主义精神继承下来,就可以保证我们革命的火炬一代一



代地传下去。

新上来的同志，应该全心全意地把班接好，把工作搞好，把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扬起来，不应该贪图享受。有极少数中青年同志上来以后，不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的英勇精神的班，而是去做相反的事。比如坐汽车，就要新人新车。有了权的同志怎么用权？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用权为人民、为党、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是用权为自己谋私利？这对大批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希望大家都能经得住这个考验。老同志要关心和帮助新接班的中青年同志，但不要当太上皇，不应干涉新班子的日常工作。新同志如果经验不够，碰点钉子，只要没有私心，两年三年以后，就可以逐渐趋于成熟。可是，对于新上来的同志走正路还是不走正路，是不是以权谋私，老同志就要瞪着眼睛看，看了以后就提，提了不能解决就往上报告。当然，要把事情搞得实实在在。这个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中青年同志接好班，健康成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做出贡献。

我们要提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身的精神。青年人要有献身精神，党员干部首先要有献身精神。王鹤寿同志说，严重的不正之风，概括起来讲，就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违法乱纪，官僚主义。认识上有错误，在工作中造成损失，说清楚了，容易改正，人民也会谅解。官僚主义问题比较复杂，其中还有体制、机构方面的原因。经过探索、改革，自己改正了错误，群众也容易谅解。群众最不满意的、最不能谅解的，就是有些党员干部，包括极少数老干部和中青年干

部，为了私利往钱眼儿里头钻。发展商品经济，批评“一切向钱看”，是否有矛盾呢？彭真同志讲得好，我们还要发展商品经济，不能搞自然经济，只要奉公守法，不是为了个人捞钱去经商，即使出点毛病，也好纠正。党员干部，不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想人民，不想国家，只想自己多捞钱，能说这是没有经验、是认识错误？封建社会里，岳飞还讲，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则天下太平。封建社会的清官，虽然是地主阶级政治家，至今还在人民心里留下好印象。有一个故事讲，清代嘉庆年间一个管铸造钱币的官，看到皇帝太不像话，就告老还乡。有人告发，说他临走时用马车运走一万吊钱。皇帝派宦官去查，结果是一车书，没有钱。问他皇帝赏的钱哪里去了，他说都买了书，准备回去做教书先生。不管这个故事的真伪如何，但封建时代确实有这样的官吏。我们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己任，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展商品经济，有的共产党员为了私利就一个劲儿往钱眼儿里钻，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能说得过去吗？毛泽东同志谈到学习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时有段名言，号召我们的同志不管能力大小，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名言忘记了。新提起来的中青年干部，四五十岁，也不过再干十几年。这十几年，应当争分夺秒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一个劲儿钻钱眼儿，违法乱纪，结果无非是群众检举，从领导

岗位上拉下来，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的党员干部，包括老干部和中青年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极少数不好，极少数老干部没有出息，极少数中青年干部也不太高明。如果老干部不以身作则，不关心党风党纪，不发挥监督作用，相反，一心一意钻钱眼儿，为自己和儿女谋权谋利，还谈什么保持晚节！钻钱眼儿的中青年干部，即使今年上去了，如果坚持不改，几年以后也一定要垮下来。对于为了私利不择手段拼命钻钱眼儿的人，不论是老干部还是中青年干部，确有证据，就要发现一个，揭露一个，处理一个，使这种人不能在我们队伍里存身。做到这一点，要靠教育和纪律，要靠党员干部相互进行监督，要靠党员同志进行监督，要靠人民群众进行监督。陈云同志提出，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严肃党纪、政纪。这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所有党员、党员干部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才能起作用、才能发挥自己的巨大威力呢？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做思想工作的同志要严于律己，正人先正己。要求群众做到的，党员先做到；要求群众不做的，党员先不做；要求下级做到的，上级先做到；要求下级不做的，上级先不做。只要这样，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取得下级的信任，你的话才有人听。

每一个共产党员，首先要做到或者说起码要做到符合党章对党员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7】

在党章的这些规定面前，所有的共产党员，不论是一般党员还是党员干部或者高级干部，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违反这些规定，成为“特殊党员”。同志们反映，现在谋求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以外私利和特权的情况相当严重，随便有点什么权都可以谋私。营业员可以谋私，民警可以谋私，还有什么电霸、房霸、油霸、票霸等等。党员真正符合党章要求了，这些问题容易解决。而要党员按党章办事，党员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就必须首先按党章办事。党员干部、领导干部带好这个头，以身作则，所有党员都严格要求自己，党风好转了，社会风气方面的问题也好办。否则，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要发生问题。

#### **四、各级行政领导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第二汽车厂厂长在大会上有一个很好的发言。这个发言强调，行政领导在做业务工作的同时，都要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二汽的老书记对我们说，他们的办法就是四句话：党政工团，围绕中心，发挥特色，积极配合。他们的经验值得各地同志重视。其他企业也有这方面的好经验，希望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就企业说，厂长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至少要注意以下

三个方面：一、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下进行。在党委讨论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厂长要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党委做出统一安排以后，厂长应该首先承担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二、厂长进行生产经营方面的行政上的统一指挥和领导。无论计划管理、资金管理、物资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等方面，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行政领导不能只抓业务。人是有思想的，人做任何工作、从事任何业务，不是受这种思想指导，就是受那种思想指导。业务工作要做好，需要正确的思想政治工作。三、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都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都要有一定的经费。党委做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安排以后，行政领导要从人、财、物方面提供保证，积极支持。有些事情做不到，在讨论的时候应该如实说明，能够做到的，就坚决去做。行政领导要见物，更要见人。几十年革命战争，我们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局部胜利到全国胜利，落后装备的革命军队打败了有先进装备的敌人。靠什么？主要是靠人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的革命队伍是党领导的，有革命的思想 and 为人民献身的精神。像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说的：“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8】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原理没有过时。我们相当一些技术、设备比资本主义国家

落后，要赶上去，重要方法之一是引进。但是，引进以后的掌握、运用和改造，还要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要靠我们的职工、干部、技术人员发挥主人翁精神。调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有物质利益，也要有思想教育。中央早就提出过，精神鼓励、物质鼓励要以精神鼓励为主。我们要接近、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归根到底，真正优势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在于理想和纪律。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发挥真正的优势，并不仅仅是党委、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事情。在这方面，行政领导承担着重要的、不可代替的责任。

二汽的厂长强调，党委的作用首先是监督，要把监督放在第一位。有监督，判明是非，才谈得上保证。行政领导要主动接受党委的监督，积极争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这样一种提法，这样一种做法，是很可取的。监督也好，保证也好，目的都是为了使四项基本原则，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每个企业、每个单位正确地贯彻执行。这联系到厂长究竟代表谁，是代表国家还是只代表企业、代表职工。照理说，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时确有矛盾。有些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领导人，往往只代表企业、职工，忘掉了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汽的厂长讲，理所当然地应该代表国家，代表国家是第一位的。企业是全民所有制，国家委托厂长管理这个企业，他应该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履行这种委托。只有代表国家，才说得上代表企业、代表职工。职工、企业、国家之间在有些问题上发生了

矛盾，只有首先维护国家利益，才能够正确地解决矛盾。他们的意见，他们的道理，请大家研究。

## 注 释

- 【1】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1页。
- 【2】 同上书，第143页。
- 【3】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52页。
- 【4】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 【5】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52页。
- 【6】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0页。
- 【7】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90页。
- 【8】 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11页。

# 把思想政治工作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结合起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

## 一、研究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形式的情况，应该成为经常性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在贯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在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社会的经济形式、经营形式，同过去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现在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等多种经济形式。此外，还有若干中间状态的、过渡的经济形式。每种经济形式内部，又有各种各样的经营形式。这方面的基本情况，我们有些是清楚的，有些并不怎么清楚。比如，这几年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比过去大多了，但其中包括一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次年会上的讲话。



些什么样的经济形式、经营形式?我们对此缺乏系统的调查研究。

乡镇企业中雇工的情况很复杂。个体经济的雇工,在政策上有一个数额的限制,允许请七个以内的帮工或徒弟。现在超过这个限制的很多,即使是限额之内的,也不能一概而论。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不同行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和差的、雇主参加劳动和不参加劳动的,情况都不一样。雇工就是雇工,不好说不是雇工。但是,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优势情况下出现的雇工,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雇工,又不同于旧中国的雇工。从农村来说,一方面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某些占有较多生产资料善于经营的人或能工巧匠又缺少劳动力。出现剩余劳动力,不是因为丧失生产资料,除两手之外一无所有,除了出卖劳动力便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维持生活,而是承包人的土地不够他干,有空闲时间或者是他想出去通过干活学一门手艺、学一门技术,或者是想多挣点钱,或者是本地生产条件差,想到一个经济条件好、报酬高的地方去干,等等。北京有不少外地姑娘当保姆,就是想挣嫁妆。我遇到一位姑娘,她说她喜欢音乐,出来当保姆,除了挣钱买一套嫁妆,还想学弹钢琴。她后来果然在一位搞音乐的同志家中当保姆,如愿以偿。现在的雇工,许多人在农村有他们生产和生活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退路。雇主对雇工,政治上不能歧视,物质待遇也不能太苛刻。否则,他就不干了。这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劳动者因为一无所有而具有的那种

“自由”，绝对不可以同日而语。

随着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一九八二年，中央曾经指出，对于超过规定限额雇工的情况，看二三年再说。所谓看，还是承认存在雇工，另一个意思就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可惜，二三年很快过去了，我们的调查研究做得很不够。今年以来，有些地方已经在做这些事，陆续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开始进行整理和分析，初步提出了一些看法。希望把这件工作继续坚持下去，进行全面、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在认识上和政策上处理好这方面的复杂问题。

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经营，目前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甚小，以后还要发展。它们的经营情况多数是好的，对我们引进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开拓市场、促进现代化的建设都有好处。但其中已经发生一些另外的情况，值得注意。比如中外合资企业，外方当董事长或经理，把企业所有的账目都带到香港。你想知道生产和经营情况，他说好吧，请你到香港去查。我们想通过这种形式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及经营管理水平，增加出口能力。人家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不愿意在国际上增加一个和他们竞争的强有力对手，要用产品的大部分占领我们的国内市场。外商独资经营，我们也很欢迎。但是，有的外商口口声声说拿资金支持我们建设，实际上要从我们的银行借钱，作为他们的投资。

经济形式、经营形式方面的变化，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执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过程中，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这些变化,就谈不上今天的好形势。这一点,我们的人民看得很清楚,而且得到国际上的公认。我们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坚持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好形势。

我们是在探索中前进的,各种改革不可能一下子完全配套。重大政策是明确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若干具体规定、包括带政策性的规定,要在所有环节上相互配套、前后衔接,显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清楚的认识。有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也还需要针对新问题制定一些新政策。去年第四季度以来,经济生活中就相继发生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基建规模过大,速度过快,造成原材料供应不足,能源、交通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抢钢材,结果出厂一个价,几经倒手,价格就提高几倍。这里,就容易发生行贿受贿、投机倒把一类事,给一些干不好事情的人以可乘之机。今年二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集中力量,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解决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和消费资金增长过猛、部分物价上涨过多、国家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已经取得显著效果。

研究多种经济形式、经营形式的合理配置,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要考虑怎样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

怎样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在多种经济形式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巩固和发展，是保障劳动者集体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和保障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的决定性条件。党的十二大提出，在农村，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要继续完善。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营管理能力的提高，农民必然会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提出各种新的联合经营的要求，并采用先进生产措施。形式多样的和更加完善的合作经济，正在产生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设想，把小型的国营企业、国营零售商业，租赁、承包、转让给集体或个人。实践的结果怎么样呢？有的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一个看法，认为承包给集体比较妥当，承包给个人以后毛病比较多。我们必须鼓励城乡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但是，小平同志多次指出，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样一个基本性质的问题上，应该有明确的看法。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生产发展不平衡，国家的财力、物力要集中于进行重点建设。人民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生活要求，一些产值小、品种繁杂的日用品的生产和销售，甚至某些大生产需要的零部件的生产，都由国家包下来，是很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当长时间里我们都需要个体经济的存在和适当发展。问题在于，个体经济的发展程度、经营范围怎样才算适当。此外，还有经营办法问题、管理方法

问题。已经有同志提出,应该对个体经济的收入进行必要的调节,而且要求采取措施限制不法经营。对于个体经济,要有一个分析的态度。许多材料证明,其中确实存在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私人经济。对个体经济、私人经济,都要加强管理。前几年,我们曾经规定个体经济和新办的集体企业免税。这在当时是必要的。现在已经确定征收所得税。这里就发生了起征点和累进率的问题。不同的情况,应该有不同的起征点和累进率。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这样的规定,资本主义国家有这样的法律。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有的高达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许多同志认为,在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在这方面做出恰当的规定,在竞争中,国营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不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地位。

中外合资,性质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外商独资经营,属于国家可以监督的资本主义性质。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我们要进一步改善甚至创造外商投资的环境,同时要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对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我们合作或者独家投资的外商,我们从来是欢迎的。和外商打交道,我们经验不足。我们要学习他们的长处、吸收他们的资金,用于四化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吃点亏。不过吃亏要吃在明处,而且不能总吃亏,吃大亏。比如我们迫切需要引进一项技术设备,否则就会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应该咬紧牙关承受代价。从长远说,这是不吃亏的。苏联建国初期列宁曾经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历史经

验值得我们参考。

发展商品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几年来,由于中央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一方面,边远、穷困地区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出现了为卖而买的商品经济,但不少家庭承包的经营单位还是为买而卖,带有小商品经济的性质。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广阔天地。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范围内,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个体的、私人的、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经营的商品经济,都要发展。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正像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要大力发展。在我们社会里,几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存在着。在我们市场上,几种不同身份的商品生产者、商品经营者活动着。应该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主体,并且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而不至于削弱、更不至于取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体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把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归之于发展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有个问题要和同志们讨论。

有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一个概念,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另一个概念。我认为这样的区分有道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允许多种经济形

式存在和发展，其中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外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都属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很多同志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研究我国社会发展的宏观上的这个战略、那个战略。这种研究是必要的和有成就的。彭真同志说得好，最大的、最重要的宏观是理论问题。我很赞成彭真同志这个意见。在理论上不清楚，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怎么进行研究呢？我们思想战线的同志，需要研究的头等战略问题，就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形式的发展及其合理配置问题。怎样才合理？首先要进行切切实实的、周密系统的和全面的调查。有了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以至全国情况的真正了解，才能对“七五”、“八五”甚至“九五”计划期间的合理配置，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经常注意和深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成为思想战线同志们的工作的第一位的工作，也应该成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工作的第一位的工作。

## 二、关于多种经济规律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当前，我国多种经济规律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即经济规律体系问题，已经引起理论界的注意。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深入的研究需要专家学者去做，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说，我认为必须明确以下几个要点：（一）我们社会里存在多种经济形式，各种经济形式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二）这些经济规律相互交错、彼此影响和发生作用；

(三)每种经济形式内部不只是一种规律而是多种规律同时在起作用，它们也相互影响和发生作用。

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是一项长期的方针。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不同经济形式的发展，既有共同的规律，又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自己的规律，个体经济有自己的规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自己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尽管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它们仍然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这些经济规律，都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着作用。各种经济形式自觉或不自觉都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它们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一面。这就有一个各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问题。就是说，各种经济形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各占多大比重，以及它们的经营规模、活动范围和相互制约关系等等，都要通过我们制定的政策加以规定。这种配置和政策，还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就得了解这些不同经济形式的运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和当前发展的实际情形。

每一种经济形式内部，也是多种经济规律同时在起作用，并不是只有一种规律在起作用。例如，就全民所有制经济来说，价值规律起作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起作用，物质利益规律起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起作用。在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范围之内，这些规律有它固有的联



系和运行法则。

经济规律往往具有复杂的表现形式，有时是从不同的方向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恩格斯说过，经济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和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相互交错在一起，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1】。列宁也指出：“规律的概念是人对于世界过程的统一和联系、相互依赖和整体性的认识的一个阶段。”【2】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不同经济形式的不同发展规律，以及在每一种经济形式中同时起作用的诸规律，构成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体系。经济发展不是由某一个经济规律而是由经济规律体系的合力所决定的，或者像恩格斯所比喻的，是力的平行四边形。因此，我们讲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不是孤立地认识和运用某一个经济规律，而是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体系。这是用系统论原则来观察社会经济生活和认识经济规律的必然结论。当然，从人的认识过程来说，对各个经济规律分别地加以考察也是必要的，这是人们认识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对各个经济规律的一个一个的孤立的研究上。这是因为，孤立地考察一个一个的经济规律，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完整概念，有时甚至会导致片面性的错误。例如，近几年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并且通过一系列政策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然自觉地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特

别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在充分估计价值规律的作用的同时，又不能只看到一个价值规律，在自己的视野中排除其他规律。如果抛开有计划按比例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其他经济规律，仅仅在价值规律的范围内孤立地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就不能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就有可能陷入片面性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是有必要周密考虑的。

对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的认识，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从目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来说，需要存在多种经济形式，需要多种性质的商品经济都得到发展。但是，既然社会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各种经济规律同时在发生作用，那末，我们就不能听任各种性质的商品经济自发地发展，在政策上无所作为。有的同志做了一个形象化的说明：发展商品经济好比一个大运动场，运动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比赛项目，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员。要使比赛能够正常进行，就要制定若干规则。还可以把我们发展商品经济比做一个大舞台，登上这个舞台演出的，有各种身份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有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经济，有小商品经济，也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演员各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技巧。显而易见，这场演出也得有点规矩，不能谁想怎么演就怎么演；如果没有规矩，舞台就混乱不堪了。为了更好地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必要运用关于经济规律体系的思想，为不同性质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制定出行为规范。每

个企业，作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法人，都需要有自己的行为规范。不仅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要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其他性质的商品经济也需要一定的行为规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还需要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它们也不能没有自己的行为规范。这就需要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来加以规定：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上，它们各自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只有这样，才能用计划性去限制盲目性。在这方面，我们并非没有成功的经验。近几年来，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像全民所有制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调整物价，工资改革以及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进行新老干部的交替，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且积累了经验。当然，各种改革的衔接，具体政策的配套，需要一个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只有在进一步改革中，通过改革来求得解决，而决不能够回到老路上去。

研究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通过这种学习，可以使我们了解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济规律的来龙去脉，掌握研究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面临的经济形式、经济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并不完全相同。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

于雇工问题、私人资本主义问题有很多精辟的论述,重温这些论述,会给我们很大启示。但是,我们又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判断我们今天遇到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情况下出现的雇工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遇到的这些现象,和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现象,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搞清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确定正确的政策,就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不能认为,研究多种经济形式、经济规律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只是经济学家的事情,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无关。对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了解得够不够,是不是有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看法,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大有关系。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有责任关心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我们自己的认识才能提高,我们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和进行宣传,才能比较全面和以理服人。

### 三、分配问题

分配问题涉及的面很宽,情况和问题都很复杂。这是目前我们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中间的一个大问题。讲分配,不仅是消费品的分配,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怎么样从分配的角度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就是一个大问题。又如,扩权以后,企业税后留利的部分,作为生产发展基金用于扩大再生产。采取这种办法增加的生产资料,应该归国家所有还是归企业所有?

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界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有各种主张。还有的同志提出，在国营企业中间，允许自费入股、分红，逐渐地使国营企业变成合股公司，成立董事会。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这个原理过时了没有？我们认为没有过时，还要坚持。坚持这个原理，涉及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包括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包括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分配，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分配，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分配。现在计划外收入增长很快，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超过计划内的收入。那末，这部分计划外的收入该怎么处理，也是很复杂的问题。

就消费品分配来讲，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平均主义。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讲到在职工中间、在劳动者和经营者之间、在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要拉开工资差距。这是正确的。但这种差距拉开多大适宜，就需要认真研究。据说有的企业发奖金，干部超过职工四十五倍。这样拉开差距，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各行各业的差距、城乡的差距、工人和农民的差距。这类的矛盾实际上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总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各地区的不平衡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家要支持穷困落后的地区。问题在于，在一个地区内，少数人很富裕，多数人富裕的程度和他们相距很远，如果不采取某些政策加以调节，就不利于安定

团结，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一个部门，一个行业，一个单位，一个企业，都是如此。城乡个体户，过去免税，现在要实行累进所得税。这就是进行调节。国家对于经济的管理，要从直接控制为主逐渐转到以间接控制为主，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去调节。也就是要通过价格、税收、信贷、汇率，以及工资、奖金等手段去调节社会生产、交换和分配。

同志们提出，我们一定要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是，仅仅靠钱能不能调动这种积极性？上海有个材料，很值得引起我们深思。这个材料，讲一个基层工程队长的切身经历，概括起来四个字：甜酸苦辣。他说，前个时期社会上刮“一切向钱看”的风，自己也受到了影响，认为改革就是承包，就要使工人多拿钞票。现在工人讲“实惠”，合同一订，任务“攒”下去，生产自然就会上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搞经济手段上，还当众宣布：“哪个包工队奖金收入高，就说明哪个包工队长水平高。”一时间，似乎工作很顺手，他心里感到“甜滋滋”的。可是好景不长。一些包工队长为了争高奖金，不是在完成任务上下功夫，而是整天围着这位工程队长转，讨价还价。这时，他开始感到有些“吃酸”。一些班组讨价还价没能达到目的时，干脆不接受任务，使他开始尝到“苦果”。靠钱来管生产，一些职工的“胃口”愈吊愈大。有的人听到外面有些个体户一个月可赚几千元、上万元的钱，就见异思迁，跃跃欲试。为了稳定“军心”，队长表示，人均奖金水平将达到六百元以上，并把

“以上”两个字讲得特别响，意思是还不止这个数字。但是，职工却说“奖金太少”，“没劲”，生产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这位队长只得叹息：想不到发放奖金竟成了“棘手”（有些人往往把“棘手”误说成“辣手”）的事情。这位队长回顾这一段过程，深有体会地说：讲钞票的声音响了，就必然会使讲贡献、讲风格、讲大局的声音低了。光靠奖金刺激搞不好生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丢，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松，还是要两个文明一起抓。

有的同志反映，有些企业职工看到个体户在不长的时间富起来了，甚至赚了大钱，感到自己受了委屈，情绪受到影响。有人说，“国家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个别职工甚至见异思迁，想去搞个体户，即所谓“要想富，离开工厂找出路”。企业职工什么时候成为万元户，成为思想政治工作者经常遇到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进行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家、集体、个人关系的教育，进行懂大局、讲风格的教育。要使职工充分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此外，就是要算账。所谓算账，是拿职工的正常收入和农民、个体户的劳动所得比较。我相信，对于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致富、非法致富的人，我们的绝大多数职工是不以为然，决不愿意步他们的后尘的。另外就是要考虑，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而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就不能简单地说是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很多户的分配实际上包括收益分配。

在第二汽车厂召开全国企业思想工作座谈会期间，国家经委和中宣部的同志就当地个体户收入和二汽职工收入及其增长情况做了一番调查。大体上是，一个个体户要实现年收入二千元，按百分之三十交税，只需创利税二千八百多元。二汽职工年平均工资一千一百元，要达到二千元，就需要奖金九百元。按照我们的奖金税以及能源交通税等制度要达到这个水平，每个职工必须平均每年创造利税八万五千多元，这是个体户的三十倍。这样要求，二汽六万多职工，一年就得实现利税五十一个亿，等于一九八四年上交利税的十倍，如果按六年算，每年的递增速度要达到百分之五十。大家知道，二汽是个先进企业，又有特殊政策，在全国是少有的。即使二汽，也不能要它六年内每年递增的速度达到百分之五十，更不要说其他企业了。这就提出一个有关分配政策的大问题。要考虑不同经济形式中收入增长的情况，通过征收所得税等办法，使得不同经济形式中劳动者的收入不至于不合理地拉开太大。特别要考虑对于社会的贡献。有的同志认为，对国营企业的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放宽。这些方面的政策性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当然，国营企业职工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能仅仅归结为工资和奖金收入。上海石化总厂党委的周书记算了一笔账，给我很大启发。比如住房。我们在石化总厂参观了几家职工宿舍。建一套建筑面积五十平方米的宿舍，在金山需要一万五千元。现在职工住房紧张，但是总的趋势是在增加。一户职工，分一套五十平方米的住房，至少可以少出一万五千元



去建房子，每月几块钱房租，应该说是很低的。农民有了钱，也要盖房子，要攒一万五千元，要买到材料，把房子盖起来，至少也要三年。我们参观一些农村发现，盖了新房子的，屋里一般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因为盖房，就不能同时买彩电、新家具。我们的职工除了可以几乎无偿地得到住房外，还享受其他福利待遇，像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教育，以及保险费、退休费、公费医疗等等。这些方面的条件，一般要比农民好得多。算一算这笔账，就可以进一步明白，我们的工人阶级的确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我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贡献给了国家，也有一部分用于提高我们自己的物质文化水平，所以，在工资和奖金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其他的福利待遇，进行一种综合的比较对照。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有同志说，现在有人是“捧着金饭碗、吃着铁饭碗”。意思是说，他通过跳厂、停薪留职，出去发财，那是“金饭碗”，发财发够了或者不能干了，又回来了，还有个保险的“铁饭碗”，还要工厂养着。因此，有同志提出，不反对人才合理流动，也允许停薪留职，但是要有个规定，停薪留职期间，你到别的地方享受那里某些待遇期间，要把这里分给你的房子退出来，无权再享受这里职工的福利待遇。

我们说，精神鼓励为主，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我们决不否认、决不丝毫轻视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如果物质利益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会反过去妨碍或者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甚至对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一种冲击的力量。其结果，两个文明建设都要受到影响。所以，分配问题

无论在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在全国，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所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都要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从各自的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反复讨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步妥善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 四、思想政治工作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

这里不来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只想就这一学说同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问题讲一些意见。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这是每一个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都很熟悉的名言。但是，只是熟悉还不行，只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也不行，重要的问题在于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我们这个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是属于马克思这里说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我们的头脑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群众也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报纸、刊物上和群众口头上有各种对于这些问题的言论和解答。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归根到底都要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不是我们的意识去决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我们的意识。而且这里发生这样一种过程，有它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换句话说，你想仅仅在意识的领域里去解决人家的思想问题，而

不去考察它们同社会存在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人们的头脑是正确地还是错误地反映了客观存在，那就很难有什么效果。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在客观事物的运动过程中，只有对客观存在有如实的了解，才能分辨人们认识的正确和谬误。高明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并不靠能说会道，而是善于引导人们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

马克思还有一段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依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sup>【4】</sup>别人发表意见，我们发表意见，尽管自己以为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这个“自己以为”却不能成为意见正确与否的根据。马克思讲，他们处在一个变革时代。我们也处在一个变革时代。两种变革，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性质、它的变革的内容和方向，在理论家们的笔下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果某位理论家关起门来构造一个什么“体系”，认为这个“体系”就是真理的总汇，认为这个“体系”毫无疑问可以指导世界历史的运行，我们会说那是可笑的。问题不在于你那个“体系”本身，而在于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再高明的“体系”也不能证明客观规律是否正确，恰恰相反，你那个“体系”是否正确，则取决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物质生活的矛盾。

这是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了解这个道理，就不是一个唯物论者，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问

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不了解这个道理,就不是一个辩证唯物论者,同样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sup>【5】</sup>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的思想工作就成为多余的了。革命战争年代,思想工作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重申和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制定和不断完善适合各方面情况的方针、政策,使我们在各项工作中取得重大胜利。在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由于我们的意识正确地反映了社会存在,它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不可低估,思想工作是没有其他工作可以完全代替的。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的情形,就是由于不是正确地而是错误地反映现实,发表各种离开客观实际的议论,那就说不上推进社会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方向应该坚定不移,至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何搞法,还需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所以说,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努力从客观实际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对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来说,就要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理想纪律,

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要同那些损害社会主义、有碍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种种说法进行争论，以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努力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思想问题的真正解决，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发挥作用，不能离开经济政策的逐步完善。同时，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深入实际，认真研究各种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关系的处理，又有助于经济政策的逐步完善，有助于正确理解和贯彻各项经济政策。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离开社会经济生活这个大舞台来进行活动。在这个舞台上，只要我们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存在，那的确是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演出有声有色、威武壮观的活剧的。

## 注 释

- 【1】 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16页。
- 【2】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版，第158页。
-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2页。
- 【4】 同上书，第83页。
- 【5】 恩格斯：《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06页。

# 党委集体领导和厂长（经理） 行政指挥的关系问题\*

（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

前几年，中央书记处讨论到企业管理工作时，曾经提出三条原则，即党委集体领导、厂长（经理）行政指挥、职工民主管理。可以认为，不论企业采取什么样的领导制度，这三条原则都是需要坚持的。

我们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组织制度”一节中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由党的委员会民主讨论，作出决定”【1】。

就党委集体领导这一条来说，不论企业实行怎样的领导体制，包括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理)负责制,这条原则都应坚持。不能把党委集体领导等同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也不能因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就认为党委集体领导可以不再提了。我们应当正确理解党政分工的涵义和要求,明确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正是为了更好地做到党政分工,使之各尽其职、各负其责。这样,企业党委就可以从日常行政事务中摆脱出来,全力地、更有效地负起党组织应该负的责任。具体地说,就是对企业是否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进行保证监督,党要管党,要管好党的干部,做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工作,并通过党员和工、青、妇群众组织做好全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集体作出决定,实行集体领导。不能因为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而要求党委工作也来个什么书记负责制。

党章《党的基层组织》一章还规定:“这些基层党组织应对重大原则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负责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不要包办代替他们的工作。”【2】无论企业实行哪一种领导制度,党委工作都不能离开这项规定。比如发展党员,也要先培养、考察、教育,然后支部大会讨论,少数服从多数,最后报党委讨论决定。党委的保证监督,也不是书记一个人的保证监督,而是党委集体的保证监督。当然,这还要同个人分工负责结合起来。

说到厂长(经理)的行政指挥,如果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他可行使十二届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规定的各种权力。问题是,行使这些权力,是一切个人说了算

好,还是遇到重大问题民主讨论,通过工厂管理委员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好。经验证明,经过民主讨论后作出决定,比一切个人说了算好得多。当然,会议作出决定之后,行政领导人可以以个人名义下达命令,某些行政方面的日常工作,也可以由行政领导人拍板决定,独立负责。同样,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并不意味着取消党委集体领导。首先,如果厂长(经理)是党员,要按照党章规定的原则,接受党的决定的约束;其次,如果厂长(经理)参加党委,也就是参加党委集体领导,是这个集体中的成员之一;再次,厂长(经理)进行企业生产、经营方面的领导,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后,党委要发挥保证监督的作用,要保证监督得好,也必须依靠党委集体领导,而不能只靠书记一个人。

## 注 释

- 【1】** 《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95页。
- 【2】** 同上书,第304页。



# 人民在看共产党员的行动\*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五日)

听完石俊同志的讲演以后，胡启立同志和我退席了。什么原因？就是要向丁玲同志遗体告别。对于我来讲，这是非去不可的。共产党员的感情，使我必须向她的遗体致同志式的敬礼。

丁玲同志比我大十一岁。她成为著名作家的時候，我才十四五岁。一九三一年，我初到北京，恰好遇上九一八事变。民族的灾难，亡国的危险，摆在我们那一代青年的面前。每一个正直的青年，都在严肃思考和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我们接受先进思想的影响，是从接触革命文学开始的。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丁玲同志，读她主编的《北斗》杂志，读她的当时在青年中间、在人民中间发生广泛影响的《韦护》、《母亲》、《水》等作品。她一九三六年到了延安。我到延安以后，大概一九三七年九月或者十月，周恩来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军医大学毕业生赴老山前线见习汇报会上的讲话。

同志在一个小礼堂作报告，讲前方抗战的情况，讲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全面抗战，国民党却认为只需要军队抗战，不需要动员人民抗战。恩来同志很有风趣地说道：我们不但八路军开上了前线，我们的著名作家丁玲同志，也已经带着战地文工团奔赴了前线。她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所以，在我们前方，不仅有军队的抗战，也有人民的抗战。军队主要是男同志，丁玲同志是女同志，她带的文工团还有不少女同志，所以，不仅是军民的全面抗战，也是男女的全面抗战。恩来同志这篇讲话，给我印象很深。后来丁玲同志从前方回来，我有幸能够在延安的马列学院同她成为先后同学。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启示和教育下，她深入农村，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写出了反映这场伟大斗争的著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获得斯大林奖金。我在东北工作期间，也同她见过面。她的著作，她的行动，对于我们这一代青年来讲，起了先导的、教育的作用。我应该在她遗体前表示诚挚的感谢。

一九五五年以后，她长期受到“左”的错误的迫害。我没有写文章或发言批评她，可是当时那种错误的批判以及错误的处理，我是同意的，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这说明我在那一时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没有觉悟。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党中央的领导，我逐渐地从这种错误思想下面解放出来。所以，丁玲同志去世，尽管我个人没有批评她、斗争她，但是仍然应该在她的灵前表示深沉的歉意。

尤其难得的是，丁玲同志受了这么长期的迫害，党中央

为她平反以后，她从来没有流露过一点对党的埋怨情绪。有些当时批评过她的同志向她说：“丁玲同志，我曾经对不起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她就立刻讲，这都是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她曾几次出国。去美国之前，她首先想到的是，到北大荒去，看望曾经同她一起生活、劳动的士兵、职工、农民。在国外，有人用各种方式来诱导她，希望这样一个名作家在外国人面前批评共产党，骂共产党，哪怕有一句也是难得的。遇到这种场合，她首先讲，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和人民在过去十年中间经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对我个人的伤害算得了什么呢？她一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勤奋工作，坚持党中央倡导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方向。这样一位党的文艺战士，这样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家，在最后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不能不去向她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天下午，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向去世的党的老战士告别，心情非常悲痛；参加这个会，向从前线回来的英雄学习，听你们讲演，又非常高兴。

听汇报团代表的演讲，我受到很大教育。在这一点上，我想在座的青年同志们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请允许我代表今天到会的全体同志，向今天演讲的同志，向汇报团的所有同志，向继续战斗在前线、用生命保卫祖国和平建设的指战员同志，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同志们到前线，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得了满分。同志们说得好，这也是一次世界观、人生观的考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那么，在这样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个人来说，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还重要不重要呢？是不是只提倡个人享受就可以了，不必再讲艰苦奋斗了，不必再讲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了呢？几位同志的讲话，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没有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战斗、出生入死以至于流血牺牲，就不可能有国境的安全，不可能进行和平建设。就和平建设来说，没有各条战线上亿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辛勤劳动、忘我工作，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谁创造的呢？就是那些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勇于奉献、不计名利的普通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创造的。他们才是我们民族的精英、时代的脊梁。

同志们都是大学生、研究生。我们国家要在各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特别需要培养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条，是付出了代价的。因此，大家一定要珍视难得的学习机会，树立和坚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切的信念和决心，努力掌握建设国家需要的知识和本领。

经验告诉我们，从小孩子、青年成长为真正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只有书本知识远远不够。除此以外，十分重要的，一是要对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有所了解，二是要经过长期实际工作的锻炼，经得起各种困难条件的考验。否

则，自以为有知识、有价值，因而目空一切、傲视别人，以自己为中心，像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的，关起门来称王霸道，即使真的读了一点书，恐怕也很难有所作为。鲁迅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就讲过，先前是以自我为中心，只想到自己如何痛苦、如何事事不如意，后来才懂得以大众为中心，自己做这大众中的一员。今天几位同志演讲中也说到，刚到部队，觉得战士们粗鲁、顽皮、甚至有意与你为难，时间一久，就发现他们纯朴、真诚、正直无私的品格。你们经受了锻炼，得到一笔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将在你们的一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像丁玲同志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对党的信任，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下去。任何工作都是一样，胜利不会一帆风顺地来到。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能够设想今后不会有困难，不会有曲折。就个人的生活道路来讲，也不能够设想会到处铺满鲜花，万事如意。遇到困难和曲折，能够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熬得过，战胜它，这才是真正的好汉。王震同志几次对我讲，说他身经百战，有的仗打得很顺利，但是多数仗打得并不顺利。这种时候，如果我们坚持下来，就胜利了。他说了一个道理，拿革命队伍和反革命队伍来比较，当我们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反革命队伍一方往往会比我们更困难。因为我们是为人民的，是正义的，他们是反人民的，非正义的，正义的事业在任何时候都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前几天，彭真同志在董必武、林伯渠同志一百周年诞辰纪念会上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他说，一百多年

的历史上,淘汰了不少显赫一时的风流人物。一百多年的历史,经过多少曲折!有些风流人物在一个时候是显赫的,可是熬不过困难,经不起曲折,没有坚持为着人民的利益奋斗下去,就被历史淘汰了。希望同志们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吸取营养,不做显赫一时的风流人物。在延安庆祝吴玉章同志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篇文章,说吴老经过辛亥革命,后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者,一生都是随着我们的历史前进的。一个人做一件、两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一直到死都做好事。

真正做出成绩的人,都是既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又有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人,都是刻苦学习而又努力了解自己人民的人,都是能够经得起艰苦环境考验而能够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人。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老老实实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自己,对于青年来说,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永远具有重要意义。

刚才一位同志说,他发现在伤员和烈士名单中,党员占多数,在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总是党员抢着上,最艰苦的工作总是党员抢着做,突击队、敢死队大多数由党员和申请入党的同志组成。我们要向这些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并且以我们党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感到骄傲。现在,党中央正在下决心抓端正党风的工作。有极少数党员、党员干部不争气,以权谋私甚至违法乱纪、参加犯罪活动。中央下了决心,对于这样的党员、党员干部,一定要严肃处理,该党纪处分的党纪处分,该法律惩处的法律惩处。但是也必须看到,我

们的党员、党员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一些地方受灾，在救灾活动中，也是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群众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困难，还是找党支部、找党员。去年辽宁灾区传诵着这样两句话：共产党员冲进去，受灾群众撤出来。这些事实，增强了我们端正党风的信心。

石俊同志刚才讲：“荣誉是对贡献的肯定，但是荣誉只是说明过去，既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奉献，奉献不仅包含着过去，更包含着将来。”这是金子般闪光的语言。这里的意思很深刻，也是同志们共同得出的结论。人民拥护我们这个党，不仅看共产党的宣言，更重要的是看共产党的行动，看共产党员的行动。同志们有了这样一个可贵的起点，希望终身记住自己的金子般的语言，实践这金子般的语言。

## 功不在禹下\*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同志们已经讨论得很清楚了。我们都是受益的人。我们这些人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能够走上革命道路,都是因为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文学或是革命理论著作,那个时候主要是靠翻译。当然,我们自己也有革命文学,但相对地来说,比较成熟的、影响较大的还是外国的作品。这些革命文学、革命理论著作能传播到中国来,主要是靠从事翻译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有的同志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翻译工作者在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同志讲过,吴亮平同志翻译《反杜林论》功不在禹下。这确实是对翻译工作的崇高估价。我们的人民、我们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为了人民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大家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都在寻求科学的、在中国行得通的道理。救国救民的道理，光靠本国的不行，还需要从外国寻找，要有人把外国的先进思想、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过来。比来比去，还是马克思主义灵，适合中国情况，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能够推动中国人民走上解放的道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我们老一辈进步的革命的翻译家承担起这样一个任务：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革命文学著作。这个贡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几十年的斗争过程中，确实起了如同大禹治水一样的重要作用。现在书多了，选择起来不困难，但在那个时候，在中国要找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可难啦！找一本革命文学作品也很难。书店不敢公开卖，读者要偷偷地去买，买书的人、卖书的人都要担风险，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侦探。翻译这些著作的人同样要担风险。从翻译工作者的贡献和作用来看，他们值得我们尊敬。

现在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在召开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老同志，包括已故的老一辈翻译家，对他们在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给予足够的肯定和估价。

翻译工作过去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后将会起更大的作用。我们与外国，不仅要在经济上、还要在文化上进行交流，这是十分必要的。各种交流都要靠翻译。口头的、文字的翻译都很重要。文化交流包括各种各样的科学，各种门类的学问。我们需要吸收外国文化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也需要把我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介绍到世界各国去。

从个人的受益、从国家的建设和繁荣，我们都能体会到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我们要重视翻译工作，要培养和造就人才，使我们有一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能同国家建设需要相适应的翻译工作者队伍。新中国建立初期培养出来的翻译工作者，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这批同志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做过很多很好的工作。他们翻译的作品，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的，还是文学艺术的，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肯定。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新的年轻的力量有点接不上班。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同志还可以干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培养青年人。翻译工作者协会有责任通过自己的组织，通过各种途径，配合有关单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从北京来讲，比较重视专门培养外语人才，接班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当然培养人才不是一年两年就见效的。五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同志，总还可以干十年、八年吧。这十年、八年里从各方面努力，除了继续搞翻译，也有责任在培养青年人方面做很多工作。

前几年有的同志建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或者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编译馆。去年，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成立编译馆，任务是除了由编译局承担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外，也承担其他学术著作包括文学名著的编译工作。现在已正式确定编译馆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译馆不需要把国内有名的翻译人员都集中起来，主要组织对社会科学名著和文学名著的翻译和出版。自然科学的著作由其他部门承担。

一九八二年，胡乔木同志曾向邓小平同志报告，分期分批地翻译世界各国名著。这个意见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这就要求我们进行调查研究，哪些要翻译？首先翻译哪些？这个世纪未能完成多少？这个世纪以后能完成多少？到二十一世纪有哪些展望？等等。我们的翻译力量是有的，但不能说已经够了。我们要把所有的名著都翻译成汉文，其中有的还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工作量很大。这项工作，各地优秀的翻译工作者都可以参加，特别要吸收中青年翻译工作者参加，通过实践把这种人才培养起来。否则，我们在座的这些年岁较大的优秀翻译工作者一旦逝世，这个工作就会中断。

世界名著的翻译怎样进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的意见，主要是采取订合同的办法。比如，首先翻译哪些书，确定由谁来译，是一个人译还是几个人合译，有什么要求，什么时间交稿，谁来写评论、序言，以及稿费的支付等问题，都要在合同里写清楚。

刚才山东和宁夏的同志都讲，希望能够吸收他们的优秀翻译工作者来参加这项工作。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编译馆要同中国译协共同协商如何组织这一工作，确定书目，推荐译者。一本书译哪几种文字，哪个地方、哪个单位有合适的译者，我们翻译工作者协会要同编译馆取得联系，做个媒人，进行介绍。中国译协可以推荐，地方译协也可以推荐，最后由编译馆统一安排。

有些书，限于知识水平，该译而没有人去译。译协中有些同志搞外文的时间很长，有的还在国外居住过，可能比编

译馆的同志知识面宽，了解的情况多。你们可参考英国、日本、苏联的情况，提出哪些书是急需翻译的，应该首先安排，也可向编译馆推荐，哪些书有价值，谁愿意翻译、能够胜任等等，最后再由编译馆来确定。通过这样一些办法和其他办法来促进翻译出版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进行下去，使我们这项工作不至于遥遥无期，不至于急需翻译的没有人去翻译，也不至于翻译过来的东西与当前的工作结合得不那么紧密，或者不那么迫切和需要。

组织译书、进行检查、执行合同，主要由编译馆负责。我建议翻译工作者协会也能够参与这项工作，把它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以便使这件事做得更快更好。

这个世纪末做不完，下个世纪继续做下去。总有一天要把全世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名著都翻译过来。我们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魄，研究世界各民族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民族、地方，在文化上对人类作出了贡献，我们都要把代表性的著作翻译介绍过来，让中国人民了解、知道他们的贡献。

除了翻译，还要做好翻译作品的介绍、研究和评论工作。这不能全靠翻译工作者，但你们要带头，起到督促的作用。许多著作翻译出版后，如果没有介绍、研究和评论，可能带来副作用，译著愈来愈多，可能在读者特别是青年中间，使人感到无所适从，以至于在一定的時候、在一些问题上造成思想混乱。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就不翻译，而是说对读

者尤其是青年有责任进行引导。翻译介绍外国的东西是为了促进我们的文化,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些书中的内容是我们不应该赞成也不能赞成的,不把它删掉,但要指出来,讲点道理。翻译工作者首先要把好这一关。基本上不好,就不要译了,至少放到以后再译,先译那些对我们有借鉴作用的东西。其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面的如何借鉴,反面的如何借鉴?翻译工作者首先接触这些著作,首先有些了解。因此要提出这样一个希望,不仅要把书译过来,还要进行介绍和分析,在你们的指导之下,让读者正确地阅读这些书。评介不能光是靠翻译工作者,但我们翻译工作者首先应当承担这个责任。书出版后,还要组织更多的同志共同做这一工作。国外研究、评论世界名著的作品,也应该翻译过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学术的评论著作,都需要翻译过来。这件事要做好,不只靠翻译界,还要靠其他协会、其他各界的努力,而且需要长期做下去。希望翻译界能集中主要力量把这件事做好。有人估计,到目前为止,公认的世界名著有一万种,据说我们翻译了两千多种,还有八千种左右。那末,在我们党庆祝一百周年时能不能译完这八千种?还可以再放长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百周年时,能不能完成?我们要有步骤地沿着这个目标前进。把这件事做好了,对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对我们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很大的贡献。我们的人民将经常想起你们,感谢你们做了这样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

# 现在是青年人多作 贡献的时代\*

(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

三年以前,我们很多同志就深切地感觉到,我国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人才太少,远远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地位日益提高,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了解世界。但我们目前的对外宣传工作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不相符合,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相比差距很大。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对外宣传人才。考虑到这些情况,当时几个单位就下了决心要同有关的高等院校取得联系,建立两个专业。对这两个专业的学生要求高些,在校学习年限也比其他专业长。

当时研究招生的时候,根据我们实际工作的情况,根据我们国家的性质,对培养这样的人才提出了一些标准。简单说是三条: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国际文化交流、国际新闻专业首届毕业生报告会上的讲话。

第一,最起码、最低的标准,应该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搞对外联络工作,要使人家通过和你的接触了解我们国家的形象,不能跑到国外去丢我们国家的脸;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不卑不亢,不允许在“洋人”面前低三下四,奴颜婢膝。对外使者不能有辱使命,这是从古以来对外交人员的第一条要求。苏武为什么能得到历代人民的推崇和尊敬呢?就是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一个使者的气节。我们搞对外宣传的每个同志(对学生来说,是每个学生),应该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这点上不能有丝毫的折扣。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就是要忠于我们这个国家,忠于我们这个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忠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这一条,我们培养的人才就不合格。要使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经过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增长才干、提高觉悟,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这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第二,一定要熟练地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外语要真正过关,要能听、能说、能看、能写。我们再不允许这次培养出来的学生派到外国工作的时候,不管做哪项工作还提出要配翻译。这样的人不能毕业,毕业以后也不能分配到国外去工作。

第三,知识面要广。要懂得历史,懂得现状,懂得文化,懂得科学;要了解中国,了解世界。刚才有的同志讲,这样的学生是个杂家,但这杂家不是一般的杂家,是知识非常渊

博的杂家。这个杂家最好既要有广博的知识，又要有一两门专门的知识，“博”和“专”要能够结合起来。当然，知识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学校应打好基础。

第一届学生快要毕业了，四个学校九十六人。学校要对你们进行考核，接收单位也要考核，这是必需的。最重要的是你们自己要考核自己。最起码要做到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必须得一百分，九十九分都不行！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能够不能够做到；今天做到，一辈子做到，能够不能够？（同学们回答：能！）不只是口说，要兑现呵！发表一个宣言，以至于入党时宣誓，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自己拿行动来证实。刚才有位毕业生讲得好，希望若干年以后再相会。你们来日方长，今后每一次相会的时候都相互问一问，我们第一届毕业生中有谁离开了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这个轨道。

我希望你们对自己作一个如实的估计。要找出不够的方面，逐步努力完善自己。这些年来，党中央、各级党委、各级学校都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作为很重要的工作。年轻人中间也确实出现了一个好的趋势，就是很多人要立志成材，这是值得庆贺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耽误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比较好的社会环境，我们的工作正在一步步做起来，以后会做得更好些。年轻人中间，包括在座的各位，有志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是非常好的，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我们国家需要人才，需要栋梁之材。但是，我们大家在下这个



决心、立这个志愿的时候，也要对自己已经走到什么样的地步作个恰当的估计。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我看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锻炼过程。今天以前，你们经过的只是选种阶段、育苗阶段，现在证明苗子还是不错的，是壮苗。离开学校到工作岗位是移栽。苗圃里可以培养很好的苗子，但是，一直在苗圃里生长就经不起风吹雨打，成不了材，需要把苗子移栽到各种环境中去锻炼成长。

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一般来讲，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没有做过实际工作，没有接触过社会，尽管毕业的时候，在各方面是优良的，但要真正成材，能独立工作，也还需要十年左右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还要用功，还要勤奋，还要态度端正，还要专心一意。在这十年左右时间里，要经得住各种各样的考验。拿移苗的成长来讲，有阳光雨露、和风细雨，这当然是非常舒服的；可是也要准备狂风暴雨、早霜、冰雪。苗移到森林里以后，有的地方的森林有人照管，有的地方的森林没人照管，还可能遇到野生动物的践踏。苗是好苗，大狗熊一脚也可以踏弯。这是讲自然界的现象。过春节，祝词可以讲万事如意。但是人生的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是万事如意，不会像长安大街那样宽广和笔直。特别是你们将来要跟外国人打交道，外国人中间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也不能说不会有居心不良的，不能说不会有敌人和反共分子，这就对你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讲自我设计。我认为，我们不能抽象地赞成或反对自我设计，要对自我设计进行分析。自我设计

起码有两种。一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对国家的现状、正在从事的事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了解得较清楚，然后使自己适应国家的需要，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前途同社会发展的前途、同人民的要求紧紧地结合起来。这样来设计，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真正这样设计的人，就会感到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么艰巨，我们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国家、社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是多么高；因此，就不能骄傲、松懈和停顿，不能满足。另一种设计则相反，不管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关起门来专图个人的名利、个人的享受和幸福。这样的设计可以五花八门。这样设计的人，谁妨碍了他，他就会反对谁。这样的设计可以很美妙，也许个别人可以侥幸得逞，多数人却很难如愿，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多貌似聪明的人做这样一种设计，从一个时候看，可能占先；历史地看，这些人站不住脚，聪明反被聪明误。很多有才华的人，由于自我设计的立场、方法、道路不对，结果他们的聪明才智被误用了。这样做，于国无补、于民无补，最后于自己也无补。而那些服从组织和国家的需要，全心全意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忠心耿耿的人，在年轻时比刚才那种人也许显得“笨”一点；但从几十年来看，他们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贡献，包括个人的成就，要比前面那种人大得多。

我建议，同志们今后观察我们社会的时候，要看到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前途，同时也要面对我国的现实，要多想一想

我们将来会遇到的困难，多想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怎样来实现爱国主义和信守入党时的誓言。把各种能想到的困难放在脑子里，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就不至于惊慌失措。我们国家的总趋势会一天比一天好，把个人命运和人民命运结合起来的人，是真正前途广阔的，但这不是说不会有种种困难。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免不了这时有这方面的困难，那时有那方面的困难。我们对这些应怎么看待呢？这几年我们各方面都有进步，但不如愿的事情还很多。要改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使国内各个民族进入文明的、进步的时代，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整个国家离开我们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

总而言之，在你们离开学校进入工作岗位以后，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令你们焦心的事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遇到这些事不要悲观，看到这些越多，要越觉得自己的责任重。有了这种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就可以进行合理的自我设计，为国家、为社会多作贡献，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 江西老区调查报告

(一九八六年六、七月)

## 一

江西老区面积大、人口多,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十分困难。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除中央腹地外,边缘地区都是我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占全省的三分之二。红军退出江西进行长征前后,苏区遭到敌人的严重摧残,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二十五万多人。此外,当时内部“左”倾宗派集团制造“AB团”等冤假错案,被错杀了不少人;惨遭敌人杀害的群众更多。部分地区的山林、村庄、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被敌人烧光,元气大伤。

新中国建立后,江西省成立了老区建设委员会,拨出专款,帮助老区人民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当时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一)调查登记烈士,供养烈属五万多人;(二)

建设烈士子弟学校，抚育烈士遗孤四千多名；（三）平反冤假错案，抚恤被错杀者家属；（四）安排了苏区老干部三十多万人的工作或生活；（五）派医疗队为群众治病；（六）修公路，扶持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些工作，给老区人民很大安慰，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几个“大办”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使老区的山林遭到严重破坏，老区建设委员会的工作削弱，用于各项建设的费用减少，老区交通不便、教育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没有再得到较大改善，相当多的群众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没有能力改变生产条件。

江西省四十个老区县，现有人口一千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据省里统计，目前还有五百八十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元以下、口粮不足四百斤的连片地区有三百四十六个乡、五百二十万人，插花乡三十七个、六十万人），占老区农业人口一千三百万人的百分之四十五。

近些年，老区建设工作得到了重视，省委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工作，落后面貌有了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老区建设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的重视。从一九八〇年起，国家每年给江西老区二千万发展基金（一九八六年起增加到二千二百万元），省财政每年拿出三百万元用于老区的发展。特别是胡耀邦、宋平等十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到老区视察，给江西党政各级干部和老区人民以很大鼓舞和支持。江西省委一九八五

年六月召开的省党代会上，把加快老区建设作为省四化建设中一项全局性的战略任务；八月又召开了老区工作会议，确定了“七五”期间老区“三年解决温饱，五年摆脱贫困，力争尽快赶上全省经济发展的中等水平”的目标。

可喜的是，江西省各级党政领导部门在老区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认识，在老区工作上做到了动感情、动脑筋、动真的。省委的同志说，过去在认识上有三个片面性：看好的一面多，看困难的一面少；看平均增长比例多，看平均数掩盖下的不平衡少；看纵向发展的成绩多，看横向比较的差距少，因而忽视和低估了老区客观存在的贫困现状。省里还有同志对我们说，过去少数同志避“给老区抹黑”之嫌，不能正视老区的困难现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工作推不开。一位地委书记同我们交心，说过去有人向他反映农村出现了卖儿卖女卖青苗的事，他不相信，认为那是解放前才有的。他一下去调查，确有此事，这才改变了对老区的认识，动了感情，把致力解决老区的困难作为头等任务。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省顾委以及各级、各部门的负责同志，率领一万二千多名干部深入老区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使广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对振兴江西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认识到在占全省面积人口比重这么大的老区经济没有振兴以前，江西经济是不可能全面振兴的，从而出现了全省上下关心老区、支援老区、建设老区的生动局面。现在，各级政府都建立了老区建设办公室，并拟定了脱

贫规划。为了更好地支援老区，除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减免特困乡群众的负担，在信贷、物资供应、商业购销等方面给予优惠，帮助群众发展多种经营外，还采取了省直机关定点包干扶持特困乡、厂矿企业和教育科研单位对口支援、开展省内外横向经济联系、为老区培养输送人才、动员社会力量援助老区等措施。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改变了过去以救济为主的做法，实行统筹安排，着眼发展生产，重点使用。为了解决老区人才奇缺的困难，去年省地县共选调了一千七百多名干部到老区任职；赣州地区还抽调三千多名干部到特困乡蹲点，开展为期三年的扶贫工作。此外，省直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还通过办培训班，为老区培训各类人员六百多人；各地县也为老区特困乡、村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四千多人。通过上述工作，老区的各项事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为使老区建设在一九八六年迈出一个大步、有一个看得见的变化，全省共筹集支援老区资金一亿九千多万元（包括中央给的二千二百万元、省财政拨出的五百万元、支援穷队补助资金六百八十万元、省地统筹基建专款一千五百万元、省地质局支援老区开采小矿资金一千万元、粮食部门支援老区县建饲料厂一百万元、银行各项贷款八千万元等），用于开发项目的建设和扶贫。省里要求今年内做到老区特困乡人均纯收入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三分之一的特困乡人均纯收入达到二百元以上，并基本解决特困户食不果腹、衣被不御寒、住房不避风雨的问题，使他们不再挨

饿、受冻。

老区存在一些本身不能克服的困难，需请国家统筹规划解决。

新中国建立以来，老区工业发展少，农村工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也较单一，多种经营发展缓慢。这是老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根子所在。形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从生产条件的角度来看，交通不便、人才奇缺是主要的。

江西省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各类矿产一百二十六种，其中探明的七十三种，储量居全国第一位的有铜、钽、金、银、铀等十一种。这些矿产资源大部分在老区。此外，全省森林和水电资源的百分之八十在老区，竹木、茶叶、柑橘等经济作物产地也在老区。老区经济翻身、人民群众脱贫致富是有条件的。问题是交通不便，国家没有投资搞多少项目，地方财力又有限，丰富的矿产资源不能开发利用。现在放开搞活，允许群众办矿业，但一缺资金，二缺交通，三缺人才，又没有必要的规划和技术指导，群众想搞也不知从何搞起。

江西老区教育落后的状况也是很突出的。在四百零一个特困乡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乡没有普及小学教育，有一百多个乡没有初中，文盲和半文盲人口的比重上升。老区现有的学校大多数是危房，据不完全统计，危房面积达七十多万平方米，满足在校学生的需要尚缺教室十五万平方米。我们看过的老区学校，大都破破烂烂。瑞金一中，是省的重点学校，校址曾是贺龙同志入党宣誓、邓小平同志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地方，三十多年中只建了一座教学楼，实验楼



因缺资金只建了半拉子,教室和教职员工的宿舍多是危房,而且拥挤不堪,学生宿舍低矮破漏,两层铺,每个学生只有铺面一尺半。此外,江西大专院校少,招生少,赴外省学习后分配回省的不到三分之一,而这些人又不愿到贫困的老区工作,甚至老区出来的学生也不愿回家乡工作。不尽快设法解决老区教育设施落后、人才匮乏、群众文化素质下降方面的问题,不仅脱贫致富、进一步发展经济有困难,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也难以实现。

看来,解决交通问题、增加教育设施、加速人才培养,是振兴老区经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而解决这些问题,是省的力量所不及的。江西省一九八五年财政收入仅二十二亿八千万元,入不敷出;国家给了二亿三千九百万元的补贴,本身能用于支援老区的资金有限,需要有国家的重点扶持。

## 二

下面讲几点看法和建议。

### 一、江西老区应作为重点老区给予重点扶持

全国有十四个省的二百五十五个县,是各个革命时期的老区,其中江西老区四十个县,占百分之十五点七;全国老区农业人口一亿一千三百万人,其中江西老区农业人口一千三百万人,占百分之十一点五。江西老区的面积和人口所占比重都很大。中央和国务院一九八四年十九号文件《关

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所列的十四片贫困地区分县名单中,江西老区一个县也没有;国家统计局最近提供的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二百元以下的二百六十九个县中,也只列了江西的兴国一个县。国家一九八六年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八亿元中,只分配给江西二千二百万元,仅占百分之二点八;用于老少边穷地区开发专项贷款十亿元中,只分配给江西二千七百万元,仅占百分之二点七,不成比例。省里请求国家增拨援款和贷款额,给予重点扶持,是合理的。

从国家八亿元援款的分配情况来看,除三大市外,二十六个省区利益均沾。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四川省三千五百万元、广东省二千三百五十万元、江苏和浙江省各八百万元;走在经济发展前列的七个计划单列市也都分到了钱,武汉一百万元,广州、重庆、沈阳、大连、哈尔滨、西安各五十万元。十亿元专项贷款的分配情况也大致如此,四川七千四百七十万元,高出江西二千七百万元的一点八倍。

国家支援贫困地区的开发资金和贷款,过去分配了的,不便调整,今后分配上最好主要扶持贫困省。江西也宜作为重点老区给予重点扶持。国家决定增放给贫困地区的十亿贷款,应给江西更多照顾。

## 二、中央有关部门要积极帮助老区发展工业

“无工不富”,已被一些地区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所证实。老区一般都具有资源优势,特别是矿产资源丰富,通过开发矿业脱贫致富是有条件的。这就首先要求地质部

门,把老区特别是贫困县的地下资源,在“七五”期间搞清楚,提出可供开发的资源资料,并同有关部门规划好哪些由国家办,哪些由省里办,哪些由县或群众办,以便到“八五”期间先后开采。如果不在“七五”期间办好这件事,即使五年内脱贫后要想进一步发展经济,也会遇到困难。对开矿所需的交通、电力、加工、技术指导、资金来源和产品销售等问题,也需请中央有关部门统筹规划。赣州地区告诉我们一个情况:他们根据胡耀邦同志的指示,把柑橘生产作为开发山区的重点,三年种植了十万零六千亩,计划到一九九〇年发展到五十万亩,速度够快的。但品种的改良没有跟上,下一步还需要解决鲜果的运输、加工和贮藏,如果这些问题不尽快解决,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发生烂果,损失就大了。

### 三、要争取近几年内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作好准备

为使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能够实现,近几年内适当增加教育投资,在老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建设一批学校,培训必要的师资,并把现有学校的危房维修好,做到适龄青少年能够入学,每个学生都有桌、凳,得以安全地读书,是势在必行的。智力投资不是短期能见效的,在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宁肯少搞一点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也要挤出钱来办教育。要认真抓好教师的培训。师资的来源,一是由现有的初级和高级师范学校培训,二是从在职干部中选调。维修危房,除了要求各级政府给予财力、物力的支援外,还可以动员社会力量,如动员群众和在校师生员工参加义

务劳动等办法解决。这件事只要领导部门重视,认真抓,用几年的时间是可以办到的。否则,再拖几年,不仅不利于目前低水平的脱贫,脱贫后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将是困难的。

#### 四、要采取多种途径为老区培训人才

江西省目前采取的大专院校定向从老区招生、毕业后回本地工作,各级有关部门举办培训班,为老区县、乡定向代培各类人才,从省、地、县选调干部到老区县任职或到特困乡蹲点扶贫等办法,都是有效的,准备坚持下去并逐步扩大规模。同时,建议国家教委指定一些大专学校,采用定向招生的办法,为老区和贫困地区代培人才。

国家教委已经决定,从明年起大专院校学生助学金制度改为奖学金制度,同时规定,贫困学生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就业后归还。建议对来自老区特别是贫困县的学生采取如下补充办法:得到奖学金的学生,如奖学金不敷在校期间学习、生活支出,而所学专业又为本县建设所需要、本人毕业后将回本县工作的,不足部分由本县补足、贷款也由本县偿还;奖学金的补足或贷款的归还,均由本县和学生订立合同,双方保证严格遵守。如果特困县补不足奖金,偿还不起贷款,则由所在地区或省统筹解决。

总之,要想一切办法,抓紧在“七五”期间为老区和贫困地区多培训一些振兴当地经济的人才。

#### 五、建议召开全国老区工作会议

为了表示党和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怀,动员各方面的

力量支援老区建设,有必要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全国老区(不包括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其他贫困地区)工作会议。这个会议,不仅请老区省、县的同志参加,而且请中央有关部门和经济发达的省市同志参加,具体研究落实支援老区建设的部署和措施。并建议,在会议召开以前,请中央有关部门派人到老区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搞开发规划;也请来自老区和在老区工作过的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到老区看看,帮助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出些脱贫致富的主意。

# 为促进城市精神文明 建设多做实事\*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北京市的同志在市委直接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中，做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作。可以回顾一下，在没有开展“五四三”活动之前，比如一九八〇年以前，我们所在地区、所在单位、所负责的工作的情况和今天相比，都有个明显的变化，有个显著的进步。这是事实。外地的同志，尽管对北京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我听到的，也都认为北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明显进步的。这个进步当然是同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一起进行的。每次中央召开的大会，都要组织一些同志到我们北京市的单位、地区去参观，包括从北京出去到外地工作的同志，在参观过程中都说，离开北京才几年，没有想到北京有了这样多的进步。当然，物质文明建设也好，精神文明建设也好，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委员会委员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五四三”活动也好，这确实像大家所说的，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的系统工程。几年的时间就要取得根本面貌的改观，很显然是不现实的。马克思讲过，他的辩证方法，是在肯定中间看到否定。因此，我们在总结和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工作中确实有该做还没做到，或者已经做了的工作还有缺点，还有错误。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至于停滞，才能提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

这里，我介绍一点经验。今年六月初我离开北京，到了安徽，然后到了江西，走了将近四十来个县、市，确实看到一些新的事物、新的现象。就拿安徽来说吧，有一个蚌埠市，是安徽七个省辖市之一。蚌埠在京浦路上，同时又是淮河和京浦路的交界点，过去有人叫它是京浦路上的一个大的垃圾堆，最脏、最乱。可是这几年，特别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三明会议以后，只有两年的时间，城市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垃圾堆的名声，不仅他们自己扔掉了，到蚌埠市的人也都认为蚌埠确实成为很整洁、很文明的一个城市了。尤其重要的是，这个城市在开展“五四三”活动、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注重了改进人与人之间关系。街道的工作做得好，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做得好。我们参观过的几个居民委员会中，不仅是干净卫生，文明礼貌，而且人与人的关系解决得很好。他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居民点，那里过去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件，他们叫做“斗争的性格”。经过这几年的建设，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们非常礼貌，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而且影响了附近地区的居民。我们还看了一个蜂窝煤

站。以前，人们的印象是那里非常脏，人都是煤黑子。因此，在那里工作的人不安心。可是，经过这几年的建设，那个煤厂整个环境面貌改变了，里面的各种设施改变了。如洗澡间、托儿所、饭堂，完全改观了。干群关系改善了，煤厂与用户的关系也改善了。现在不仅原来的职工安心在这里工作，外单位还有人要求到这个煤厂来工作。我们还参观了几个公共厕所。蚌埠是个旧城市，他们计划在全市改造二百多个公厕，已经完成了一百六十多个，都是瓷砖，都是水冲的，有下水道，不用抽粪。由于经常有人管理、打扫，臭味不是完全没有，但比北京街道上厕所的情况好得多。

马鞍山是个几十万人口的新城市。那里的工厂区和生活区有计划地安排得很好，绿化得很好，街心公园建设得好，垃圾的处理也很好。他们形成了一个习惯，街道上没有垃圾桶，垃圾车每天来两次，居民直接把垃圾倒到垃圾车里。所以，街道上看上去非常干净。

全国各地这样的好经验不少，我们要想办法去参观搞得好的地区和单位，把他们的经验加以选择、提炼，作为借鉴。

在安徽、江西和四川，还有别的省，他们实行这样一个办法。省里管直属市，每年评比一次。第一名的奖励相当高。江西第一名奖十几万、二十万元，可以用来解决一部分支出的问题。市、地管县城，也采取一年评一次的方法。县管乡镇。层层落实，使得城市、乡镇以至于农村的文明建设层层都有人负责，年年有评比。像这样的办法，我认为是个好办



法。同时，不同水平的单位，都有一个更上一层楼的问题。相互参观，交换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市要开展一个全市性的服务大讨论，我觉得非常好。我补充一点意见，就是讨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想一想，我们每个人、每个单位是服务者，同时也是被服务者。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一部分人是被服务者，另一部分人是专门的服务者。各方面、各单位、各种人既是服务者，又是被服务者，是相互服务的关系。任何一个人，吃饭，需要炊事员为我们服务；做衣服，需要裁缝为我们服务；乘车，需要司机、售票员为我们服务；住房，需要建筑工人和维修工人为我们服务；受教育，需要老师为我们服务；有了孩子，也需要老师为我们服务；文化娱乐，需要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各种各样的人为我们服务；要看书，需要写作的人，包括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文学艺术的这些人我们服务；甚至游戏，也需要有人为我们服务。反正，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别人为我们服务。反过来，人家也需要我们为他们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服务、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只是片面地要求别人为我服务好，而我自己可以不为别人服务好，这不近情理嘛，不合乎我们社会生活的原则嘛，不是我们新社会的平等关系嘛。要求别人服务好的同时，也要想想人家在服务中有没有困难，有些什么困难，我们自己能不能帮助他们一点；目前条件下，哪些困难可以解决，哪些困难要等具备了条件才能解决，而这些条件需要怎样创造。

不是光靠他们，而是要靠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共同负责。同样，自己为别人服务，也需要大家了解：我为你服务有什么困难，哪些困难是我们可以解决的。我们要了解别人为我们服务中的困难，也要使人了解我们为他们服务中的困难，然后共同来想办法。在这中间就有一个相互理解、相互谅解的问题。今年，全国人代会代表联名写信批评北京的服务态度不好。这对北京是个促进。最近，《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陈香梅的文章，批评友谊商店不友谊。这些批评，我们都应虚心接受。但是，我们心平气和地想想，不仅北京，全国的窗口行业的服务人员确实是非常辛苦的。我去过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等一些国家，那里的商业网点多，商业服务的条件好，服务比较容易做得周到一些。我们百货公司一个售货员最多一天接待一千多人次。八小时，每小时二百多人排着队等他，像纺织工人一样，轻工不轻呀，他们的劳动并不轻松。一分钟接待三个顾客，来得及打招呼吗？二十秒钟能够说几句话？能够脸上带着笑容，我看就很不错了。当然，不能因此说我们的服务工作不需要改进了。但是，我们确实要设身处地替他们想想，使他们懂得我们在批评他们、要求他们的同时，还是理解他们的。你不能只是一味地、片面地责备他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不了解他们职业的困难。提倡职业道德，也要理解人家工作上的困难，而且帮助他们解决职业的困难。大家都这样想，这样来商量，就可以心平气和了，就不至于在开展服务大讨论时，大家都在诉苦，都在埋怨。要经过这么一个服务工作的大讨论，相互了

解，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谅解。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怎样求做使我们的服务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我们搞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表面上的文明礼貌，而且要求做到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相互敬爱、相互尊重、相互关怀。搞商品经济要有金钱，不能没有货币。可是，金钱的来往，不能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这里就涉及到党章、宪法。公民既要享受公民的权利，也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党员既要享受党员的权利，也要履行党员的义务。这都是相互的，不是片面的。所以，很希望经过服务工作大讨论，在我们党员、干部、人民中间进一步提高对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目标和要求的认识。批评一下那些表面上文明礼貌，实际上冷酷无情，有了钱什么都可以买到，没有钱什么都可以卖掉的现象。总之，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和人民有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

## 关于企业党委工作的 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六日)

首先，谈谈所谓“三次冲击”的问题。

在一部分企业试行厂长负责制、实行党政分工之后，就出来一种舆论，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了“三次冲击”。拨乱反正，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政治工作，说“政治部是整人部”，这是一次冲击；第二次是工作重点转移，说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成了保证，这还有什么地位；第三次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列举企业里领导骨干的次序是厂长、总工程师、总经济师、总会计师、党委书记，说把党委书记摆在第五位，成了“老五”了，党委更没有地位了。我不赞成把目前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说成是什么“冲击”。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只能说是冲击了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中那种不好的东西。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企业文明单位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正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努力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纠正不正确的、不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东西，创造新鲜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地转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以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越是改革、开放、搞活，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激励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抵制“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倾向。

第二，“党不管党”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一大弊端。

关于过去企业领导制度的缺点，我们讲党委包揽生产行政事务、企业实际上无人负责这一面比较多，而对另一面，即“党不管党”讲得少。长期以来，企业党委包揽日常行政事务，党委书记忙于行政性具体工作，而企业党组织却没人管。农村基层党组织也有类似的情况。前年，在山东开了一个会，讨论农村党员教育工作。山西的同志反映，老区有些党员多年不起作用，整党了，说这个党员没起作用，应该除名，不予登记。找这些党员一谈，党员承认确实没起党员作用；可是，反过来问，你支部也好，乡党委也好，县委也好，多少年来，什么时候把我当作一个党员进行过教育？这一问，不能不承认他讲得合乎实际。老党员还讲，庄稼人看到地里庄稼长得不好，都知道上肥料、灌水、锄草，使庄稼长好。可你这个支部书记、乡党委委员，还有县委的同志，明明看到我们这些人多少年不起党员作用了，不“加肥”、“灌水”、“锄草”，能只怨我们吗？你尽了责任没有？这一问，

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不能不承认，我们确实没有起到应该起的作用，没有负起应该负的责任！农村有这个问题，企业也有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党的组织、党的负责人有点忘记了党的工作。为什么呢？一是认识问题。另外，就是陷于日常事务，很少有人去切实地抓党的工作。这种状况，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已经到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

一个企业主要是从事生产、经营。一方面，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和指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七嘴八舌，毫无头绪，每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然不行。另一方面，生产、经营都是人干的，人的思想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素质怎么样，对生产、经营的状况关系极大。生产的组织和指挥，人的工作，包括思想、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还有企业里的其他各种事情，要厂长和党委书记密切合作、分工负责才能做好。如果厂长的工作没有党委书记的支持，肯定做不好。而一切都要党委来管，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事实上不可能，也肯定管不好。党委的工作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思想工作要围绕经济工作来做。同志们常说“硬任务”挤了“软任务”。这个“硬”、“软”的说法本身怎么样，还值得研究。不过有一个后果是清楚的，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脱节，就什么事情也办不好。

这几年来，群众对我们的党员意见不少，对我们党的干部意见不少。有些地方反映，学校也好，工厂也好，机关也好，农村也好，确有一批先进分子不是党员，也不愿意入党。

这类情况，在基层，在北京，听到不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的工作削弱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削弱了，党不管党的现象相当严重。通过这次整党，需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思想上改变，而且制度上也要改变。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农村政企分开，政府系统也有个党政分工问题。邓小平同志不久前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1】小平同志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认真领会贯彻。一切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制度都要实行改革。改变党不管党的现象，使党的组织真正把党管起来，这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革。

第三，实行厂长负责制后，企业党委的工作重点放在哪里？

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行政指挥，应该由厂长负责。行政和党委各有自己的职责，工作才有秩序。从基层党组织来说，摆脱日常行政事务，是一种解放。但是，这种解放绝不意味着可以不负责任、减轻担子。企业党委摆脱日常行政事务以后抓什么？主要是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搞好企业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的领导；对生产行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党委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一句话，要把基层党委的工作重点摆在管好党上，摆在思想政治领导上，摆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

利发展。这样做，党委不是“失位”，而是“正位”，做自己份内应该做的工作，不是无用武之地，而是大有可为；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大大加重了。

一九六一年的“工业七十条”，最早是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派人做了调查以后起草出来的。稿子交到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讨论、修改了好多次，是由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的。除了其他问题之外，他那时就提出，党委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了解实际的思想问题，了解基层工作中间的实际问题。把调查研究工作搞好了，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工作，有针对性提出意见、建议。如果党委忙于日常事务，想下去也下不去，一出门就有人找，没完没了的事情就来了。可惜，这个正确的意见，当时没有贯彻下去。这里有人们的习惯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领导体制问题。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条件下，企业党委要讨论和处理日常的大量生产行政事务工作，很难集中精力把党管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其实，说来说去，行政工作也好，生产经营也好，技术工作也好，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好，无数事实证明，最根本的还是靠一个好的党组织，靠一批好的党员，靠一批好的党的干部。凡是工作真正出色的地方和单位，没有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如果党委把党组织管好了，把党员干部管好了，把党员教育管理搞好了，整个工作也就前进了。这也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对待厂长负责制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有的同志想不通，有这种议论、那种议论，



原因就在没有真正认识清楚，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成厂长负责制，党委发挥保证、监督作用，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在哪里，以及改变之后对于我们整个国家、对于各方面工作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有的同志说，能不能贯彻好厂长负责制，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做行政领导和党委领导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有党性，坚持党性，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得失。应当说，这的确是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基点。有了这一条，把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认识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第四，明确厂长的中心地位同发挥集体智慧是一致的。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不久，列宁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其中指出：“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物质的、生产的泉源和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2】列宁还要求学会把劳动群众的真正的民主制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应当说，学会这样一种结合，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化大生产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九二〇年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中规定，必须在工业管理方面坚持“一定的人对一定的工作切实负责”的原则。决议对这一工业管理的原则又做了如下规定：“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过程中已采取了委员制，那末在执行过程中，就应无条件地由一长制来代替。”【3】我想，这里讲的精神，对于我们企业的管理来说也是适用的。首先，要把企业干

部、职工的积极性和纪律性结合起来。其次，实行厂长负责制，明确厂长在企业的中心地位，不是说在一切方面都由厂长一个人说了算，有关全厂的重大问题还是要几个方面相互商量。例如，厂领导人在生产经营问题上要善于集中企业管理人员的集体智慧，在科学技术开发问题上要善于集中企业科技专家的集体智慧，还要向“智囊团”的组织 and 人才进行咨询，以便分别做出决定。还有，重大问题要经过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的讨论和决定，并且听取企业党委的意见和建议。最后，在执行决定的时候，要把权力集中于厂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现代化大生产的正常进行。

#### 第五，加强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

我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曾讲过，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要加强，不能削弱。但这不能理解为只是增加编制。对于政工队伍建设，当前应从两方面来加强。一方面主要是提高现有政工队伍的素质，有计划地轮训政工干部，特别要注意那些有志于政治工作、确有发展前途的同志，包括目前经验少一点、能力弱一点、文化低一点的同志，也要下决心培养、提高。至于其他单位和部门有些适合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性强的同志，如有可能，也可以调来充实政工队伍。另一方面，要把视野扩大，不能只看到政工部门的专业队伍，同时要看到各方面的力量。如纺织工人理想报告团，反映就很好。在各行各业，各省、市、县，也都有大批这样的先进人物。这是一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再有，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

究会，已经由小到大发展起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发展横向联系，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力量就大了。因此，不能只看专业队伍，专业队伍也不能只看人数。

建议研究会组织力量对上面几个问题很好研究研究。总之，改革、开放、搞活一定要坚持下去，思想政治工作一定会不断加强。展望未来，大有希望。

## 注 释

- 【1】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77页。
- 【2】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179—180页。
- 【3】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选辑》第二分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1版，第10页。

## 同《马列著作选读》书稿部分 编辑人员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去年九月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提出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这个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讨论《马列著作选读》的选编问题。首先是政治经济学部分，接着是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到现在已经工作整整九个月了。七月下旬，我们又集中了一些同志工作了一个月。据我听到的反映，认为这一个月很有成效，使这项工作又前进了一大步。

首先，原来是按三个组成部分各自选书目，现在合起来研究，就能更好地商量，各部分的选目可以避免或减少互相重复。《资本论》讲经济，又讲哲学、讲唯物辩证法。列宁也讲过，《资本论》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和基本的著作”<sup>【1】</sup>。你说《资本论》哪些篇章、段落摘出来只能归政治经济学，哪些只能归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归到其他地方就一定不行，这不符合《资本论》的实际。划分只能是从主要方面

来讲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说过：“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我们这次就是遵循作者的原意，把《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选编的主要著作。现在看来，这次划分的选目，大体上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也有很难处理的。比如，选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科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书目，就比较难定，只好协商。所以，现在的选目，不是说不可以讨论、争论。马克思、恩格斯写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按教科书的框框写，这篇文章就只写哲学，那篇文章就只写政治经济学，第三篇文章只写科学社会主义。那末，我们分三部分行不行？我想是行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就分三部分来写，这部书是马克思当时认可了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列宁的发明，是恩格斯的发明，并得到马克思的同意。按照过去教学的习惯还是分一下好。按学科分，是一种方法；如果读得好一点，按时间顺序，把主要著作从头到尾读一遍，回过头来再分别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有分有合，收获会很大。我们也不排斥另外的读法。总而言之，经过划分和衔接，比原来各自的选目好多了。但要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定稿时还可以调整。这是第一个收获。

第二，书稿的每个部分都比原来完善多了，都有前进。原来觉得哲学、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比较有把握，最没有把握的是政治经济学部分，而这本书的选编工作是开始最早的。经过这一个月的工作以后，“政治经济学选编”面目全非了，改变了原来设想的按章节体系选编的办法，照原著的体系

节选。发生这个变化究竟好不好？我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认为好。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会有很大的意见。袁宝华同志前几个月跟我说过两次，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同志一起编的《〈资本论〉第二卷节选本》（关于再生产理论），对他们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再搞第二本、第三本。现在把这件事情落实了。第二卷更精炼了，第一卷、第三卷也有了一个节选本，第四卷也摘了若干部分。《帝国主义论》的节选本也有了。总之，我看“政治经济学选编”这次的改编很有好处。当然，也要有思想准备，因为变化大，可能意见就更多。听听意见，无非是搞得更好。“哲学选编”部分，据哲学组同志讲，自我感觉良好。我相信这个话。“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有它本身的困难，但是，我觉得这次改得还是比原来好了。我特别满意的是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如何认识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的部分。

第三，每本书前面写了一篇有点实质性内容的编辑说明，这也是一个进步。原来的设想简单了些，每本书前面只写个技术性说明。经过大家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现在的说明，把编选这本书的意图用比较简明的语言写出来了。希望各组就这个编辑说明再斟酌、提炼，把我们出版这三本书的意思搞得准确一点，使读者一看，就引起兴趣。与此同时，题解、注释、人名索引，虽然没有经过统一讨论，但都分别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要求，力求有新东西。题解和一些注释要注意同现实挂钩。题解最困难，要多费心思。书里的文章很长，

题解画龙点睛,提出学习要点,但又不能写得太长。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不同现实挂钩,算没尽到责任。在这方面请大家多做些工作。

从以上这几方面来看,在前八个月工作的基础上,我们集中起来又搞了一个月,总的来说,有进展,有成绩。拿出征求意见本,我们的工作可告一个段落,但以后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征求意见的本子年底才能印出来。在征求意见本发出去以后,大家的工作不要停顿。同志们都是搞教学和研究工作的,要把这个事情作为自己继续研究的项目,放在脑子里。

在我们准备编选这几本书之前,各组分别讨论了几次,政治经济学面临一些什么新问题需要回答,哲学面临什么新问题需要回答,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什么新问题需要回答。现在看,那时谈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需要回答的问题远比我们议论的、知道的多得多。本来想把座谈的问题整理出来,向中央书记处报告一下。我也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说过,思想工作、理论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很多,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回答。这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严肃的任务。本来的意思,是为了落实小平同志的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中央的路线,回答对改革有疑问的人提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说明在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总而言之,研究现实中的问题,事情还很多。

这项工作,不能仅限于参加编书的七八十个同志,可是我们这些同志要发挥主动精神,影响周围的同志,吸引和组

织有志于做这方面工作的更多同志,一起工作。在工作过程中,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有时也会有争论,这不是坏事。这也包括与实际工作者的结合。要力求针对实际,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们的工作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虽然是个长期的工作,但是不能老是等。要先从容易的问题开始,从现在多数人关心的问题开始。多数人关心的问题不一定是很深的问题。彭真同志讲商品经济时有几句话,就比较容易为大家所了解。他说:我们不能搞自然经济,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是为个人捞腰包,还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好事,这是最大的界限。这几句话很通俗,但是,区别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界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这是它的基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为了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当然,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同经济形式的商品经济,有不同的经济目标;但为人民、为社会的总体利益发展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的。这些思想就可以进行理论阐述。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编出中国自己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通俗的东西已经有人在写,也出了一些,现在需要写具有理论性的、科学性的、创造性的书籍。要有基本的写作队伍,相互切磋,共同努力,把书写好,也提倡有此志向的单位、同志来写。

这里顺便说一点编书过程中的争论。争论本来是好



事,但是,争论双方都应该尊重事实。批评一个人要根据事实,同人家争论也要根据事实。

党代会之前,一个省有一位同志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提出学理论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行了,不需要学其他的东西。胡乔木同志看到这封信,说了个意见。他说,这封信不够的地方有两点。一点,不能够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有的政策都说成是理论,应该有所区分。基本的方针政策,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是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同提高为理论形态的东西还不是一回事。另外一点,他不同意说只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行了,其他就不要学了。我认为胡乔木同志这两点意见都是对的。同时,报刊上的文章有的把马克思主义分成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古典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从古典马克思主义里找不到答案,我们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发展了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党代会以后,有的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提出,我们要学理论,就是学当代的党的文献。我认为这些不同意见,是可以讨论的,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大家讨论是好事。可是,在这个中间,有人歪曲胡乔木同志的意见,传播说胡乔木同志不认为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是理论。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党代会以后，中宣部要在成都开一个省、市、自治区宣传部有关同志的会，商量怎样落实邓小平同志讲的干部学理论的意见，讨论怎么学，学些什么。开会之前，朱厚泽同志说，要向乔木同志和我汇报，乔木同志同意了。听了汇报以后，胡乔木同志同我一起表示了两点意见：一、这是征求意见的会，听省、市、自治区同志的意见，不需要作总结报告；二、中宣部有个干部学习理论的文件，各地正在执行，新的决定没有作出来之前，原来的决定照样执行。这两个意见中宣部同志也都同意。胡乔木同志还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讲学习理论的重要，学习理论的历史。其中，讲了延安时期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说，批判了经验主义以后，我们要提倡读书，并且要宣传部门选几本书，让干部读。后来战争打起来，停了下来了。解放初，印了十二本干部必读书，起了很好的作用，也受到当时党外人士、高级知识分子的欢迎。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朱光潜先生。他解放后认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还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的书。陈岱孙先生也是一个，还有相当一批有学问的老知识分子学马克思主义，像钟敬文老先生等。可是，干部读书这件事没有坚持地推广开来。六十年代“批修”时又想起来干部还是要武装头脑，还是要学习理论。毛泽东同志让罗瑞卿同志开了三十二本书的单子，并且说最好每一本书都要像普列汉诺夫注《费尔巴哈论》那样，写出序言、注释。不久，就搞起“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中，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说，庐山出了违背唯物史观的大笑话，又指出要学习几本书。当然，那时的

政治状况还不可能解决认真读书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多次讲要学理论,用他们自己的经验反复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了这个问题。后来中央的整党决定又专门做了规定。政治局讨论整党决定的时候,指出一些整党文件要学习。陈云同志说,整党以后怎么办?要不要学理论?要学理论。当时还列举了一些要读的书目。到去年全国党代会,小平同志又提出新的要求,说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

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可是，有少数几个人抓住这个做文章，到处散布说乔木同志反对实事求是，反对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文件是理论。他们不顾事实，在乔木同志身上做这个文章、那个文章。

胡乔木同志长期在中央工作，是很谦虚的。我相信，他会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即使这种批评并不完全正确，他也会欢迎。但是，现在有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可以负责地向同志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参加、主持重要文件起草，或者修改、提出意见，以及帮助中央领导同志整理重要讲话，乔木同志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可以说没有一篇重要文件、重要讲话没有经过乔木同志之手。在中央的正式会议上，不只一次讲过，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都要请乔木同志把关。乔木同志尽了他的全部心思，来完成中央交给他的任务。结果，却被那几个同志说成这样、那样，似乎乔木同志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甚至说乔木同志从来都没有宣传改革，一讲话就攻击改革。这样一类说法，离开事实太远了，可以说完全歪曲了事实，有的人还是有意歪曲。胡耀邦同志在党代会上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胡乔木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可以同他讨论、争论问题，向他提出意见。我想，同志们这样做，他会欢迎的。但上面那种议

论,就不是正常的讨论、争论、提出意见了,我认为这实在太不公正了。乔木同志参加起草、整理重要文件,几乎每一个文件都讲到改革。这些文件集中了全党同志的智慧,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其中也包括乔木同志个人的智慧和辛勤劳动。怎么能对乔木同志作出从来没有宣传过改革,一讲话就是反对改革这样的政治判断呢?作出这种判断、制造这种说法的人,现在自封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守护神。但是,你在那样地攻击乔木同志的时候,你自己这几年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呢?你自己认真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文章、讲话在哪里呢?

就在我们编辑《马列著作选读》本的过程中,风言风语也是很多的。矛头是朝着搞《马列著作选读》工作的。我在前面说过,搞这个选读本,是根据小平同志关于新老干部都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指示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乔木同志主持下,已经编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件选编》,后来又编辑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这些当代党的文献都已出来了,拿去就可以学习。缺的是马列著作学些什么、怎么学。选编马列的著作,正是为了同当代党的文献配套,给干部学习提供方便。可是,有的人却说什么学理论只学当代党的文件,编马列著作的选读本是不是对着干!这种歪曲事实的传播,实在无聊。他们攻,自然有自己的用心。只要说清楚事实,是非自有公论。但是,这一攻对我确实也有点好处,使我想到了

选读本的题目,就是现在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原来只想到这几本书、那几本书,没想到要有总的题目。

再谈谈关于精神文明决定的事。

八月八日、九日,政治局、书记处部分同志在北戴河对送审二稿进行了讨论。大家肯定了送审二稿的优点,也指出了需要进一步修改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意见是,精神文明建设是十二大、党代表会议提出和强调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决定要把这一精神坚持下来,使它和十二大、党代会的精神衔接,保持党的指导方针的继承性和稳定性。稿子修改以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已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征求意见,包括征求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中顾委委员的意见,然后提交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六中全会议题有两个:一个是精神文明建设,一个是召开十三大的决定。十二大以来,全党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创造了很多新经验,也发现了许多新问题,也应该在这个决定里反映出来。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第一个问题是整党不能走过场;第二个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篇讲话曾在党内进行了广泛学习和讨论。一九八四年,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胡耀邦同志针对当时的议论,对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的讲话再次作了肯定,他说,小平同志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完全正确。以后,耀邦同志又多次讲确实有精神污染,确要反对。

他还清楚地讲到“精神文明的反面就是精神污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次提出四项政治保证,其中一项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就要破坏一些东西,要批判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一九八四年中央三十六号文件转发了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在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后不少中央领导同志都讲过这个问题。去年开党代表会议时,小平同志准备他的讲话,曾经当着胡乔木、我、林涧青的面说,他在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没有错,既然有精神污染,为什么不能反对?他不收回这篇讲话。他同意公开发表这篇讲话。最近,小平同志已经同意把这篇讲话收进十二大以来的文件汇编、文件选编,还打算收进公开出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献选读。

最近我又读了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同时读了陈云同志当时的讲话,觉得对我们当前做思想理论工作的同志来说,这仍然是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当时,小平同志指出了当时思想界的混乱,对各种错误思想的分析和批评,现在看仍然站得住脚。现在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只是当时批评的那些观点了。现在思想界很活跃,同时也要看到混乱的一面。更活跃了,这是可喜的现象。乱也没有什么可怕,但是要承认这个事实。当时,小平同志针对那些错误思想进行的分析、批评,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方针、确定的政策界限,做出的处理规定,都是对的。现在看到听到的一些观点,更觉得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要。当然,我

们的工作,我们的认识,要结合新的情况,结合刚才讲的十二大以来一系列重要文件和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在讨论学习关于精神文明的决定的同时来考虑有关问题。工作更需要前进,更需要严谨,要吸取过去曾经出现的某些失误的经验教训。

我想说一点大学生的思想情况。大学生中间确实反映了不少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问题。一方面,主流是好的,许多人越来越觉得,还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一种思潮,就是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在同意或发表这种观点的人中间,大部分对旧资本主义并没有认识,对现代的资本主义至多只知道一点皮毛,对旧中国的资本主义以及旧中国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了解得更少甚至一无所知。所以,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在我们的思想工作中,包括我们写文章、研究问题的时候,都要引导这些年轻人认识资本主义,认识现代的资本主义,认识旧中国的资本主义。这需要很多的工作,不仅理论界要做,文化、艺术、出版等部门都要配合起来做,工作非常艰巨。年轻人没有那种生活体验,缺乏历史的认识,只觉得我们不如美国,不如资本主义。从直观来看,是有迷惑人的情况,但他们由于没有亲身感受,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对马克思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很难真正理解。据我看,有和没有对资本主义的这种亲身感受,大不一样。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的实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实



际有很深的感受。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旧中国怎么样，不知道我们的民族过去怎样受人家的欺压、蹂躏，不知道资本主义世界里面的腐朽、肮脏。他们比较容易从表面现象看问题，把一切看得好像资产阶级经济学讲的劳动得工资、资本得利润、地主得地租那样“公平合理”、“天经地义”。因此要进行教育。当然，对年轻人，一概指责不行，绝不能采取“反右斗争”的办法来对待年轻人和思想界的某些混乱现象，这样搞只能失败。因此，必须探讨新的解决办法。用什么新办法？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办法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相信马克思主义，这是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同志面临的新课题。

关于讲“宽松”的问题，我过去没有表示意见，现在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要宽松，我主张大家都宽松，平等地宽松，对你宽松，对我也宽松，不能片面的宽松。而且在宽松的时候，终究还是要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优势，还是要有一个范围或界限吧？在这个问题上，彭真同志讲，活跃、讨论、争鸣，作为国家来讲，作为党来讲，还有没有一个统一思想的问题？争鸣、讨论、批评、反批评，都需要，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公民统一于宪法；党员既统一于宪法，又统一于党章。根本不讲宪法，根本不讲党章，恐怕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工作方针。

从上面讲的这些情况来看，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人身上的任务是非常非常重的。在这个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遇到一点挫折，但是一定要坚持下

去。小平同志讲,我们这些人(指参加科技大会的人)脑子里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问题是年轻人,无论如何不能让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们的年轻人。

### 注 释

- 【1】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154页。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17页。
-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29页。

## 人民教师的光荣\*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在发言中讲,老师教好课就能够把学生吸引住。今天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看把大家吸引住了,也把我吸引住了。这都是成功的经验,我感到很高兴。同时,也有一种非常难过的心情。几位同志都讲到,中年教师负担过重、体质下降,工作、生活方面困难很多;两个学校的同志还讲到中年教师每年去世一个人。这件事情很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这个问题前几年就已经提出来了,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都说过话。为了蒋筑英同志的去世,胡乔木同志还专门写了一篇《痛惜之余的愿望》。尽管这几年高等院校教师的待遇有些改进,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根本解决,应该引起我们教育部门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这次教育工会召开座谈会,讨论教书育人的经验,抓住这个题目很好。教育工会这些年来在民主管理等方面做了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同高等学校教书育人研讨会代表座谈时的发言。

很多工作。工会应该承担维护教师权益、关心教师首先是中年教师健康的责任。全国的教育工会要注意这个问题，省市的教育工会要注意这个问题，每个高等院校的工会更要重视这个问题。谁的身体怎么样，谁的负担重不重，学校的同志最清楚。这个问题要摆在教育工会工作的重要地位。刚才问了一下，高等院校的教师能不能每年检查一次身体，同志们说有的做得到，有的没做到。教育工会应该为这一件事情进行努力。至少要创造条件，使教师每年检查一次身体。发现问题就要切实帮助解决。例如，使他们的任务减轻一些，给他们一些休息的时间，给他们提供治疗的条件，在其他方面给他们一些照顾。一定要做到使他们不至于老是超负荷。工会要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教育工会要维护教师的权益。有些事情，只靠教育工会难以解决。但是，在这方面教育工会可以做的工作的确很多。只要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情况总会好一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需要教师，需要德才兼备的合格教师。教师体质状况下降，会妨碍教学工作，会妨碍教书育人工作。工会会员也要相互关心身体健康。

教育工会讲教书育人。实际上，从我们办学校开始，从根据地时期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毛主席的文章里就讲过，办好学校，要选好校长，要选好一批老师，这些老师要能提高学生文化水平，转变学生思想。当时延安的学校，老师都是既教书又育人。解放后，提出又红又专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为什么搞着搞着教书和育人这两件事实际上脱节了，管教书的人只是教书，管政工的人只管思想

工作? 刚才有同志讲是历史形成的, 有道理。解放初期, 很多教师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当时需要进行思想改造。现在看, 当时的工作尽管有毛病, 可那些教师包括当时进步的教师, 确实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提高。这对学生的教育起了好作用。教育自己也教育学生, 改造自己也改造学生。在座的同志, 恐怕大多数都是五六十年代培养出来的, 可以回顾一下, 是不是曾从老教授、老教师的身上得到教益呢? 不仅是得到知识, 而且从他们的思想品德、从他们改造思想的体会中得到了教益。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 总的说是学得比较好的。这期间, 教书育人如何结合, 当然不是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问题不太大。一九五七年以后, 我们犯了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到了“文化大革命”, 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 教授、副教授甚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教师教书, 还要挨批评、挨批判。在这种情况下, 把书教好, 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育人, 你们有党委书记, 有政工干部, 还有迟群嘛。特别是那个迟群, 他讲清华只有一个专业, 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专业。既然如此, 教师还能育人吗? 想育人也不敢育, 想结合自己的业务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提高, 也不行。结果, 教书与育人当然只能脱节了。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在教育工作会议、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 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同“文化大革命”时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以后, 抓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包括平反冤假错案。现在高等院校这方面的问题也还有, 只是

个别的,可能还留点尾巴。从根本上讲,教师的地位改变了。当然,各种各样的影响还存在,大家心有余悸,还不敢放手地、全心全意地把教书育人的任务承担起来。但是应该看到,总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好。在教书育人这条路上,教师们在前进,专业政治工作人员也在前进。

学校向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是教师,这也是个趋势。这几年来,据我接触到的,教育部、中宣部发的文件和一些有关负责同志的讲话,都讲到教书育人的问题,并在推行中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最重要的是,在全国小学、中学、大学中,都涌现出了一批在教书育人方面作出成绩、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师。你们是从全国来的,只有三十几个人。你们是其中的代表,最好的代表。大家一起来回顾历史的曲折,认识当前的形势,交流教书育人的经验,很有意义。今天听了几位同志的发言。你们会上还送了我几份材料,刘立同志的那份没有来得及看,关于郭竹瑞同志教书育人的材料我看了,卢娟、张知寒、宋银宾、吴采云、兰毓娟几位同志的发言也都看了。还有你们在会上的发言。这都是教书育人的宝贵经验,教书育人的科研成果。我建议,这些发言和材料要编成书,广为印发。同志们建议搞几条规定,我赞成。看来要写得很清楚、使同志们希望解决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恐怕不那么容易。即使写出来,有关部门能否通过,地方和学校如何执行,也很难说。这个工作要做,又不能只指望它。你们的发言和材料,实际上用你们的实践,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目前怎样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做

好，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说已经有了路子。把这些经验广为传播，使愈来愈多的有志于教书育人的教师得到启发，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使教书和育人结合起来并且逐步有所提高，要靠思想工作，要靠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教书育人，教师自己要首先增长知识，先教育自己。中国古代讲立功、立德、立言。在教书育人方面做出成绩的广大教师，做到了立功、立德、立言，说“为人师表”，是当之无愧的。我们的事业需要一批又一批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卓有才干、具备各种专业能力的人才。有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要求广大教师明确和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有了这些认识，就会自觉自愿地既教书又育人。刚才几位同志讲到中年教师的困难，但是，广大中年教师尽管天天面临工作、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并没有因此不干了。靠什么？如果没有高度的自觉性、没有崇高的献身精神，能做到吗？这些同志，值得全社会尊敬，也一定要促进各方面去关心他们。重要的是他们的事业心、责任心，他们的精神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有信心，看到教书育人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的广阔前途。现在编书，反映今天的水平。以后还要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发展，不断提高。除了编书，还要通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各种途径，宣传为国为民立功、立德、立言的教师们的模范事迹，宣传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性，使全社会都了解他们作出的贡献，了解他们在什么条件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学习他们的精神。

关于如何在学生中进行工作，你们讲到了很多经验。你们的发言和材料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不管哪门学科，都要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清华大学这些年进行的中国革命史教育，收到很好效果。现在刚进大学的青年十七八岁，对旧中国是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只听到从国外回来的人说外国怎么富裕，生活怎么好，觉得中国处处不如外国。有些人也在不加分析地宣传。这些东西在年轻人脑子里多了，形成一种怀疑，究竟社会主义该不该搞？搞下去有没有希望？社会主义优越性究竟在哪里？经过旧中国那一段的人，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回答。因此，要帮助青年了解历史，这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很有好处。

外国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些什么？近百年来，几十年来，历史本身是最有说服力的。今天我们独立了，但不是说我们祖国的解放、我们社会主义的前途，一点问题也不会有了。如果不强大起来、不发展起来，我们的独立就没有保障。这就要靠全国人民的决心，靠党的领导，靠共产党员、先进分子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让我们的青年知道，旧中国怎样受封建主义统治、帝国主义蹂躏，我们的人民在那种情况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仁人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社会解放付出了多大的牺牲。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批又一批人前仆后继地斗争，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小平同志跟香港人说，中国人在世界范围里头能够挺起腰杆，不是靠蒋介石，也不是靠蒋经国在台湾搞了那么一个孤岛，而是靠共产党，靠社会主义，靠中华



人民共和国,才使我们摆脱了二等三等民族的地位,使我们在世界范围里头能够抬起头来,包括现在在国外的台湾人,也都沾这个光。进行历史教育,不是光讲道理,要讲具体情况、生动事实,而且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根据同志们的发言,通过历史的教育,要使学生知道社会是怎样发展的,我们中国走过什么路、今后要走什么路,使他们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任何一门学科都有本身的发展历史,都要经过各种艰难困苦。只有刻苦用功、坚持钻研的人,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浅尝辄止、半途而废的人是不能有成绩的。搞学问要付出极大的劳动,甚至要付出很大的牺牲。一旦取得成就,在精神上就会获得最大的安慰。各种学科的教学,要讲清楚我们的学者在历史上曾对本学科作过什么贡献,完全可以和爱国主义教育很好地结合起来。政治理论学科的教育也要贯彻历史的观点。卢娟同志讲得很好,各门学科都要从历史的发展讲清楚艰苦奋斗的道路,讲清前人付出了什么样的劳动,甚至付出了生命的牺牲,才使这门学科一步一步前进。通过各个学科的学习,既使学生学到了知识,又使他们学到探索学问的态度和方法。要使学生懂得,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摆在面前。要解答这些问题,不是靠小聪明,不是靠看了一个消息、一篇文章,灵机一动。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未知数,哪怕是很小的一个未知数,都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今年夏天我到安徽,看到驯化喜鹊的事情。有几个同志在县委、地委支持下驯化灰喜鹊,可以听人的招呼,还能随着人、随着汽车到各地去,专门吃

松毛虫。这一片松林的毛虫吃完了，又换一个地方去吃。没有这个办法以前，松毛虫怎么打药也治不了。要为人作点贡献，想投机取巧是不行的。有成就的人，就是懂得这个道理。在我们的国家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任何一件有益的事，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就一定会对我们民族、我们人民作出重大贡献。

受到同志们的启发，提这么一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非常感谢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祝愿大家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也提请大家注意，发现周围同志身体不好，要及时呼吁。我们的知识分子、我们的教师非常宝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现在是希望而且能够发挥自己才能的时候，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就告别人世，对我们整个事业是很大的损失。这方面的问题，国家要解决，还要通过各种方法，包括同志间的相互关心，使困难的状况一天一天切实得到改变。

# 领导干部不学理论 是不够格的\*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

按照小平同志去年讲的,新老干部都要学理论,要结合实际学理论。党员干部应该比一般党员学深一点。

刚才说到学习政治经济学,你们提到读一些教科书,这当然是可以的。可是,学政治经济学光读教科书还不够,还要学点马、恩、列、斯、毛嘛!

我们最近几个月正在编学习材料,从近的来讲,就是编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读》,一直选到现在。过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汇编和选编,与这个相衔接的有十二大以来的文件汇编、选编。汇编是少量的,大量的是选编,选编对干部学习比较适用。现在准备编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读》,把党中央的一些基本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一些重要讲话,都收进去了,大概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湖南长岭炼油厂视察时与厂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此次视察的全面情况附录在后。

五十万字。

由近及远,有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学习材料,已经出的有两本《毛泽东著作选读》,还要出的,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发表的文章的选读本。他们的选集都已经出来了,选读本只把其中最重要的,对毛泽东思想有贡献的、确实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集体智慧结晶的文章,选编成书。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段就有两本:一本是毛泽东著作选读;一本是周、刘、朱、邓、陈的著作选读,这本大概三十多万字。

再往前,就是马列著作选读。马列著作选读已经编出了三本,政治经济学部分、哲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还正编着一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一个发展的学说,一个发展的科学》。

以上几种材料,加起来二百八十万字。这二百八十万字,要求工人都去读,我们没有这个希望,也不应该这样要求。普通党员都去读,也不应该这样要求。但作为领导干部,我想,特别是你们这样的厂,起码厂一级的领导干部,不限于领导班子,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都要读。因为你们这些人现在领导一个企业,将来还可能要领导更多的企业,以至于有的人会负更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忙得不得了,要挤点儿时间读书,很困难。这我知道。但是,作为领导干部,连这样几本书都不读,二百八十万字不读,确实不够格。以前读过的,重读的时候可以少花点时间;凡是没读过的,都要花时间用心地读一下。你们确实是忙人,用一年

的时间读二百八十万字，很困难；采用单一的方式读，也很困难。将来你们研究一下，考虑一下，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从近到远，是一种读法；从远到近，也是一种读法；结合你们的工作，眼前工作，要解决什么问题，从中找有关篇章，带着问题读，也是一个办法。办法可以多样，但是，经过若干年以后，作为一个厂级领导干部，要争取把它读完。好比说，一年读五十万字，读五年，我想只要下决心，是读得完的。究竟怎么读？还要听听你们的意见，希望你们也想想这件事。现在你们厂级班子平均年龄四十七岁，读五年，也才五十二岁嘛。不会发生我读完了又该退休离休了的问题。现在不是讲，退休离休的人也还要学习吗？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在关心党风、实行监督、以身作则的问题上，只要活着，就没有退出第一线的问题。最近薄一波同志又讲了一层意思，这个意思很好。他说，中顾委的同志哪里是退出第一线，甚至可以说是退出第二线啦，但是，这些同志只要还活着，脑子还管用，在学习马列主义、应用马列主义、发展马列主义这个问题上，却没有一个退出第一线的问题。这些同志都没有退出。你们这些现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将来还要担任更重要工作的领导同志，能把这件事放在第二位？或者根本不去想？腾不出时间？这说不过去。

## 附 录：

# 邓力群同志在湖南长岭 炼油厂视察

198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在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岳阳市委书记储波、市长谭照华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湖南长岭炼油厂。

邓力群同志在会议室就座后，说道：“你们这个厂全国闻名啊，我很早就知道了。你们厂有多少职工？连家属有多少？党员比例占多大？今天，请你们多谈谈。参观的时候，生产流程可能没时间看了，多看看教育文化设施、职工宿舍。”毛致用同志介绍说：“这个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抓得都好。”

随后，邓力群同志观看了反映长岭炼油厂的纪录影片《洞庭湖畔一明珠》，连连称赞：“好，这个好。”邓力群同志听取了厂领导的汇报。当听到长岭炼油厂取得的成绩时，他说：“向你们学习！”力群同志详细地询问了厂里一线党员的情况、职工的最低文化程度、厂里的电力情况等等，特别问到长岭炼油厂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情况，说：“同日本比你们怎么样？他们的办法你们调查过吗？”他还询问了厂里政工干部的比例。储波同志介绍说：“长岭炼油厂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比较活，有生命力。1982年‘四合格’，今年抓岗位成材，这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同企业物质文明建设结合进行的。”当厂里负责同志介绍到长岭厂端正党风的情

况时，力群同志说：“你们今天也要注意，不要给我们大吃大喝，就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一汤。”

在听取长岭厂抓岗位成材的具体做法时，邓力群同志问：“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让他在这个岗位上成材，他不愿意，想到别的岗位上去，怎么办？”厂里负责同志讲，主要是帮助他转变观念，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力群同志说：对。当听到介绍说，长岭厂有一些鼓励岗位成材的“土政策”时，力群同志讲：“用‘土政策’一词不好。一般人认为，‘土政策’是乱来的政策。你们这个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政策，是科学的政策、正确的政策。这样的做法，在你们厂试验，成功了，就在全中国推广，大家用。这就不是‘土政策’了，而是实事求是的政策了。过去，我们在工人中搞八级工资制，技术人员评工程师。而工人到了八级就到顶了，上不去了。你们厂搞助理技师、技师、厂内厨师的评定，很好。”

在汇报到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情况时，邓力群同志询问了有关的问题：“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是什么时候改为厂长负责制的？中间解决了几个什么样的问题？做党群工作的有没有人认为地位降低了？有没有人议论实行厂长负责制给党委领导带来什么好处？党委是怎么组成的？工厂管理委员会搞了没有？厂务会、党委会是否每周开一次？厂长办公会，书记参加吗？”厂负责同志一一作答，力群同志不住地点头，表示满意。

在谈到实行厂长负责制的情况下如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时，邓力群同志说：“这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提法，对三个条例草案做了稍许修改。草案的提法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后，党委重点抓精神文明建设。这次《决议》改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必须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什么经验？”

厂里的领导同志绍了长岭炼油厂“五个统一”和找结合点的做法。力群同志说：“倪志福同志有四句话：两个文明一起抓，两个任务一起下，两副重担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要。在你们厂的奋斗目标中，既有物质的东西，又有精神的内容。你们的做法更具体了。”力群同志还说：“你们这种单位对《决议》的精神容易领会，因为你们不是没有经验的单位。在这个《决议》里，就可以看出你们的经验、你们的贡献。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体会得出来。我们这次来，时间短，你们的好东西太多，看不完。你们刚才讲：要办厂，先治党。这个思想非常重要。不单是工厂要这样，任何一个单位都要这样。对于你们厂，原先我不知道。1982年，你们提出党员教育的‘中间突破’，对全国是一大贡献。”力群同志接着问道：“你们搞党员的‘四合格’教育，达到什么程度算合格？没有登记的党员有多少？群众中有没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登记了的党员还不如我。”厂负责同志答到：“没有，大家都服气。”

邓力群同志十分关心党员教育、党组织建设等问题，详细地询问了厂里进行系统教育的内容、对象、时间和方法，并就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发表了重要见解。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学理论，认为，作为领导干部，不学理论是不够格的。（详见前文《领导干部不学理论是不够格的》）在谈到对党员的教育问题时，邓力群同志说：“要让党员合格，一次教育不行，像你们讲的，不能一劳永逸，确实要经常教育。党员要始终保持先锋作用、在群众中发挥模范作用，很不简单。新时期的任务很重，对党员的教育稍微疏忽一下，模范作用就起不了；如果一松懈，工作就会落到后面。党员除在工作岗位上要遵守规程、搞好操作外，还应该有一个社会责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你们厂老干部关心青少年、党员八小时之外开展文明活动的做法，很好，应该肯定。再有，一个班组二三十人，大约



有五六个党员，其他非党员，有没有安排他们学习？党员要做群众的工作。即使有人讨厌这样做，也要坚持。”

汇报临近结束时，邓力群同志又说：“实行按劳分配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同时又不能斤斤计较。在这方面，你们的党员、干部怎么样？在上海石化总厂，我问了一下，厂级领导的奖金相当于职工的中等水平，不太突出。你们这里怎么样？”当听到长岭厂领导的奖金水平不能高过职工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十五，是中等水平时，力群同志说：“好，重要的是取得了发言权。”他还询问了职工的工资、奖金、住房、职工子女教育、劳模待遇等具体情况。

\* \* \* \* \*

汇报结束后，邓力群同志视察了减压车间、工人文化宫和职工生活区。

在视察减压车间的时候，邓力群同志说：“你们这里文明生产搞得很好，很干净。”在换热区，力群同志问：“你们这里国产设备占多少？搞无泄露是否要花很多钱？要更换多少设备？”力群同志还看了机泵区。临上车，邓力群同志问：“你们这个装置设备几年更换一次，能不能达到二十年的生产周期？”

离开减压车间后，在车上，邓力群同志说：“靠山进洞也不能一概否定，这比在城市里好多了，对居民也好。”毛致用同志说：“这里比城里环境好多了，绿化好，空气也好。”力群同志问：“这里气体污染控制到什么程度？你们生产这么多产品，考不考虑后处理？”厂里负责同志一一作了回答。

在工人文化宫，邓力群同志参观了长岭炼油厂的成果展览。在参观思想政治工作展览时，力群同志问陪同的刘振黄厂长：“你是哪里人？”刘厂长回答说：“河南人。”力群同志风趣地说：“我们湖南人欢迎你。湖南人没有地方主义吧？”刘振黄同志回答：“没有。”

力群同志说：“不要搞地方主义。”在看到长岭厂创业时期的老同志古德勤给青年人讲革命传统教育的照片时，力群同志问：“古老当年艰苦奋斗的照片有没有留下？”在参观青工轮训展览时，力群同志问：“有的地方搞形式主义，你们怎么样？”在视察阅览室时，当工作人员汇报到阅览室太小满足不了职工的看书要求时，力群同志说：“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要慢慢解决，要有二三十万册藏书才成样子。”

参观结束后，邓力群同志对厂负责同志说：“把你们的经验材料给我几份，特别是治党、政治思想工作、两个文明一起抓等方面你们认为比较好的材料。党史教育、整个厂史教育和革命史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看了你们的做法，令人高兴、令人兴奋。要重视对青年人的教育。青年人不了解过去。建厂时很艰苦，要把对建厂有贡献的人和事都展览出来。日本企业就很重视这方面的教育。”

\* \* \* \* \*

视察完工人文化宫后，邓力群同志提出看看职工生活区，看看中等水平的职工家庭。路上，力群同志询问了工厂的副食品供应情况。在经过幼儿园、小学校时，力群同志说：“我在上海石化参观时听他们讲，现在主要要解决孩子问题，特别是独生子女问题。如果厂里不关心孩子，两口子都不安心。”当行至单身宿舍时，力群同志关切地询问单身职工有无集体看电视的地方。陪同的负责同志说：“有看电视的地方，还有看报、熬药、洗衣、缝被的地方。”

在视察职工杨淑兰家时，邓力群同志详细询问了杨淑兰家的人口、孩子、收入、房租、工作等情况，并说：“你们这里福利好，三口人住这么大面积，比北京阔气多了。北京三代人住十五平方

米。”在看到杨淑兰活泼可爱的女儿时，力群同志说：“我一向提倡生女孩。女孩招人喜欢，老了以后就同女儿住在一起。”毛致用同志插话说：“女孩子对老人照顾得更好一些。”力群同志还询问了杨淑兰家电视机的品牌和价钱，录像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以及小杨和爱人是学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从杨淑兰家出来，邓力群同志问：“这家算什么水平？你们这里困难户多不多？”陪同者说：“这家算中等水平。困难户多是家在农村的半边户。”

邓力群同志又来到住在二楼的董银林家。邓力群同志询问了董家的基本情况后，问道：“你什么时候入的党？儿女中有入党的吗？”董答道：“我1959年入的党。”董的二女儿董灿烂说：“我申请了，正在争取。”力群同志又问董银林：“你这支部书记当几任了？”董回答：“我当支部书记时间不长，1980年开始的，以前是车间主任。”力群同志说：“你是双肩挑啊。现在支部工作里，你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董答道：“是传统观念和新观念的冲突。”力群又问：“你们车间青年占多少？”董说：“占百分之三十六。”力群同志问董的女儿：“你跟你爸爸谈得来吗？”她回答：“我和我爸爸最谈得来。”力群同志又问：“你们两代人没矛盾？”董灿烂回答：“我们很少发生矛盾。”力群同志说：“你现在争取入党，你爸爸当然高兴，如果争取不上，他恐怕要骂你的。你申请了，就要坚持，不要灰心。”力群同志又对董银林说：“你们两代人关系能处理得好，不简单呢。证明你很高明。”

\* \* \* \* \*

中午就餐时，邓力群同志对厂创业时期的老同志说：“你们不仅建起了厂，还留下了好的作风。长岭炼油厂树起了一个艰苦创业的好传统，有一个好的班子。”

---

邓力群同志还高兴地给长岭厂题字：“求实、严明、文明、创新”和“长炼政工研究”。临行前，力群同志与长岭炼油厂的陪同人员合影留念。

# 湖南老区情况调查

(一九八六年十月中下旬)

## —

在革命战争年代，湖南省毗邻江西、湖北、四川、贵州、广东诸省的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据统计，老区为革命牺牲的有姓名可查的烈士六万四千人，无姓名可考的烈士更多；惨遭敌人杀害的群众数以百万计，仅平江、浏阳两县被杀害的群众就有五十万人，当时不少乡村成了无人区。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划定全省老区县为二十六个，即长沙市的浏阳县，株洲市的醴陵、攸县、茶陵、耒县，湘潭市的湘潭县，衡阳市的耒阳县，岳阳市的岳阳县，岳阳地区的平江、汨罗、临湘、华容县，常德地区的石门、慈利县，郴州地区的资兴、郴县、永兴、宜章、汝城、桂东、安仁县，湘西自治州的大庸、保靖、永顺、桑植、龙山县，加上新从

湘潭县划出的韶山区在内为二十七个县市。三十多年来，各级政府为老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一九八五年，老区农村人口平均纯收入为二百九十三元，比一九七八年翻了一番多。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生产条件较好的丘陵地区，改善的程度大一些；生产条件差、交通不便的大山区，生产和生活都还相当困难。二十七个县共有农业人口一千二百七十五万人，占老区总人口一千四百五十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八，其中有十五个县的人均收入在二百元左右，桂东县只有一百二十六元。桑植县人均口粮不足四百斤，龙山县三分之一群众的口粮在三百斤以下。据耒阳县八个乡的调查，缺粮户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中长坪乡人均口粮一百五十斤，缺粮户达百分之九十四，该乡神岭村人均口粮不足八十斤，纯收入仅有四十五元。就是近几年经济发展情况较好的浏阳、平江两县，人均收入一百二十元以下的贫困乡还有二十一个。醴陵市是全省老区县中经济情况最好的，但仍有七个山区乡人均收入不到二百元。初步摸底，老区还有二百六十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约占老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十八。

一九八四年，国家和省政府批准全省重点扶植的贫困县为十六个，其中国家批准的武陵山区集中连片的十二个县，包括湘西自治州的吉首、大庸、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桑植、龙山十个县和怀化地区的麻阳、新晃两个县；省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增加的四个县，即邵阳地区的城步县、郴州地区的桂东县、零陵地区的江华县、怀化地

区的通道县。据省有关部门统计,这十六个贫困县人均纯收入不足二百元,尚未解决温饱的群众还有二百万人,约占十六个县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

从上述两项统计数字看出,湖南省的贫困面还是比较大的,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还占相当的比重。

## 二

新中国建立三十多年了,老区经济迟迟不得翻身,贫困落后的面貌改变不大,至今还有部分群众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甚至饮水、吃盐困难,没有房子住,过着凄凉的生活,是个很大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十年“文革”放松了对老区的支援等因素外,主要是没有解决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这些根本问题。

二十七个老区县中,还有二十多个乡不通公路,二百三十二个乡不通电话,大部分山区没有电。湘西自治州有近一半的村没有公路,三万一千人无房住(有的住山洞,有的搭茅棚),十七万五千人靠从山沟背水或接雨水吃。有些距供销点远的山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全靠肩负背驮,而且要爬山涉水,极为困难。

老区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落后状况也相当惊人。在山区,居住分散,学校少,适龄青少年上学困难。桑植县文盲和半文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六,桂东县文盲和半文盲所占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五点八,有的青少年竟不知自

己的岁数、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湘西自治州五个老区县干部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了一半。在这些地区，广播、电影、花鼓和群众“无缘”。

在二十七个老区县的各级医院里，共有病床一万三千张，平均每千人不到一张。医生素质和医疗条件都很差，花垣县有十六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没有一个是中专毕业的，湘西自治州有近八十万入患各种地方病而无医疗条件。桑植县金藏乡至今还没有卫生院，群众看病要走三十多里山路，全乡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四年五十岁以下因病死亡的人中，有二百八十四人是无法就医拖死的，近几年有好几个产妇死于去医院的途中。该县巴茅溪乡五道水村，前不久一妇女难产，不能就医，竟发生了其丈夫用镰刀、麻绳帮她做手术，造成母子双亡的悲惨事件。

没有交通，文化落后，很难开发经济，更谈不上发展商品生产。桂东县东部的林木，就因缺十五公里公路而不能开发，年年都有过熟林木烂在山上，群众说“树在山里烂，人在家里穷”。

### 三

湖南各级党政部门都很重视老区的工作，一九八四年成立了湖南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支援老区。一九八六年七月，省委又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工作的决定》，提出“力争三年时



间使贫困地区面貌有个明显变化”的奋斗目标，具体要求贫困县、乡在三年内解决温饱，基本上解决人畜饮水和无房户的住房问题，尽快使各乡都通公路，进一步改善生产条件。省厅局级九十多个单位中，已有二十八个同老区挂钩扶贫。全省已为老区安排开发项目一百一十四项，其中种养业四十二项，加工业二十项，采矿业十五项，能源开发及其他项目三十六项。这些项目完成后，可年增产值五千万元、税利五百万元。但从多数山区乡的情况来看，当前最急需的还是解决路、电、饮水和钱粮救济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是省财力所不及的。

一九八五年，中央财政分配给该省的扶贫发展资金为一千六百万，仅占全国八亿元的百分之二；银行发放的扶贫开发专项贷款三千九百万元，占全国十亿元的百分之三点九。这些钱四十多个老少边穷县分摊，为数甚少，“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省民政厅算了一笔账，去年全省共支出民政事业费（从各方面筹集的）近一亿二千四百万元，其中抚恤费二千七百五十一万元，军队和地方离退休干部经费一千七百二十八万元，社会救济费（包括定期救济和事业单位经费）二千九百六十二万元，自然灾害救济费四千二百八十九万元，其他支出（包括慰问费、事业编制人员经费、民政机关事业车辆经费）六百二十六万元。从这些开支来看，能够落实于发展生产的钱，寥寥无几。桑植县淋溪河乡去年只拿到了一千元救济费。

为了使老区尽快脱贫，省里将力争多筹集一些资金和

物资用于老区的开发和扶贫，并要求中央给予以下援助：

1. 增拨“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开发专项贷款”的数额，要求前者增加到四千万、后者增加到五千万，使给湖南省的这两笔资金占全国总额的比重都提高到百分之五。

2. 继续免征农业税五年，使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进一步安定思想、休养生息。

3. 继续实行“以工贷赈”。中央作出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三年用“以工贷赈”方式支援贫困地区的决定后，得到贫困地区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积极投工，每当一项工程完工投入使用时，就像过节一样，载歌载舞热烈庆祝。有的还挂匾立碑，赞颂此举是“党恩齐天”，是他们的“第二次解放”。省地县同志都要求从一九八八年起，“以工贷赈”再延续三年。如果中央不能继续给粮、棉、布，给工业品也行。

4.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给予优惠照顾。为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民族商业有优惠政策，如流动资金的贷款利率为百分之三点三。而对民族工业，目前国家还没有确定优惠政策，流动资金的贷款同经济发达地区一样实行百分之九的特种利率，这是刚刚起步的民族工业所承担不起的。省里有关方面的同志要求国家对民族工业也给予优惠政策，以促进民族地区工业的发展。

5. 治穷要同治愚、治病相结合。要求国家在教育 and 卫生经费方面给老区以更多支持。

# 关于开展文明生产、文明经商、 文明消费等问题的意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有一个问题建议你们研究。都说要更新观念,我看可以就文明生产、文明经商、文明消费这几个范围去探讨一下。

文明生产,过去是指车间干净整齐,生产有秩序。但文明生产还要想得宽一点、深一点,因为文明生产也是不断发展的。这里包括的范围有科技进步,管理科学化、现代化等。它的反面就是不文明,不同时期有不同标准。今天是文明的,生产发展了,明天还搞这一套,就可能是不文明的。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写点文章。

文明经商,起码应该守法。你不守法,我们不能承认你是文明的。社会主义商品交换,要讲商业道德,赚钱赚在明处。商品质量不好,又要卖高价,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短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听取株洲市委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斤少两，不是文明。文明经商还要包括信息灵通，适应人们的需要。妨碍文明经商的东西，就要抵制。文明经商的反面，那些不守法的、不文明的表现还有什么？如何克服这些现象，继续前进？这样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使我们的工作日新又日新，经久不衰。只要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就有文明经商的问题，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现在经商的文明水平有发展，但差距还很大，水平还很低，问题还很多。

文明消费，一种是物质生活消费，一种是精神生活消费。这方面也有个文明问题。就拿吃来讲，暴饮暴食就不文明。喝酒喝一点可以，喝得醉醺醺的，撒酒疯，对自己不好，对家庭不好，对社会也不好。住房子，总要干净一点，才文明。房子里总要有点书，而且真正读书，才算文明。在物质消费上，不文明的东西还很多。吃的问题上要讲营养，不一定非吃鱼吃肉不可。营养学要成为消费中的重要问题。什么年龄要什么样的营养，都要讲究。精神生活方面的文明，领域也很大。一般说，看书的人总比不看书的要文明。收入多了，生活好了，只讲吃得好、穿得好，不看书、不看报、不听新闻，这种人很难说是文明的。看书、看电影，都是精神生活的文明消费行为。但是，看书还要看看什么样的书。看健康的、有益的书，就是文明。看庸俗的、低级的东西，很难说文明。前年，出了不少不健康的小报、刊物，主题就是在女人身上作文章，把女人当玩物。这怎么能叫文明呢？很野蛮嘛。书、报刊、电影、电视等都要注意。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需要改变一些旧观念，确立一

些新观念。要围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研究哪些是文明生产、文明经商、文明消费，同时研究它的反面。我们的文明经商，不仅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不同，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学习资本主义的先进的东西，但我们社会主义的文明经商与它们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生产的时候、交换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种生产、交换是有利于人民还是有害于人民。假药、假酒就是有害于人民的。生产、经商都要考虑，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上时对人民有无好处。消费者也要养成好的习惯，无益的东西不去消费。

上述几个环节都要解决，而且不是解决一次，要不断地抓。搞生产的要文明生产，搞经商的要文明经商，消费者要文明消费。这几个文明，过去也提，但那是初级的理解。这几个概念，内涵也好、外延也好，都很广。用语明确、切实，在宣传上能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引导人们成为文明的公民。这同我们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一致的。

#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整个企业管理工作有很大进步。当然，要使每个企业都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还需要继续进步，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要继续加强。研究工作是个长期的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三十多年来，我们尽管走了很多弯路，但也确实积累、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很需要加以总结，再结合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来创立我们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应该相信，我们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谈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研究企业管理，要同宏观经济设想、战略部署联系起来，同四项基本原则联系起来。

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企业管理特色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中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我们研究企业管理特色,要随时想到这些宏观战略部署。多种经济形式,实际上也是多种经济成分,或者多种所有制形式,有全民所有制经济,有集体所有制经济,有个体经济,有私营经济,还有中外合资经济和外商独资经济。在这些经济形式之间,还有很多过渡形式。比如,发展横向联系,既有全民所有制的,也有集体所有制的;有地方的,有国营的,也有部门的。总之,几种形式互相组合,多种多样。不管怎样,我们不要忘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占优势,这一条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如果公有制动摇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会发生问题。邓小平同志讲:“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sup>【1】</sup>在公有制中间,全民所有制占主导地位,这个地位也不能放弃。个体经济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大发展,以后还要发展。它是什么性质的呢?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个体经济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也是不可缺少的。这个不可缺少很重要。人民的生活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光靠全民所有制满足不了,而个体经济在这方面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私营经济区别于个体经济,它不只是自己经营,还雇了点工,有的雇工数量还超过了国务院规定的七个人。私营经济情况也不一样,情况复杂,其中有一部分确实是私营资本主义经济,这也允许存在。只要头脑清醒,有点私营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不要去美化它。理论界有些人说它

不叫资本主义，完全没有剥削，这就不合乎事实了。关于中外合资，邓小平同志讲，一半是社会主义的，一半是资本主义的。我们的中外合资企业不同于香港的，在我们的中外合资企业里的资本主义，是国家可以监督的资本主义，或者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不能叫引进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这样一种宏观经济要长期存在，多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而在发展中间，党和国家要使其有个合理配置。合理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进行调整。我们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不能孤立地只是研究企业，甚至个别企业。如果只是关起门来研究个别企业，头脑里没有宏观布局，研究就不会全面。

研究企业管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治国的根本。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八月和非洲外宾谈话时已经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他反复讲，我们的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3】。

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4】从具有鲜明党性的两条路线斗争来讲,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防“左”、反“左”,也要防右、反右,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就是纠“左”走到了“纠正”社会主义,走到了丑化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我们研究企业管理特色,不能忘记政治上总的方向,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第二,关于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等三个条例已经正式公布,厂长的职权、地位讲明确了,党委的职责、作用也明确了。厂长同志承担这么大的全面责任,有干部任免权,还要管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兢兢业业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质,不首先学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文件,不领会中央的精神,不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从实际出发去改进企业管理工作,就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所以,担任了厂长,怎样不断地提高政治业务素质,是个要经常高度重视的问题。

党委要发挥监督保证作用。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思想政治工作地位降低了,作用削弱了?不能这样说。最近,军委有一个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那里讲,保证和服务并

不意味着削弱党委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需要加强。那个文件写得好,基本精神适用于各方面的工作,很值得我们企业从事党委工作的同志参考。我们一些报刊发表文章,设想党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非职业化,不要专职脱产人员,或者只要极少的几个人就行了。这种设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没有精干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光靠业余时间、靠不脱产的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企业很难管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使我们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有效地改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三,有些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企业精神”,我很赞成。这里只想提醒大家,务必不可忘记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前几年有的报纸提倡高消费,离开国情,没有限度地讲美化生活。生活当然要美化,但终究要看条件,不能把人们的消费胃口越吊越高。谁也不能否认,这几年农民、职工的生活大有改善了。可是,脱离生产发展的消费要求,还是多得不得了,高得不得了。据说有的地方发相当于五个月工资的奖金已经不能在调动生产积极性方面发挥作用了。所以,还是要讲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而且不是两三年,要十年、二十年坚持下去,下个世纪还要坚持下去。去年元旦祝辞,李先念同志重提艰苦奋斗,就是出于这一目的。厂风、企业精神中应该包括长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治家,勤俭办一切事业这样的意思。我们还是穷国。陈云同志讲,吃光用光,国家没希望。无论国家、地方、企业,都要努力使群众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但同时需要适当积累,只有积累才谈得上扩

大再生产，进一步改善群众生活。企业还有个自力更生问题，发展主要靠自身，不能老指望上级和国家。从国家讲，要考虑怎么使企业有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扩大的能力。过去讲百分之四十用于生产费用，百分之三十用于集体福利，百分之三十用于个人奖励。现在实际执行的结果，用于扩大再生产没几个钱，大部分用于个人福利、个人奖励。这个状况不改变不行。

我去年到湖南衡阳市的衡东县，参观一个铅锌矿厂。他们开头只有二十个人，靠二十把铁锤起家。经过二十年艰苦奋斗，现在年产一万吨，上缴税利几百万。他们经常用“宁愿自己多流汗，不给国家添麻烦”这两句话教育职工。我们其他企业的干部和职工，应该学习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看来，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设的企业精神，要从厂长做起，从党委书记做起，不是讲究享受，而是提倡多作贡献。

第四，要研究我们企业内部人和人的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内部关系，从厂长到每个普通的职工，必须是平等的、同志式的友好合作的，这样才能形成团结的整体。这里不存在雇佣、被雇佣的关系。不能因为是领导者，就高人一等。厂长的命令要执行，但这只是分工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关系和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关系的根本区别。

据说在我国的港口中，烟台港搞得比较好。经验有两条，一条是学习、吸收、运用了先进的管理经验；第二条是坚持、发展了大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大庆的经验值得珍惜。我们提倡爱厂如家。烟台港工人确实坚持了这一条。领

导在生产、学习、生活各个环节上都替职工设想，相互之间非常平等友爱。

我到过大庆两次。大庆有个好传统，领导干部处处想到工人，不是讲空话，而是实际上去办。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以及生产发展要求，凡是需要又能够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都要事先想到，而且努力做到。例如，国家曾决定从大庆调一批钻井队、采油队到别的地方去，挑的人都是最好的。出发之前，调出同志的家，从房子、煤、煤气到儿女上学、孩子入托、老人生活等等，甚至选调的人没有想到的事情，领导上都做了周密的安排。这些同志没有后顾之忧，情绪高昂地走上了新岗位。

要总结我们自己的好经验，研究企业内部的关系，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的关系。在一些根本点上，这种关系应该和资本主义企业那种关系有原则区别。我们研究的企业管理特色，准确地说，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特色。

## 注 释

- 【1】 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11页。
- 【2】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38页。
- 【3】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 【4】 同上书，第141页。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sup>\*</sup>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

小平同志经常讲，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从毛泽东同志以来，我们党一直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都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两条。对于这两条，小平同志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情况，在不同场合，有的时候侧重多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有的时候多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例如一九八〇年八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着重从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这个角度来阐发。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一样，小平同志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而且反复进行了具体深入的阐述。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些同志常常提出一个问题,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或者说多种经济成分,也说多种所有制形式,是不是可以说得通。关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多次讲,我们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也需要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允许个体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这几年,各地城乡都出现了不同数量的雇工。雇工数量在国务院规定之内的,允许存在和发展,超过规定的,看一个时期再说。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个体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中外合资,一半是资本主义,一半是社会主义;外商独资企业,是国家可以监督的资本主义,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不同经济成分之间,又有一些过渡性的、混合的经济成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我们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这是长期的方针。说其他经济成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在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上,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是有助于生产的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多种要求的。但是,怎样使它们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呢?我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好经验,需要总结、提高、推广,当然也还需要继续探索,创造新的经验。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各种经济成分之间,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调节,使之达到合理的配置,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合理配套。也应该看到,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不会自发地、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

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需要有一系列方针、政策、措施。要通过这些方针、政策、措施，使它们存在并得到发展，又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措施，有些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有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制定。

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经常遇到一个问题。这几年来职工生活确有改善，可是他们还是有很多意见。一个经常说起的事实根据是：有些个体户到国营商店买点什么，倒卖一天就拿到职工一个月的工资。他们问，这样的人，贡献真的比职工大吗？这样的分配能叫合理吗？这确实是个问题。怎样解决呢？决不能回过头去不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要让它存在、让它发展，又要有相应的政策、法律，包括税利调节分配的办法等等，以保证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需要继续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实际上，目前发展得还很不够。一九八五年有个数字，个体、公私合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企业，总产值只占全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左右。要向职工讲清楚，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人口那么多，需求是多方面的，什么东西都要全民所有制经济包下来，不可能；加上集体所有制，也解决不了。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对整个国家和人民是有好处的。当然，政策、措施也要力求逐步完善起来。不能因为改革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就否认这样一个总的方针、总的部署，更不能回过头去走

老路。

关于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今年二月十八日小平同志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有一个重要谈话。

小平同志说：“大学生闹事，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看，实现我们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望。”【1】

小平同志又说：“这些年总的发展不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学生们放假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所以，学生闹事



这类问题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更不会改变我们的现行方针和政策。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可能执行得更好。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

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

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总之，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注意经常总结经验。”【2】

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对于全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的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尤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希望同志们认真学习、认真领会，按照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要求，把我们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 要十分注意政策界限

两个基本点是互相统一的。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有一个方向问题，我们要使它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因此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内外政策的基础。我们讲建设、改革、开放、搞活，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讲改革、开放、搞活，但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想把改革、开放、搞活等现行政策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主张为资本主义平反，取消四项基本原则，来一个全盘西化，按照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改造我们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如此等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把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改革、开放、搞活统一起来，他们却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这里，原则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建设、改革、开放、搞活。对于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讲改革、开放而实际上是全盘西化的主张，需要进行批评。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界限，就是决不能把坚持建设、改革、开放、搞活中的探索乃至失误，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定要坚持建设、改革、开放、搞活。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的事业，改革、开放、搞活都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经验要逐渐积累，政策的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经过仔细调查后提出的意见，也可能不尽准确。在实际工作中，也免不了出现某些失误，免不了出现某些漏洞。因此，必须把这种情况同那种把改革、开放、搞活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格地区别开来。

中央四号文件要求不涉及现行政策。这个规定，就是充分考虑到上述情况做出的，因此是完全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有些具体政策经过实践检验，或者出现了新的情况，还需要修正、完善乃至重新制定。如果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申到这些方面，就会束缚我们进行建设、改革、开放、搞活的手脚，就会造成思想混乱。

严格区分政策界限，是保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不致半途而废、能够健康地长期地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同志反映，个别企业领导同志看到有的职工不守纪律，或者有点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包括自由散漫呀，说点怪话呀，就说，你们可不要搞自由化。有的职工就回敬说，你们搞不正之风，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互相把对方的毛病，上纲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同那些别有居心的人完全不同。但是也确实说明，严格区分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什么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这次斗争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重要保证。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十分谨慎，严格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办事。我们搞研究工作的同志尤其要头脑清醒。我们同第一线的同志有点不同。他们天天忙得不得了，我们终究处在第二线，有些问题可以多调查、多研究，把界限划清楚、划准确以后，再来发言。

## 学习中央文件，回顾历史经验， 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都要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集体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统一认识，明确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深远意义，站在斗争的前列。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以后，在中外读者中反映很好。征得小平同志同意，经他审定，正在出增订本。原来三万多字，现在八万多字，公开发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了一本书，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收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有关文件、决定和小平同志、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第三本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六十多万字。三本书合起来一百多万字，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大题目的重要文件的选编。这三本书同时学习，显然不可能。按中央通知要求的精神，还是先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大学里头，也提倡组织学生特别是教师好好学习。这对于统一认识、分

清是非，会大有帮助。书出来以后，中央宣传部准备发一个通知。至于如何组织，主要靠地方党委。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是今年一年的大事之一。可不可以设想，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间，就以这两本书，加上中央今年已经发出的以及还将发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作为党员和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上面两本书中所收文件、讲话，很多同志都看过。可是，工作一忙，对其中讲些什么，现在可能没有印象了或印象不那么深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直到现在，中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贯彻始终，坚定不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是究竟讲了些什么，有些同志可能缺乏历史的、完整的、准确的了解。认真读这几本书，可以在这方面提高我们的认识。学习要结合实际，结合自己的工作。

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希望大家都来回顾一下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八年的历史经验。学习文件的同时，结合当前的实际，回顾过去的历史经验，会加深我们的认识。我们这八年，是成功的八年，胜利的八年，不断前进的八年。我们有大量的正面经验。当然，在这中间也有某些失误的教训。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sup>【3】</sup>这个话讲得很深刻。犯了错误，得到了痛苦的经验，可以由此提高。所谓犯错误的经验，不只是自己犯错误的直接经验，也包括别人犯错误的间接经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一直头脑清醒？别人犯错误，我们顶住了没有？有的时候，原来以

为是对的，一个气候一来，自己也怀疑是不是对，因此也难免受点影响。回顾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提高觉悟，会有切实的帮助。

讲四项基本原则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刻的，是小平同志；讲改革、开放、搞活讲得最早、讲得最多、讲得最深刻的，也是小平同志。同样，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小平同志自己说，他讲得最多，也最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年的实践越来越证明，历年中央的决定和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先念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小平同志所说那些党内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议论，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是站不住脚的，需要进行批评，使大家认识它错在哪里。

一九七九年，小平同志重申和全面阐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根据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发表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九八〇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小平同志就关于起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有几次重要谈话。一九八〇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又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六中全会以后又有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七月提出四项政治保证，接着召开了十二大。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讲话的两个题目，一个是整党不能走过场，另一个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

神污染。一九八五年，有小平同志关于理想、纪律的讲话，又有小平、陈云、先念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六年，中央召开十二届六中全会，小平同志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年底又有关于学生闹事问题的重要讲话。然后到一九八七年，中央连续发出几号文件。

有同志说，我们这些人老在唱四季歌，一次又一次地说，思想政治工作的春天来到啦，也按着中央的精神做了工作，结果做着做着，就遇到阻力了，做不下去了，秋天就来了，然后中央又出来讲话。应该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党中央是坚定不移、贯彻始终的。但是，这几年间有起有伏，也是事实。经过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越来越厉害，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宽，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到了去年学潮，尽管参加的人数不多，可是就所提出的政治问题的尖锐性来说，建国以后从未有过。不少地方出现了反动标语口号，一些大字报、小字报，用刻薄的语气、尖酸的议论，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人民民主专政，把社会主义道路，统统给否定了。有的公开说，把“老马”从中国赶出去。蒋介石对马列主义、对共产主义确实是切齿痛恨、要斩尽杀绝的，当时的反共报刊，不断地进行煽动、制造谣言，宣扬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我们努力干社会主义，可是，在我们的学生中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把马克思主义从中国赶出去，把“老马”从我们思想理论战线赶出去。先是有的文章提出，接着不少地



方转载，通过大字报、小字报、游行口号加以传播，说现在要推翻新的“三座大山”：一座叫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座叫做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以来的言论；一座叫做变相的一国两制。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却越来越泛滥？回顾历史，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很有好处。只有正面教育不行，还必须有反面教育，才能够更完全、更深刻地认识真理。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思想战线大体上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揭露、批判“四人帮”，拨乱反正，批评“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赞同的，思想战线的同志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到理论务虚会后期，就发生了思想上的重大分歧。比方说，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理论，说我们不该那么早搞社会主义改造，有的主张补资本主义课。有的把“四人帮”和党的领导混为一谈。有的提出停止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至于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列宁主义也不要再提了，只提马克思主义。有一些议论集中到全面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稍早一点，有西单墙的大字报，提出要民主、要人权，甚至请求卡特支持中国的所谓“人权运动”。小平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踢开党委闹革命”，现在是“踢开党委闹民主”。有些共产党员专门写出报告支持西单墙。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讲了一篇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那个时候，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魏京生不但是西单墙的活跃分子，同时给外国人送军事情报。

广大干部、广大职工看到西单墙那些议论，纷纷表示不满，有的和贴大字报的人面对面地进行争论，批驳他们。小平同志及时地、鲜明地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稿子出来以后，曾经征求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的意见。理论界、文艺界一些同志不赞成，有的提出了自己的修改稿。理论界也有同情魏京生的。小平同志讲话中说到，中央对我们一部分理论工作者表示失望，他们辜负了党对他们的期望，很委婉地进行了一些批评。正式下发时，把这段话删掉了。

四项基本原则一提出来，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中有若干人就不满意。有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有什么区别呀！有的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四条棍子，或者说可以变成四条棍子。小平同志讲话中说，希望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分别写小册子、写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有的同志讲，谁要写这样的文章，谁就先臭掉。当时已经有这样一种空气，谁要出来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就遭到围攻、遭到冷眼。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出，究竟是党伟大还是人民伟大。还有在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上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论，叫“说三道四、左右为难”。有同志说，有了三中全会就行了，为什么还来个四项基本原则？另外一些同志讲，四项基本原则是三中全会方针的发展，针对当时理论界情况，需要讲四项基本原则，而且精神是完全一致的。“说三道四”之争，争了好几年。“左右为难”，是说三中全会是反“左”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的。争论了一二年，至少在全国性报纸上，基本上没有积

极宣传、阐述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小平同志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的报纸连续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有同志提出意见，后来一篇换了个题目，实际上还是原来的思路。乔木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说，这样的文章，用意另外的方面。这些文章在作者所在单位也引起了争论。同志们批评这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引导人们来怀疑甚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作者不接受，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出了一本书，书名就是《我们坚持什么》。

尽管有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务虚会后期出现的一些争论还在继续。争论的中心问题，还是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些报刊一再提出“政治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不仅要求给各种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以发表自由，甚至还主张给反革命的言论以发表的自由，反对所谓“以言治罪”，为社会上一小撮害群之马辩护。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受到批评以后，有人发表文章反对这种批评，居然认为提出文艺家要注意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社会效果就不好。在这同时，报刊文章也出现了其他错误提法。

一九八〇年九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修改宪法，取消了“四大”的条文。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陈云同志提出，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

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小平同志在他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专门讲了宣传战线的工作,指出宣传工作的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他说,要教育全党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并且严肃地指出,有人竟然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大公无私”等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支持和同情。

到一九八一年一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国务院又于二月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就是一律取消、禁止。有的同志曾经主张,吸收非法组织、非法刊物为作协的团体会员。有的同志说,就叫它自发组织、自发刊物。也有同志设想,这些刊物是否可以通过登记的办法加以控制。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叫它非法组织、非法刊物比较合适。关于通过登记的意见送到陈云同志那里,他不赞成,说中国这么大,情况这么复杂,你只要允许登记,他们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你,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一律禁止。

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稿的过程中,同样有很大的争论。党内讨论,应该提倡和允许各种各样的意见充分发表。党中央、小平同志反复做工作,讲清道理,决定中要写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问题，终于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决议，得到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工人、农民的拥护。我那时去河北传达，才知道一个情况，决议下达以前，连在省委机关的一些同志，都有人误认为，社会上一些贬低毛泽东同志、贬低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是得到小平同志支持的。为了澄清混乱，我们把小平同志历次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把小平同志批评那些贬低和想要取消毛泽东思想的人的讲话，特别是小平同志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重要讲话，一次一次地如实告诉大家。这样，同志们才恍然大悟，认识到小平同志是维护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的，是维护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恰当的、实事求是的批评，对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分析是非常公正的。经过党内的争论，经过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学习和宣传，使得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舆论，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中没有市场了。

一九八一年出现一个电影《太阳和人》，是否定毛泽东同志、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剧本原名叫《苦恋》。首先是军队同志提出意见。小平同志看了，认为不管作者动机如何，片子给人的印象是，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剧作者是军队干部，是党员。所以小平同志问：党性哪里去了。小平同志指出，不能上映，而且要组织文章批评。《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批评是应该的，文章总的说也写得好，缺点是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不够周到。当时的情况已经有点像后来，谁受批评就有一批人替他

打抱不平，谁批评作品的错误，就围攻批评者。的确有这样一种恶劣的空气。当时就有人攻《解放军报》。小平同志肯定了《解放军报》对《太阳和人》的批评，并且说，就请《文艺报》来组织高质量的批评文章。《文艺报》还是写了一篇文章。尽管如此，党内思想还不统一，才有了一九八一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会前，小平同志有一个重要谈话。到会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赞成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文艺界有的同志是抵制会议精神的。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同志反映，会议并没有解决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问题。一九八二年四月，小平同志提出“四有”，先在宣传部门进行传达。接着，小平同志又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了四项政治保证。在十二大的准备过程中，小平同志发表了多次重要谈话。十二大的召开，文件的传达、学习、贯彻，使党内的大多数同志，理论工作者中的多数同志，认识一致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会上的讲话》，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还说党和国家思想上异化了、政治上异化了、经济上也异化了。十月，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4】小平同志后来又说，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社会主义“异化”问题，该讲话人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信，随信附去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语

录。在准备小平同志二中全会讲话的过程中，小平同志谈到这件事，并说，马克思讲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一条是讲社会主义社会的，搬出这些东西来，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二中全会以后，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反对精神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一九八四年二月开始，就出现了否定反对精神污染斗争的声音。起初只是批评“清除”这个词。问题的实质当然不在用语。对于精神污染，用反对、抵制、克服、清理、清除、清查，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接着，就步步退让以至于全盘否定。这样，工作做不下去了，而且出现了各种谣言。到四月，首先是中央肯定了中宣部提出的对外宣传口径：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五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根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国务院领导同志共同讨论、反复斟酌、一致同意的意见，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做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

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5】尽管《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全国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但是，围绕反对精神污染问题的种种议论和谣言，还是没有停止。

一九八四年九月，经上级同意，中宣部在北京召集几十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开了一个会。会议由贺敬之同志主持。会上，有同志提出在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上说法不一。有的同志就向上反映这个说法，于是这个会被说成是“文艺黑会”。到十二月，在准备召开作协四大期间，就出现两个“不提了”：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会议主调就是这样定下来的。可以说，主调搞错了。我们要保证创作自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不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种自由就可以成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护身符。两个“不提了”、三个“失误”、三个“不正常”的讲法，不符合中央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不符合思想文化战线的客观实际，在当时那种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客观上助长了文化界主张搞自由化的人的气焰，扩大了思想的混乱。

全面否定一九七九年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后果是严重的。有同志说，作协四大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有人说，



“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这是一场居心把国家搞乱的瞎胡闹”，“你们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丢了脸！你们真蠢！真丢脸！”一些人四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艺方针，否定对《假如我是真的》、《太阳和人》等作品的批评，把矛头指向小平同志。作协四大以后，有人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作协四大传达以后，有些地方程度不同地抵制了，有些地方却把坚决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指为“清污分子”，执行中央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受到围攻、压制。这股风刮的范围不小，以致理论界和文化界在学风、文风上，在学术道德上，都出现了一些不正派的东西。

一九八四年四月，小平同志就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六月间的两次谈话，他又强调地阐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明确指出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九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陈云、先念几位常委的讲话，都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党代表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对形势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一九八六年春天以来，没有限制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有的同志讲，坚持四项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特别是七月以后，各种名目的、跨地区跨部门的大大小小的讨论会、纪念会、演讲会、座谈会，以

及某些报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畅行无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范围扩大了，不再限于思想、文艺问题，而且扩大到整个政治领域，矛头已经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指向社会主义道路，指向人民民主专政，指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这对年底学潮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几年来历史发展过程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一方面，党中央、小平同志始终坚持并针对不同时期思想界的情况及时地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全党支持坚持党的路线的同志，解决了一些重要问题；另一方面，理论、思想、文艺方面的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不听党中央的意见，甚至加以抵制，仍然讲他们自己想要讲的那一套东西，而且调子越来越高，发生的不好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这种思潮出现以后，党中央、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必须同它进行斗争，有的同志不仅没有进行这种斗争，反而采取了纵容的政策。这样，丑化和要求取消党的领导，糟踏和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可以得到鼓励、保护、奖赏，被吹起来、抬起来；维护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人民民主专政，却受到冷落、孤立、围攻。前者成了“英雄”，后者被扣上“僵化”、“保守”、“左”甚至极左的帽子。

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宣传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过于苛刻。在一个共产党执政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一个经历过六十多年艰巨复杂斗争考验、有着辉煌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共产党内，居然出现这样的现象，党中央、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复强调、一再打招呼也未能解决，而且持续数年，愈演愈烈，这无论如何是极不正常的。

回顾这段历史，首先应该肯定，党中央、小平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而且正是党中央，通过最近中央一级党的生活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作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重大决策。在这个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在正面教育中，首先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文献，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必须把政策界限划得十分清楚，方法十分慎重稳妥。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由来已久。有的同志讲，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小平同志多次讲，理论界有些人在他讲四项基本原则以前同他思想上是一致的，到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分道扬镳了。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得厉害的，是些什么人呢？现在大体上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了。一种是“文化大革命”前思想确有毛病，可能处理得重了，但是平反、改正以后没有接受教训。第二种是“文化大革命”中搞极左，“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又右到主张搞资本主义。第三种，“四人帮”的残余和“三种人”。第四种，前几年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分子。第五种，同党中央政治上长期不保持一致，抵制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党内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各自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他们的处理也应该有不同的方法。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但是，对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都应该研究清楚，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在重大问题上一个一个地分清是非。

学习中央的文件特别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常委集体的重要讲话，可以使我们从正面加深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意义和具体的政策界限。联系反面的教训，弄清自由化思潮的内容要点、思想体系、来龙去脉和实质所在，以及这些年来演变，也很有必要。这样我们就可以深入地批评这种思潮，使它不能发生影响。有了正面指导，再加上反面教员，我们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可以加深认识。今后怎么样搞，也可以更聪明了。这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识别能力，增强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本领。地方的问题，要在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点名要报请中央批准。不点名、但是影响比较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也要进行批评。

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统一思想问题。

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中央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统一思想就是要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可是到一九八四年初，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先是不提四项基本原则了，接着又把统一思想的任务改变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是出现了只反“左”、不反右的情况。在思想战线上长期只反“左”、不反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造成了条件，而且导致混淆带引号的“左”和不带引号的左，把正确的东西也当成“左”，以至于像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的，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要在企业中进行正面教育

中央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党内。小平同志讲的是党内少数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不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搞到党外去。在我们党内，斗争又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中央指出，党政军机关、城市企事业单位和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对广大党员进行正面教育。农村

不搞。这样一些规定，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作出的。

同志们在讨论中间都说，这次学潮中，我们的企业单位中没有一个单位参加进去。中青年职工里有个别的人赶去凑热闹，也有不少人学潮表示同情。但是必须看到，总的说，我们工人阶级队伍是稳定的。这说明，作为我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在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些重大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愧为领导阶级。这同时也说明，企业中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好队伍。另一方面，最低限度可以讲，在我们的职工队伍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中间，在我们研究会的一些舆论阵地上，不同程度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几年来，中央说了话，我们这个队伍积极拥护和宣传，是执行了党的方针的。尽管成绩有多有少，但是，从我们整个队伍来讲，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做了应该做的工作，起了应该起的作用。其中当然包括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同志们讲，经常遇到这种风、那种风，使得我们的队伍受到一些影响，发生同志们说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到现在还不够稳定的情形。但是，即使这样，也必须肯定，我们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而是忠于自己的职守，努力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中央说企事业单位要进行正面教育，也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包括了对于我们这个队伍的信赖，对于我们这个队伍工作成绩的科学估价。

关于如何进行正面教育，天津市作出了安排，在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大家认为有重要的启发。我想，最主要的是联系实际。要分别对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本企业职工思想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根据中央的精神作出安排。一个，学好中央的文件，通过回顾历史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另一个，摸清自己的情况。我们说，职工队伍和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稳定的，有些人程度不同地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是不是这样，影响到什么程度，表现在什么问题，都不能靠主观推测，而应该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要搞得细致，搞得准确。然后，在这个可靠的基础上用中央的精神作为武器，来解决自己这个地方、这个部门、这个行业、这个企业实际存在的问题，来进行正面教育。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有些地方、有些企业一向比较好。不管遇到什么气候，这些企业的同志照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努力提高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积极性，经济效益好，职工生活年年有所改善，厂风、店风都很好。这样的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每年的年会都表彰了一些。这只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实际上工作搞得好的企业，远远不只这些。进行正面教育，要总结这些企业的经验，推广他们的经验，从中发现确实表现好、经得起考验的优秀人物，在本企业、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宣讲。就像老山前线回来的同志那样，让有理想的人讲理想，让有纪

律的人讲纪律,让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讲自我牺牲精神,这是最能够说服人、感动人的。前几年,我们有些部门、地方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纺织部门组织纺织职工宣讲团,辽宁地区组织抢险救灾模范人物宣讲团,北京市模范共产党员的宣讲团,教育系统教书育人搞得好的先进教师的宣讲团,上海也组织过多次。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要坚持下去。要把上面说的那样一些好企业,作为进行正面教育的引路人。他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需要我们去总结、推广。当然,推广的时候,不同的企业要结合自己的特点。

很多地方的经验都证明,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抵制不正之风,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在执政党条件下,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志们反映,广大职工对党内不正之风有很多意见。确实有这样一些问题,有些企业还相当严重。所以,进行正面教育,如果请那些搞不正之风、以权谋私的人去讲,去宣传,只能适得其反。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我们在湖北开会,听天津工交系统讲全行业的党员干部怎么样起模范作用,大家都认为是个很重要的经验。我们曾经肯定他们的经验。这次开年会,同志们又带来很多这方面的好经验,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我们特意请了烟台港党委书记来参加我们的会。中央宣传部组织人到他们那里调查,认为他们的经验值得推广,准备写成材料,请新闻单位发表他们的报道。很可惜,这次时间太短,不能够请他们的书记同志讲一讲。我听别的



同志介绍，扼要地说来是两条：一条，继承和发扬大庆的经验；再一条，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这两条结合起来。这个经验的确很好。

希望同志们在学习兄弟单位先进经验的同时，也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

## 注 释

- 【1】 邓小平：《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04—205页。
- 【2】 同上书，第205—206页。
- 【3】 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58页。
- 【4】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40页。
- 【5】 《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1984年6月2日第1版。

## “说资本主义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没事”这种说法对吗？\*

（一九八七年四月上旬）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后，有的同志惑于某种表面现象，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的挨批，干资本主义的没事”？他们认为，方励之等人只是口头上说资本主义好，并没有什么行动；而那些“干资本主义”的，就是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城乡个体经济、雇工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外商独资企业等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不但不批，反而允许存在并适当发展，这不是有点矛盾和不太公正吗？这种看法，有没有根据、有没有道理呢？让我们透过现象来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

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说资本主义”，是怎么“说”的呢？无论是方励之还是王若望、刘宾雁，他们都不只是一般地宣传资本主义的这个好或那个好，而是认为整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

个社会主义制度根本不行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错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失败”了。他们口头上也讲改革、开放，但是，他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想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公开鼓吹中国要“全盘西化”，要按照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全面改造我们的社会—政治结构。这当然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在明明白白地宣扬一种政治主张。而且这种“说”的结果，已经给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人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混乱，造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一九八六年底遍及二十八个城市的学潮，尖锐地提醒了人们，对于这种“说资本主义”的人绝不能掉以轻心。如果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会招致何等严重的恶果！我们大家都应从中得到教训，就是对“说资本主义”的，即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必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进行批评。因为，这确实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以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不刹住这股风，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

至于在经济生活中，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允许某些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则是性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把这些现行政策允许的、并已行之有效的做法，笼统说成是“干资本主义”，至少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应该加以澄清。

目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物质技术基础还不够发达，生产力发展水平总的说来还比较低。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主体，但单一的公有制毕竟还

不可能囊括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人口那么多，需求是多方面的，什么东西都要全民所有制经济包下来，不可能；加上集体所有制，也解决不了。因此，非公有制的经济成分还有存在的客观根据。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在很长时期内，需要各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在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也指出，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这是总结了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几年来城乡改革的新鲜经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经济和少量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它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在的个体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相联系的，不同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联系的个体经济。它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它不会动摇而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样，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邓小平同志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的谈话中说：“合资经营，外国资本占一半，另一半是我们社会主义公有的，至少发展了一半社会主义经济。一个企业办起来，企业的一半收入归社会主义所有，

国家还可以从企业中得到税收。”<sup>【1】</sup>合资经营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我们是可以监督的。外国独资企业，就其本身来说是资本主义企业，但它要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因此也是可以监督的资本主义。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需要继续发展，这对我们整个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实际上，目前发展得还很不够。个体、公私合营、中外合资、外商独资的工业，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据一九八五年统计，总产值只占全社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左右，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在我们的共和国刚刚诞生时，即一九四九年，原有工业固定资产不过一百二十四亿元。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五年累计，工业中全民所有制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新增固定资产加上流动资金，已经在一万亿元以上。而这几年来吸收的外资，到去年年底也不过二百零六亿美元。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它们今天不会、将来也不会左右我们经济的全局。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在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存在，按照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它加以规范和引导，使之为我所用。邓小平同志指出：“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

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sup>【2】</sup>这样做，不会动摇而会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几年来，经济特区和许多沿海开放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实践，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有些东西是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又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个体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商独资企业，不会自发地、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需要有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措施来保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并真正成为这样的补充。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措施，有些需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完善、配套，有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制定。目前，由于我们的某些具体政策和管理措施一时还没有跟上，必要的法律条例还没有或来不及制定，这就使投机倒把、行贿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有机可乘。城市中有些个体商贩和私营企业主，钻我们税收政策和管理制度不完善的空子，牟取暴利，他们的收入同其他社会成员间的差距很不合理甚至过分悬殊，造成了群众的不满。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工作跟不上，政策跟不上，势必出现这样那样的真空或漏洞，个体经济就会按照自身的经济特性进行活动，合资企业也会按资本主义企业的那一套进行活动，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都会按照各自的经济规律进行活动。这样的情况，当然应该加以限制和监督。但是，决不能因此就不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要让它存在和发展，又要有相应的政策、法律，包括税利调节分配的办法等等，以保证它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必

要和有益的补充。

应该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工作的改进，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减少的。当然，要完全消除恐怕一时还难。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者暂时还没有解决好，就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经济形式长期并存这个总的方针，更不能回过头去走老路。对于有人提出的为什么不批“干资本主义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冷静地加以研究，正确地进行解释。中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要联系经济改革、农村政策”。这一方针，我们要切实注意。

总之，我们要牢牢掌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我们既要坚决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又要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我们不赞成把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的错误，一笔淡化为仅仅是“说”资本主义；也不同意给那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扣上“干”资本主义的帽子。因为它们都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 注 释

- 【1】**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117页。
- 【2】**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59页。

# 全社会都要关心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

在座的同志以及其他从事少儿工作的同志，为新一代的成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并通过你们向全国从事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

第一，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全社会，要进一步更好地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这些年来，团中央、妇联等部门开展少年儿童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支持，有很大进步。但是，应该做到的、能够做到和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还有很多。

父母一代希望孩子比自己更强，成长得更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类能够进步，就和这个有关。我们都有这个愿望，但是，这个愿望能不能很好地付诸实施，却又是另一回事。比如说，大吃大喝的问题在有些单位还没有刹住；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少年儿童思想教育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些单位已经有了不错的汽车,还要换更好的汽车。为什么不按照中央的指示,坚决扭转这种风气,把这些钱用于教育我们的孩子们?为什么不省下钱来用在中小学建设上?为什么不用在办好托儿所上?为什么不用来为中小学教师盖点房子?办于国于民都不利的事,是只管自己不顾后代的做法。现在独生子女成为家庭骄子,如何养育好、教育好,需要好好研究。北京市少年儿童的福利事业和文化设施比过去多了,但按照九十七万儿童的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这些事实都说明,关心后代,培养合格的新一代,我们做了一些事,但是实在没有理由满足。还要继续努力呼吁和宣传,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为孩子多做好事。我们要广为宣传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使社会各方面乃至每个公民都关心这个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人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工作就好做了。

第二,教育应该是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一些国家同我们的教育来比有一个不同。他们的孩子,有的上学时候就知道毕业后自己愿意干什么,能够干什么。我们的孩子从小自然也有自己的爱好,但到了高中毕业,考上个什么大学、什么专业,或者考不上大学,自己能干什么,并不清楚。这涉及到教育改革问题。是不是可以从小学开始,分阶段培养,通过实践教育,从小逐步养成自立的能力和习惯,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一部分人上高中,毕业后考大学,另一部分人上职业学校。有些人有这样那样的兴趣和特长,要发挥他们的才能,学会动手动脑筋。我们培养的人,

不仅要有通材，而且要有专材；不仅有知识，而且会实际地干。这件事，不能急于求成，但我们的教育要考虑这样的效果。中国到下个世纪初，也不可能人人都上大学；就是上大学，也要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本领。有些学校条件好一些，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试验。家长要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引导，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特长。

第三，保护少年儿童成长的问题，这几年越来越具有紧迫性。罪犯年龄有下降的趋势，这当然有社会的责任，例如不健康的报刊、音像出版物的影响。对出版物，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管起来。孩子们读书，读什么，怎么读，家长要关心，教师要关心，共青团的同志和少先队辅导员也要关心，以保护少年儿童不受毒害。园丁不仅要浇花，而且要治虫。一方面给年轻一代好的、丰富的精神营养，另一方面对毒害少年儿童的现象要及时提出批评，提出抗议。确实有少数人，为了几个钱，编造、出版、贩卖毒害少年儿童的东西，给孩子们心灵留下的影响，一辈子都难以治愈。不知世事的孩子，往往学好难，学坏容易。很多同志讲，我们做了几个月的工作，一部不好的电影，一个手抄本，就要使你从头做起。所以，我们要共同承担责任，保护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

第四，老师重视、父母也要重视少年儿童的思想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许多少年犯罪的原因，其中重要一条是家庭不和或教育不得法，家长不能为孩子做表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要互相配合。家庭教育

---

是个重要的环节,即使文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家庭教育也少不了。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比自己强,但究竟怎样去做,没有好办法。这需要学校给他们传授知识,和他们共同负责,把孩子们保护好,教育好,培养好。

# 党政职能分开， 党要管好党\*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九日、二十日)

我们对过去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不能全盘否定，几十年来它起过积极作用。我们在工业、交通、商业等方面取得的经济成就，是有目共睹、谁也否定不了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越来越暴露出自己的缺陷和问题。党委的时间、精力，大量耗费在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上，想管党也管不了、管不好。很多企业党委、基层党委，一年当中，讨论经济工作、生产计划、工资奖金、生活服务的时间很多，而讨论思想工作、党的工作却排不上一两次。不仅企业党委、基层党委、区委一级是这样，再往上也差不多。同时，由于党委包揽一切，也削弱了生产指挥系统，甚至出现生产无人负责的现象。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四次年会上的发言要点。

实行党政职能分开的目的，企业里推行厂长负责制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生产上无人负责”和“党不管党”这两方面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使厂长成为法人代表，对工厂的生产和经营切实负起责任来，这是管理现代化企业所必需的。这方面我们谈得比较多，但是，对另外一方面，就是党要管党，谈得不够。近几年来，党风方面的问题很多，要自上而下地解决这个问题。党不管党的局面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这次政治体制改革，要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企业要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党委起监督保证作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把党管好。这项改革对我们党的前途和命运意义很大。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

这几年来，在北京和外地，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对党风提了很多意见，有的还提得非常尖锐。这说明党风不正已经使我们党的形象、党员和党员干部的形象受到了损害。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纪委作了个报告，讲到：在八千人大会以后，因为经济等问题受处分的党员有十五六万人，其中地市级以上干部七百多人。这个数字值得警惕。建国初期搞“三反”“五反”运动，受处分的党员大约两万人，其中地市级以上干部没有多少。现在有这么多人出问题，还不触目惊心吗？还不应该有危机感吗？

认清了党不管党的危害性，认清了党要管党和从严治

党的重要性、迫切性，才能谈怎样改的问题。党的建设和政治路线的执行历来是统一的，分不开的。我们要在执行党的总路线、总任务中，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来建设党、管好党，关起门来搞不行。当然，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得花很大的力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使基层党组织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每个党员真正在群众中间起先锋模范作用。

对党员干部，要有一套适应形势需要的、科学的管理方法。比如，怎样管好党员厂长？他是一厂之长，具有法人代表资格，有关生产和行政领导上的事，党委应该支持，不要去干预；但他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党组织可以而且应该要求他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他应该像每个共产党员那样遵守党章、党纪，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一个共产党员，立志为共产主义而献身，起码应该做到廉洁奉公。在座的同志都是党的工作先进单位的代表，想来对此不会持异议。现在社会上对我们的一些党员不满，主要由于这些党员利用职权刮不正之风，不能做到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一些老革命、老党员，在战场上不愧为英雄，在敌人面前经受了考验，但改革开放以来，在金钱、美女面前却经不起考验而犯了错误。个人为贪一点小利，就置国家几十万元、几百万元损失于不顾。这样的问题如果不管，那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可忧虑了。

还有，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经济，有些党员在乡镇企业工作或是个体经营者，有些党员经常与外商打交道。他们有劳

动收入，也有非劳动收入，情况比较复杂。对这些党员应该怎样要求呢？可不可以作出规定，这些党员不能谋取非法收入；并把收入状况向党组织汇报，该交税的都依法向国家交税？

中国的命运，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这个党的状况。只要有好的党员，好的干部队伍，好的党组织，什么事情都好办，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革命战争时期是这样，经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

陈云同志说过，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过去我们的党委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陷在具体的行政事务工作中，没有多少精力和时间管党的建设。今后实行党政职能分开，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地方党委和企业党委都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管党风和党的建设。如果我们经过六七年的“从严治党”，党风和党的建设有很大的进步，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了，那末，党和国家面貌就会大变样。

党政职能分开后，党委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的责任不是减轻，而是加重了。现在有少数政工干部有一些怨气，这同一些实际问题如地位问题、工资问题、专业技术职称问题等未能及时解决有关。这些问题会逐步解决的，但是，根本的是要解决思想问题，要想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如能这样，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个人一时的地位、名誉、得失了。同志们反映，社会上有些人轻视甚至讽刺党委工作

---

干部、政工干部。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为党的形象争光，改变社会上一些人的错误看法。这里用得着马克思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

---

#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 表述历史\*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四日)

我们要学习党的十三大文件的精神,回顾历史,用以指导《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工作。十三大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主要是正确认识国情、认识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我们要如实地认识我们的历史条件、历史实践,从而真实地、准确地反映历史发展的面貌。换句话说,就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表述历史。这不是说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政策套过去的政策。当时有当时的条件,根据那个条件确定那个时候的政策。有了今天的认识,有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的条件是什么,当时的政策对不对,实践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今天有今天的条件,我们根据今天的条件来确定今天的政策。不能因为今天的政策发展了,前进了,更完善了,就说过去的政策都不对。刚才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会议地方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发言讲三大改造，有许多好意见。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体私有制（包括农业、手工业），一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和今天条件下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有很大不同。今天我们对个体所有制和私营经济采取了适合今天情况的政策。恐怕不好简单地用今天这样的政策回过头去评价三大改造。因此，我不太同意昨天有的同志讲到的一种意见，即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卷的题目改为当代中国私营经济。我主张还是用原来的题目，写到改造为止，就是写那一段历史。至于今天的私人经济，如果有兴趣，可以另外去写书。把两种历史条件下的不同的私有经济合成一本书，用一个标题，恐怕越写越困难。

黑格尔讲，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说出当时历史条件下说不出的话。每个历史人物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做他所可能做的事。研究历史，需要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哪些事情提到面前了，是怎么解决的；无非有正确的解决，有错误的解决，有经过弯路、经过曲折终于解决了，或者经过多少曲折还是解决不了，留给后人再解决。把这样的历史条件、历史实践、历史发展，如实地、准确地写清楚了，再现出来了，我们这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用今天条件下对于今天问题的解答去剪裁历史，当作过去条件下产生的问题的答案，那就没有历史科学了。痛骂过去的幼稚、愚蠢，这不是历史科学。当然，我们不隐讳过去的幼稚、愚蠢。比如，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把小

业主当做资本家，当时就是不正确的。这个错误，后来纠正了。政策也有灵活性。对个体手工业改造、农民的合作化，也要具体分析。刚才安徽同志讲，不仅高级社要具体分析，初级社也要具体分析。土地私有制变成土地公有制，这是我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巨大成绩。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那一阵子，有一种意见，认为只是土地联产承包制不行，还要进一步动摇土地公有制。现在看得更清楚了，如果动摇了土地公有制，再前进就很困难了。很多同志都讲，有一个“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成为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同志讲，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单干。这个说法不合适。我们还有公有制基础，搞得好的，还有两级经营。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大量农田水利建设，还是公有的。还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种情况下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怎么能够说等于过去的单干呢？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发生了如何继续前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尤其不能动摇土地公有制。我们通过三大改造实现了土地公有制，具体工作中毛病很多。我们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从互助组到初级社，是发挥了创造性的。到高级社呢？不能说没有创造，结果多数情况下创造得不大好。初级社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实行集体劳动，保留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照顾了农民的私有性，又引导农民走集体经济的道路。这的确是发挥当时农民发展个体经济和发展集体经济两种积极性的好办法。要把初级社阶段该肯定的经验研究得充分一点。初级社也有毛病。也要研究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转

得好的，尽管这是少数的。确实转得好，需要把经验总结出来。转得不好要把教训说清楚。关于人民公社，中央已经有正式结论。

我赞成湖北、安徽同志的意见：没有三大改造，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习十三大文件精神，要体现在我们的书里。如果根本否定了三大改造，那初级阶段理论从何而来，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呢？

有同志说，统购统销完全搞错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当时，我们搞国家工业化，工业人口、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对粮食的需要急剧增长，而粮食的供应，国家除了掌握公粮的部分以外，供销主要靠城乡的粮商。他们从农村购买粮食，压低收购价格，运到城市高价出售，而且往往囤积居奇。这使城市粮食供应遇到很大困难。党中央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对粮食、油料、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城市人民用粮实行平价供应。粮食的平价供应，还包括经济作物区、林区、牧区和一切缺粮区。这样的政策，长期保持了粮食供应的稳定，并且从流通领域中排除了经营主要农产品的私营商业，切断了商业资产阶级与城市和农村的联系，大大促进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这种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当时又叫农产品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政策。这几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统购统销的办法，是做得对的。但是，连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也不提了，甚至进行批判，我看不妥当。现在我们对粮食进行合同订购，据我看，实际上也是一种计划收购。至于城市和经济作物区、缺粮区的定量供应，

还不是计划供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绩。有同志问，过去有没有改革？我认为，土地改革、三大改造，都是改革。但那些改革是根本制度性的涉及面更宽的社会改革。因此，不能用今天的改革简单地衡量过去的改革，不能因为今天这样改，过去没有这样改，就说过去全改错了。开放问题也是这样。外贸部有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前几年曾经表示，不同意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闭关自守，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一百五十六个项目，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帮助搞起来的，现在还在发挥作用。当时对社会主义各国的贸易，占我们整个对外贸易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不能说那不叫开放。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批评美国很尖锐，同时也讲，我们还要同美国做生意。美国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不是我们不想对它开放，是它封锁我们。就是那时，我们也还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有经济文化往来。在反华势力的封锁下，中央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因此，今天回过头去做出结论，指责我们是闭关自守，自己把自己骂一顿，这就不合乎历史。后来形势改变，联合国恢复我们的席位，中日建交，中美建交，形成新的外交格局，才能提出和执行今天的开放政策，才能愈来愈开放，愈来愈发展。这样一些问题，离开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条件，摆弄一个空洞的结论，我看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经济上，还有政治上，都能够搞得这样好，以至延续下来，这在社会主义各国中是没有的，值得中国共产党骄傲。不要把我们过去的东西说得太过了，要写出本色，既不要涂脂抹粉，也不要往自己脸上抹黑。该否定的不敢否定，不好；该肯定的不敢肯定，也不好。对溥仪、溥杰这样的人物，对日本战犯，对国民党战犯，对旧的统治阶级，我们的政策是成功的。对于我们的卓有成效的创造，对于我们付出很大代价取得的宝贵经验，应该大书特书，当然决不能吹牛，而是如实地、理直气壮地载入史册。有错误，不隐讳，不害怕揭露。该肯定的，也不要动摇。不能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实行新的政策，就要把过去说得一无是处，什么都不对，甚至好像中国什么都不行，民族不行，国家不行，人民不行，制度、党都不行。自己把自己骂得一钱不值、无地自容，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 决不可低估或忽视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过武装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同时也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在武装颠覆方面,先是美国发动侵朝战争,武装封锁台湾海峡,接着进行侵越战争,一九六二年制造了古巴危机。与此同时,在一九五〇年,艾奇逊、杜勒斯就提出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将近四十年来,美国当局换过不少领导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也多次轮流坐庄,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方针一直没有变。一九五九年,肯尼迪等提出美国政府要“提供一套更加灵活的经济工具,以推动铁幕后的和平变革”。一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九八三年，美国国务院制定了“促进在社会主义政权下发展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新策略，接着尼克松先后发表了《真正的战争》、《真正的和平》、《必须使东欧获得自由》、《不战而胜》；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了《共产主义大溃败》；布什上台不久，就发表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最近又发表《走出遏制》。他们的具体策略有变化，但“和平演变”的根本战略始终在坚持；步骤有先有后，但最终目的没有变，这就是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消灭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力量，以实现资本主义的世界大一统局面。

总起来说，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的认识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确实还有不少同志对这一战略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这当然有一定的历史的客观原因。一方面，这一战略在我国产生影响有个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一战略的影响下，我国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造成的危害，也有一个逐步暴露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十多年来，我们对同“和平演变”相呼应并且紧密联系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认识和斗争，大体上有三个段落。

第一段，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底。粉碎“四人帮”以后，实行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可以说，在全国形成了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极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但是，这个统一战线很快便发生了分化。从西单“民主墙”到理论务虚会，一部分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发表了许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人民民



主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可以说,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形成一股思潮。当时在北京,在全国一些地方,纷纷冒出的各种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表现得尤为猖獗。最集中的是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同年十月,他又在全国文学艺术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一九八一年一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有所收敛,非法刊物、非法组织也被取缔了。但是,有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仍然以各种方式贬低和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一九八〇年起,邓小平同志为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曾作过多次讲话。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给予了科学的正确的评价。会后不久,党中央又召开了思想战线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讲话,指出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问题是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一九八二年四月,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以“四有”(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为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同年召开了党的十二大,通过对十二大报告精神的学习贯彻,党内从事理论工作的大多数同志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问题的认识趋于一致。可是到了一九八三年,有些同志又把几年来关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宣传推向了高潮,提出所谓社会主义“异化”论,说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异化”,产生它的“对立面”。同年十月,党召开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会议通过的整党决定提出,要把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作为整党的一项任务。邓小平同志在这次会上还强调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批评了当时包括宣传抽象人道主义的一系列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讲话中提出,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是,反对精神污染,搞了二十天就夭折了。以上可以说是第一个段落。

第二段,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上半年。由于对精神污染的步步退让,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滥起来。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召开全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有的同志说,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又说,清除精神污染有“三个失误”,有“三个不正常”。这就不能不助长文艺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的气焰,扩大了思想界的混乱局面。在这次会议上,不少人否定过去对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批判。一九八五年五月至六月,邓小平同志作了两次讲话,又强调地阐述了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的问题，明确指出，在中国搞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年九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中央几位常委在讲话中，都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对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一九八六年春天以后，思想战线又出现混乱。有的负责同志不加限制地反复讲宽松、宽容、宽厚。特别是七月以后，在各种名目的跨地区、跨行业的讨论会、纪念会、座谈会上以及某些报刊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畅行无阻，占领了相当一部分舆论阵地。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扩大了，不再限于思想文化问题，而是扩大到政治领域，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以及依据这些原则确定的国家制度。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强调，要长期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至少要坚持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第二个段落，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一九八六年底学潮的发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诱发、催化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于一九八六年底，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对反对自由化作了部署。可是，没想到搞了几个月，赵紫阳同志来个急煞车。对坚决反对自由化的人进行压制、打击，把他们的正确意见斥为僵化保守，以致他们撰写的反对自由化的文章也无处发表。而对某些搞自由化的人加以支持、收容和重

用,让这些人参与重大决策的咨询和谋划,使他们能够在我国的思想界、文化界、理论界、新闻界、教育界占领阵地。

第三段,从一九八七年下半年到现在。由于赵紫阳同志对搞自由化的人的怂恿和支持,使自由化思潮恶性发展。在搞自由化的人的鼓动、策划下,终于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当时,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得意忘形、利令智昏,认为中国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可以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他们错误地估计了我国人民的力量、共产党的力量、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在这场生死搏斗中,我们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从而捍卫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避免了我国历史发展的一次大倒退。从四月十五日学潮开始,经过动乱、暴乱和平息暴乱,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这难忘的七十天里,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有着极其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1】

前面讲的三个阶段,有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过程,以及对它的认识和斗争,主要是从思想政治领域讲的。这当然绝不是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经济领域毫无影响。事实上,它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理论方面造成了不少混乱。

一九八六年二月间,赵紫阳同志有一个批示:批判经济理论方面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大胆探索。提出批

评确实要慎重是对的，但允许不允许批评明显属于自由化的言论？探索需要大胆，但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要不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赵紫阳同志的这个批示，再加上他一再定框框，划禁区，反对批判经济理论的自由化观点，实际上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泛滥开了绿灯。由此造成的思想理论的混乱，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是极为不利的。

我初步想了一下，感到下列几个重要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作出正确回答的。

(1) 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无限制地发展私营经济，搞私有化？

(2) 是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还是否定计划，实行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的自由贸易经济？

(3) 中国是否需要培植一个以企业家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让他们在社会上占有超越群众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

(4) 关于“通货膨胀有益论”和“赤字无害论”的问题。

(5)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腐败不可避免论”的问题。

(6) 关于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能否引入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的问题。

(7) 关于在经济管理方面能不能“以夷制华，不怕丧权辱国”的问题。

(8) 关于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再认识”中发生的歧见，特别是两种制度的所谓“趋同”问题。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同志和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谈话。据海外报刊报道，弗里德曼说，中国改革的关键是给赵紫阳充分授权。他按照赵的意思，说如果一个领导人没有被充分授权，很难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弗里德曼所谓授权要办的事，就是六个字，即“自由、私有、市场”，说中国的出路就在这六个字，也就是要实现美国式的经济制度。当时陪弗里德曼见赵紫阳同志的一个华人教授，认为弗与赵的观点是一致的。国内也有人主张：思想上自由化，经济上私有化，政治上多元化。总而言之，到了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之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范围和严重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恶果已经从七十天的动乱中痛切地感受到了。从这次风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待改革的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谓的改革，其实质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

这场风波再一次证明毛主席所说的，思想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推翻一个政权，要先造舆论，革命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这些科学论断，对于我们冷静地思考过去和未来，深入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决不能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看成只是少数文人舞文弄墨，成不了大气候。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放松警惕和

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被颠覆,我们社会发展的方向被改变,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并不是不可能的。现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这种斗争今后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我们决不可以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我们要尽一切努力,防止他们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对群众,也有个深入的思想教育的问题。

我今天在这里着重回顾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认识和斗争的过程,目的是想和同志们一道来思考这个问题,共同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这七十天的经验教训,以利于我们提高认识,做好工作,共同前进。

## 注 释

- 【1】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04页。

## 在《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 编写工作总结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已经经过六七年，地方卷也有五年了。随着工作的进展，掌握的材料愈多，研究愈深入，愈感到编写这部丛书的重要。最重要的是得出一个看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确实为国家、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尽管经过多次挫折，也有过重大失误，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的成就。在全体会上、分组会上，以及个别接触中，听到同志们说，参加编写的时间愈长，工作进行得愈多，对这项工作的感情就愈深。这种感情确实不是一般的感情。这不是个人的著作而是集体的著作，是对党和人民这个伟大集体在三四十年中的历史创造、丰功伟业的文字实录和科学总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为国为民造福的事业。我们能够把这样伟大的事业呈现、表现、再现出来，是值得高



兴的。读了这部书的同志，从中受益的同志，会对全国从事《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的同志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部书从开始到完稿，遇到各种困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间国内先后掀起了几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们散布的主张，同我们的丛书是针锋相对的。正如中宣部报告中所说的，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要再现几十年来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让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反对的恰恰是这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认为中国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这个事业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步骤和工作基本上是错误的，没有取得任何值得称赞的成绩。有位年轻的博士发议论时说，共产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遗产。旁边有人说，这个话是不是说得过头了？另一个人却说，一点也没有过头，恰如其分。但是，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了这股思潮，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对人民、对历史严格负责地把编写工作坚持下来了。同志们没有动摇社会主义信念，没有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如果展开一点回顾，一九八三、一九八五、一九八六、一九八七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以及今年的动乱和暴乱中，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间在建国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问题上，都存在根本的对立。邓小平同志把这场斗争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地方卷的出版发行，正好遇到从学潮到动乱、暴乱。在这样一种尖锐

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中，同志们把编写工作坚持下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得愈来愈多、愈来愈好，使丛书一卷一卷地定稿、付印、发行。这证明我们参加这部书工作的同志，对党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满怀信心、满怀热情，我们拿出的成果，和中央对建国以来四十年所作的基本总结，精神是一致的。这对参加《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工作的同志来说，是最高的报酬，最大的安慰。

第二个问题。就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关系谈点意见。

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基本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取得的革命成果，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的高度概括，是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是亿万人民为实现崇高理想而坚持斗争的活生生的现实，是决定国内外各项政策的基础。

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接触的大量材料提供了充分的事实证明，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都包含着自我完善的要求。这些年我常想这个问题，怎么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具有丰富的内容。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要发展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从毛主席到邓小平同志，提法都是一贯的。而在实践中表现的具体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每个时期都有新的发展。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重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作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解释。拿这些解释对照今天的现实生活，就可以发现四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与原来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发展。

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来讲，一九七九年讲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所有制而言，当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产值占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经过十年，我们仍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同时存在、发展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还有中外合资企业、外方独资企业，以及各种不同的混合经济、过渡形态的经济，这比一九七九年就大不同了。

有人说，在新情况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很难说，既然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经济、外方独资经济，让它们存在并允许它们发展，这怎么能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呢？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从实际出发来坚持基本原则。既坚持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又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这是我国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独资经济确实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就应当允许它们得到相当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认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独资经济、合资经济自然而然地会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基础上，针对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政策，进行管理，加以引导。许多同志反映，一个时期内，对这方面的政策注意研究很不够，甚至有的措施不当。如征收所得税，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得税是百分之五十五，集体经济百分之四十五，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百分之三十

五。这个问题长期不解决,就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之间形成不平等竞争。这种反映不是没有根据的。

还有一个商品经济问题。一九七九年初,陈云同志发表了一篇内部讲话的提纲,叫做《计划和市场》。基本论点是说,苏联也好,中国也好,过去只讲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都缺少一条市场调节。同时讲,我们不少搞企业的同志,不懂得也不愿意运用价值规律,是大少爷办企业。他的文章明确解释,所谓市场调节,就是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起作用;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就要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因此提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有改革的必要。这样的观点后来被愈来愈多的同志所接受。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的、理论的障碍,逐步地被排除了。可是又发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拒绝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进行具体分析,只承认两个东西的共性,否认它们各自的特殊性。

总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有很多问题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实践。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包括的内容也已经有了新的变化,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我们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根据新的情况做出了新的规定,增加了许多的新内容,特别是第三次修改宪法。以这个根本大法为依据,这些年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令,逐步加强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

坚持党的领导,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在坚持中有很多

发展。首先是批评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党中央重申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人不赞成，说四个现代化不能分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它的目的、实现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方向。组织路线方面，一九八〇年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和实行离退休制度，实行新老交替，提出干部“四化”原则。这就说明，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在坚持中改善，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更加坚强。十年来，我们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取得了新的经验，但也有不少新问题需要继续探索。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我们一向说，马列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1】</sup>正是依据这个基本结论，我们党提出了从八十年代起要完成的三大任务，适应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要求，逐步实行

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重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种文件、决定，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十年来，在我们党、政府和军队工作的各个方面，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对这些发展，邓小平同志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关于这一点，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中，已经有全面的概括。

说这么多话，意思无非是说，四项基本原则决不是空洞抽象的口号，决不是穿鞋戴帽的套话。改革开放是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无非是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如果停滞了，不能解决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解决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过程中的各种改革要求。我们从过去的实践中需要吸取一个教训：在制定一个具体政策、实行某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时候，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执行过程中，要经常总结，看哪项改革、哪项工作、哪项制度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哪些偏离了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把四项基本原则只看成始终不变的条文，作为有时候用一用的政治标语，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各项事业就可能出现曲折，就不能顺利进行，也就谈不上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三个问题。就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形势问题向同志

们介绍一点情况，说一点看法。

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动乱暴乱的发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决定的。

从国际大气候来讲，帝国主义要颠覆、毁灭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现在比较清楚了，我们的认识也比较一致了。用武力干涉、进攻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手失败以后，他们的重点转到“和平演变”，但是并没有放弃武力。帝国主义内部有矛盾，有斗争，可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有一致性，并且采取了联合行动。当然，实行“和平演变”，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分工，又会暴露新的矛盾。目前，对中国，对东欧，对苏联，在“和平演变”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协调行动、联合进攻的。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我们要对付的不仅是一个美国。七个西方重要发达国家对中国联合进行经济制裁，当然在用语、步骤、分寸上各有不同。他们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问题上联合一致，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这样就给他们提供一种可能，可以各个击破。东欧政局逆转，是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谓“新思维”，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潮也起了明显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最近讲，看来世界大战还是打不起来，但是小战不断。我们要通过斗争保卫世界和平，争得长期国际和平环境来进行建设。邓小平同志跟尼克松讲到去年那场风

波，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太深。美国人打如意算盘，以为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我们就会屈服。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讲，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责备中国是不公平的。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发奋图强。你们支持“人权”，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只能是由美国采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

当然，我们不能听任他们摆布。他们来做生意，我们欢迎；如果他们搞渗透、颠覆活动，我们要高度警惕。美国特使两次来北京，实际上恢复了中美两国部以上的来往，美国人解除了某些军事技术出口的禁令，表示不反对世界银行向中国贷款。我们宣布解除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下一步怎么样，还要看，准备两手。我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干涉别国内政，也决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在发展国家关系和对外开放中，决不能放松对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放松反“和平演变”的教育。不能对帝国主义抱幻想。总的说来，国际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抗争，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今后还会有起有伏。几十年来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他们要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大一统的野心不会



改变。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也许会有变化，但是，要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几十年来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有一本书，叫做《1999，不战而胜》，还有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大失败》，又有一本书叫做《历史的终结》，说的都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共产主义运动。最近，美国当局又提出什么“超越遏制”，说的就是要以武力威胁为后盾，挥舞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帜，来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我们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密切注视和应付尖锐复杂的国际阶级斗争形势。

说到国内，首先要看到，大陆搞社会主义，国民党还统治着台湾，香港其实是英国在实行殖民统治。大陆经过三大改造，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了。在台湾，在香港，剥削阶级、剥削制度还完整地保留着。恢复行使香港和澳门主权后，它们的制度五十年不变；大陆和台湾统一以后，它的制度、生活方式也不变。这些地方的剥削阶级将长期存在。他们的内部当然不是铁板一块，多数是赞成祖国统一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香港有人要搞国际化，台湾有人要搞“台独”。那里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中的敌对势力，同国外敌对势力一起支持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国内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最近又收罗、保护、豢养外逃的动乱分子、暴乱分子，不断进行反共宣传。香港基本法草案，请香港人提意见，有人主张各条各款都修改，概括起来说，还

是维护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的殖民统治，其中包括拒绝我们的军队进驻，企图保持英国在那个地方的军事存在等等。过去说，台湾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很多事情美国人做不方便，就要通过台湾来做。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通过香港进行活动。我们曾经反复强调，不能使香港成为反对中央政府的基地。实际上他们就是要把香港搞成这样一个基地。各种反共反华报刊，在这里长期存在，还在继续增加。他们利用这些报刊散布反共情绪，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收集情报，和国外反动势力紧密串连、互相支持。西藏境外有一个达赖集团，外靠国外敌对势力，内联境内民族分裂分子，三十年来一直在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这些都值得我们严重注意。

至于说到大陆，也有各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在中国大陆，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制度，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不再存在。但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

第二种情况。一些人对旧的剥削阶级的影响轻描淡写，同时又极力掩盖私营经济的实质。他们不得不承认私营经济有雇佣关系，但是，不愿意承认有剥削关系，用“非劳动收入”的说法来模糊剥削收入的实质。私营经济这几年有了较大的发展，有一部分是勤劳致富、守法经营的，其中包括一些好的党员干部。这种私营经济的适当发展，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还有一种人是违法经营，牟取暴利。最值得引起注意的，是

这样一种人，叫流氓无产者变成流氓资产者，包括动乱暴乱中“飞虎队”的一些人。他们过去触犯刑律，被判刑或劳改劳教，从当流氓那天起，就同我们的政权对立。他们钻我们政策的空子，发了财，还是同我们的政权对立，还是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共产党。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一个流氓资产阶级，但是，已经处于流氓无产者向流氓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之中。这些人给社会造成的影响非常恶劣。更大多数的是处于中间状态，可以说是基本守法，也有违反经营的问题。总之，对私人企业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进行具体分析，由此制定区别对待的具体政策。

第三种情况。这几年来，还有一批严重经济犯罪分子，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他们杀人放火、盗窃抢劫、拐卖人口、胁迫妇女卖淫、走私贩毒。有些地方已经出现黑社会的势力，还有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这些也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

第四种情况。我国还有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头面人物不少是共产党员。其中有些人是“文革”中闹得很凶的造反派，当时“左”得可怕，粉碎“四人帮”以后，摇身一变，又右得出奇，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人借一个足球比赛的词，叫“越位”，来形容他们。你坚持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大骂你右，现在又大骂你“左”、“保守”、“僵化”。其实是他们自己变来变去，好像永远正确。过去他们从“左”的方面批我们，现在他们又从右的方面批我们。还有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挨整了，

由于错误地总结教训，也同上面这些人走到一起去了。他们纠合起来，成为不可低估的势力。这几年他们兴风作浪，干了大量坏事。他们的面目在动乱暴乱中已彻底暴露。现在有些跑到国外，跑到台湾，在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支持下继续进行反华反共活动。几年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敌对势力有意识地培养这批人，台湾和香港的敌对势力吹捧这批人，国内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中有些人也支持这批人。这种力量不是一天形成的。邓小平同志说，从理论务虚会开始，一部分人就和我们分道扬镳了。十年来，他们的力量越集越大。几次批评，都是进一步、退两步。有些同志想用宽容的态度来感动他们。这两年，在一些人的包庇、重用下，那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更加猖狂，使自由化的思潮空前泛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势力越来越膨胀，发展到同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不小的政治势力。他们一心想搞成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在这个基础上搞多党制，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东欧一些国家改变党、国家的名称，去掉了“工人”、“人民”、“社会主义”的字样。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一得势，非改变国家的颜色、非改变社会主义的制度不可。这一点，东欧的事实已经证明，从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和行动中也得到了印证。现在，这些人的面目已经彻底暴露。很多同志担心，查也查了，清也清了，这些人检查两句，受几句批评，有些突出的人物一时有些收敛，于是就过去了，照样做领导干部，照样在党和政府的要害部门、核心部门。一股风刮过去，他们依然故我，新的时机一来，会闹得

比现在更厉害。不是没有问题，也不是看不清楚，人家面目狰狞、磨刀霍霍，我们还温文尔雅，客客气气。这怎么行！人家讲得很清楚，匈牙利三十几年都平反了，中国这次的事件一两年、三五年，最多十几年，肯定要平反。美国人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失掉中国，他们积极准备卷土重来。台湾、香港的敌对势力也很猖獗。

我们这些人是经历过一些事情的了，钱有那么大的作用，确实没有想到。毛主席说，战场上不愧为好汉，但是在糖衣炮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个道理，当时也感觉讲得很好，但实际上体会得不那么深。这次教训深刻。“精英”分子纷纷发表文章、发表讲话，说这次天安门闹事是伟大的民主爱国运动。这使我想起有人在一九八八年春天在一个小会上讲的话。他全面肯定了“以夷制华”、“丧权辱国”八个字，说中国人懒，要外国人管，优化组合后有人失业怎么办？捡高尔夫球去！这次美国人出钱，培养动乱分子、暴乱分子，制造和散布谣言，“美国之音”指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公开否定中华民族，甚至宣布黄种人不配在地球上生存。这叫“爱国”？我看是彻头彻尾卖国。有几个钱就可以出卖灵魂，出卖党，出卖祖国。这件事情教训很深。美国友好人士对我们同志讲，中国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还会说中国话，喜欢吃中国饭，除了这两条，他们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政治倾向，没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由此可以看到，在和平环境中，西方敌对势力采取洗脑筋的办法、收买的办法，把我们的人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过去

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没吃过这个苦头，这次吃了大苦头。没有革命经历的人，没有新旧社会对比经验的人，没有当过亡国奴、没有受过帝国主义欺负的人，更不知道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分量。他们寄希望于这样的人。杜勒斯讲，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个战略计划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实现。

根据国际国内的上述情况，我们怎么办？要加深研究，采取对策。这不只是政法部门的事，而且是全党的共同工作。最关键的是党，问题出在党内。冲新华门，矛头对着李鹏同志。耀邦同志追悼会期间，搞动乱的人用欺骗的手法煽动群众。当时我同少数人说，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可他们并不满足于这个胜利，还要大闹，可能还有个动乱，动乱中间一定会有大分化。但是说实话，闹成后来那个样子，没有想到。在他们看来，党和政府的权力唾手可得了。他们那样肆无忌惮，是同赵紫阳对动乱的纵容和支持分不开的。所以最关键的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有的同志建议，要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党的干部的教育。这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决不要以为我们平息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天下太平。一定要痛定思痛，下决心改进我们的作风，确实像中央说的，身体力行，过几年紧日子，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党和群众永远在一起，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第四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四十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写该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了。应该

说,《当代中国》丛书的出版,包括部门、地方卷,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编写,是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筹划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工作,确实已经提上日程。也有同志提了具体的建议,是不是在适当的时期成立国史馆。我和马洪同志交换意见,感到目前成立国史馆的条件还没有成熟,是不是可以先筹备。我们和《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及胡绳同志商量过,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同时搞一个名称,就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乔木同志提了个建议,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牵头,会同有关方面的同志,着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的编写工作。四十年,一年出一本,几年之内把四十年的大事记搞出来。看来这事有希望。

## 注 释

- 【1】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页。

#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没有过时\*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现象的科学方法。只要还存在阶级，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尽管社会历史条件有种种不同，它就不会失去存在的客观依据，没有也不会过时。

这些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持怀疑态度的人多起来了，甚至一提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就被一些人指责为“僵化”、“保守”。从认识上来讲，也可以说是因为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人们的思想容易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在国际活动方面，在国内政治生活方面，如何自觉地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观察问题、观察政治动向和思想动向，这成了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经过今年春夏之交的一场动乱和北京的反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革命暴乱，很多同志终于惊醒过来，感觉到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都没有熄灭，这种矛盾、这种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成危及国家、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的政治斗争。

我想围绕这个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从国际范围来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之间，还存在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讲和平竞争，在和平竞争里就包含着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性质。有一位同志讲，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百多年，可以分成几个时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新的激烈的动荡，被列宁、斯大林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个时期，发生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接着取得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中国及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资本主义又进入新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比上一个世纪快得多。上一个发展时期，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这一次，拿中国来讲，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思潮，是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江泽民同志在国庆讲话里讲了，他们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从那时以来，他们的具体策略、步骤有变化，但是，主要通过“和平演变”来瓦解

解社会主义的总方针没有变。用美国一名外交官的话来说，就是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一九八九年四月出版了《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一书，主张通过“和平演变”，首次使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方化”、“芬兰化”，然后，再把苏联搞得七零八落，对中国也照此办理。布热津斯基把希望放在中国完全实行西方市场经济那一套，认为照这一套搞下去，下个世纪中国可能还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公有制就没有了。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再说，中国面临两个前途：要么你自己主动地搞西方式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那就没有社会主义；要么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们就用各种办法整你，逼你“改革”掉社会主义，“改革”到资本主义。他们说，到本世纪末，整个社会主义各国都要先后失败，到二〇〇〇年或者到二〇一七年，他们就有把握，在克里姆林宫里开一个博物馆，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产生，到它的实验、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然后到社会主义失败，展览一番。

布什上台，总的还是要搞“和平演变”。他有一个新的部署，叫“走出遏制”，或者叫“超出遏制”。所谓“遏制”是什么呢？过去讲，“武力威慑，军备竞争”，使你社会主义国家不敢动，使你在她面前服服帖帖。他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不能够仅限于武力威胁，这条不放弃，但是要采取进攻战略。所谓进攻，就是把美国、把西方的价值观念，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用“民主”、“自由”、“人权”、私有化等等办法，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

度、文化制度、社会生活。这也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用他们的面貌改造世界。

“和平演变”在不小的范围、在相当的程度上，已经得手了。西方把他们那套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传播到社会主义国家来，被一些人接受，而且由个别观点发展成为一种思潮，又发展成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活动。我们要争取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内的经济建设。问题是，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不能忘记人家在加紧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加紧培植、豢养一批能够响应、实施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人物和势力。如果对这一手没有准备，那我们不仅过去吃亏，以后还要吃亏。所以，我们要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怎样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方针、步骤有所了解，保持清醒的头脑，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工作。

邓小平同志分析北京的动乱暴乱，讲得很好，说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小气候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他跟尼克松讲，这是你们挑起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陷得太深。美国人打如意算盘，以为对我们进行经济制裁，我们就会屈服。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讲，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对不起美国的事。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民发奋图强。你们支持“人权”，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讲到人格，但是不要忘记还有国格。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两国关系的问题上，只能是由美国采

取主动，中国不可能主动，否则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在原则问题上，中国退让不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蒋介石采取一个政策，就是从“限共”、“容共”达到“溶共”。在这次政治风波中，布什的智囊团，那个兰德公司就讲，要采取一种办法，把社会主义国家融化掉。虽然情况不同，但都贯穿着斗争。因此，从阶级斗争的实质来讲，还是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我们要从新的情况出发，为了解决新问题，重温毛泽东思想，重新向毛泽东同志和老一代革命家请教。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因素，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是一个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科学论断。

我们国内存在的矛盾，主要的、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这不是说，国内已经不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或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了。

比如台湾、香港、澳门，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些地方，剥削阶级不仅作为阶级完整地存在，而且居于统治地位。在台湾，剥削阶级掌握着政权，军队等一套国家机器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手里。四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块土地当做“反共基地”，最近还配合西方“和平演变”，提出“政治反攻”。

香港实际上还是英国进行殖民统治，按照中英达成的协议，一九九七年以后我们恢复行使主权，我们还许诺它的资本主义制度、它的生活方式多少年不变。澳门也是这个情况。国外敌对势力通过台湾、香港从人力、物力、财力、舆论等方面支持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台湾国民党当局利用其统治地位密切配合，香港一些人还组织了什么“港支联”。我们平息暴乱以后，一些暴乱分子跑到台湾，继续在那里得到支持，来进行反共活动。港台这些地方的剥削阶级，直接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相联系，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系都非常密切。邓小平同志多次讲，不能允许香港成为反共的基地。实际上，不只是英国，包括美国，包括台湾，都在策划香港成为反共基地。我们说，你们实行你们的资本主义，我们实行我们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他们却说，井水要犯河水。因此，我们考虑，国内阶级斗争情况以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不能只限于大陆。要考虑到现在的台湾，现在的香港、澳门，以至于“一国两制”原则真正付诸实行以后的情况。

我们说，经过三大改造，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在大陆上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不能说旧的剥削阶级的影响一点也没有了。不久前，我们一位曾在苏联留学的记者重访苏联。十一月七日，他在莫斯科看到两个“长龙”似的队伍。一个“长龙”去瞻仰列宁墓，另一个“长龙”举着沙皇的国旗、军旗。两个“长龙”里，都有年纪大的，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他的苏联朋友、同学谈起后一个“长龙”，都非

常难过，有的痛哭流涕。据他们介绍，后一个“长龙”里的人有一种说法：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沙皇帝国继续存在下去，今天的苏联由沙皇统治，不知要好多少倍。这跟我们国内自由化思潮差不多。一些自由化分子说，如果不抗日，中国大陆现在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差不多，如果不打蒋介石，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水平差不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七十年，中年人、青年人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出生的。这些人也未必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比如中国的严家其，本人是个孤儿，是党和政府把他养大，又送去上学、直到读研究生的。革命胜利以后七十年也好，四十年也好，还这么怀念旧制度，可见旧的剥削阶级影响之深。最近，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故，纷纷从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条文，一些被革命推翻、一直流亡外国的王公贵族们还想回来执政。台湾国民党时刻梦想重回大陆，照旧统治。这种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认为这种发展可以弥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不足，可以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必要的补充，方便和丰富人民生活，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允许其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还要进行引导，保护其合法经营、合法收入。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四年在全国科技大会讲话说，国内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分子。对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政策，大体经过两段。一九八二年或一

一九八三年，我们提出允许七个雇工。那时的说法是，两个帮手，五个徒弟。后来实际上突破了。突破以后，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怎么办？当时说再看几年。这是正确的，同时要求报纸、刊物不要报道。当时公开报刊对雇工如何优越的宣传，已经不少。一九八四年下半年开始，银行竞相低息贷款扶持个体户，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大大发展。原来是对城市的，后来又推广到农村。一九八七年公布过一个数字，说城乡劳动者近两千万人，其中雇工超过七个人以上的二十二万五千户，雇工三百六十万人。解放初期，全国民族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大约是三百至四百万人。应该承认，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大多数是守法经营的。对此我们应当加以支持和鼓励，但是，也没有必要对事实上存在的剥削关系加以掩饰或美化。至于偷税漏税，这和我们税收办法不完善、执法不严有关。但是，也确有一批“倒爷”、“暴发户”违法经营。这些人中间，有一些是有前科而又没有改造好的，用一位同志的话说，就是“流氓无产者”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变成“流氓资产者”。在去年春夏的政治风波中，他们成为一支支持动乱的力量。动乱期间，“高自联”帮助建立、支持和领导“工自联”，还有那个“飞虎队”，其实是“精英”和地痞的结合。

严重刑事犯罪、经济犯罪分子，相对地说所占比重不大，但绝对数字不小。他们也是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对立的力量。

还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股力量在国内制造民族不

和，同时又企图把作为中国一部分的民族地区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不仅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反对祖国统一。

特别是这几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动乱“精英”。他们宣传自己的“独立意识”，要成为“独立阶级”、“独立政治力量”。其实，他们并不独立。一方面，他们自觉地成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海外、国外敌对势力收买下来、培植和豢养起来的。动乱中间，他们自吹他们的行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实际上，他们真正是反民主，真正是腐败，而且真正是卖国。方励之反对讲爱国主义，要“解散”中国，呼吁西方制裁中国。刘晓波说，香港要再做三百年殖民地。动乱暴乱中间，“精英”们很多活动受“美国之音”指挥。平暴以后，叛逃出去的“精英”组织反动组织“民阵”，投靠台湾国民党，投靠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在全中国复辟旧制度。

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国内的这些现象，要注意一个特点，这就是，大陆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而且越来越同海外、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特别是企图复辟旧中国剥削制度的势力，台湾作为完整阶级的剥削阶级，香港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亲帝分子，大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民族分裂分子等，都要求在政治上实现、争取、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势力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目标下结合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那些所谓“知识精英”、“权



力精英”，成为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形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站在共产党对立面的政治反对派。决不可以低估他们的能量。他们是在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进行活动的。美国有人说，我们平暴胜利，使他们“第二次失去中国”。他们决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败就停止继续活动，实际上也在重整旗鼓，想要再度培养他们的代理人，重新聚集反共反华力量。

国际国内的现实证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时。我们要坚决遵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决不能重复而且需要继续警惕和防止重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我们说阶级分析没有过时，是说必须严格从实际出发，科学地研究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这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且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对于教育干部和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重要的意义。

# 理论准备和实际锻炼 二者不可缺一\*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九日)

首先向大家问好。

今天能够和青年同志认识，交朋友，非常高兴。同志们学习热情很高，都有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个班接下来的愿望。老同志一批一批退下来了，需要年轻同志一批一批接上来。如果能及时地完成新老交接，我们的事业就能不断前进。同志们有这个志向，我感到欣慰。

听说你们在学习研究中间，议论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走得通走不通，能不能坚持下去；另一个是，有了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成长的道路怎么样？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只要有一支浩浩荡荡队伍，真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决心把共产主义事业当做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首都高校第三期青年工作干部培训班上发言的摘要。

又善于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学习，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走得通，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条。

有一件事情，几十年了，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九三七年四月我离开北平到延安。我那时还是新党员。当时，在中央党校举行建党十六周年的纪念会，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来了，毛主席讲了一篇话。他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才十二人，代表的党员只有五十多人，在全国四亿多人民中间，只占很小很小的比例。可是这些人接受了马列主义真理，就敢于向全中国的反动派、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宣战。经过十六年的奋斗，今天仅在座的共产党员就是好几百人，而且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毛主席勉励我们说，今天的情况同建党初期有很大的不同了，只要你们按照入党誓词奋斗下去，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就能胜利。

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六年的斗争中间，中国共产党有胜利，有失败，失败以后又胜利。那时军队还有三万多人，全国党员五万多人。当时国民党有军队一二百万人，党员人数也比我们多得多。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我们党同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这段历史的简单回顾，就使我们确信，只要一批职业革命家掌握了真理，运用这个真理进行顽强的斗争，不怕牺牲，我们的事业就有广阔的前途，革命就一定成功。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十二年的时间，我们取得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执

政党。

职业革命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标准是什么？过去党有过许多规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其中贯穿的精神，可以从党员的光辉榜样的身上看到。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一批我们所熟悉的老一辈革命家。这些年来，他们的书陆续出版，有关他们革命业绩的著作陆续出版。只要我们按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去学、去做，就不会再限于抽象的讨论。最近听说，在青年中间，在学生中间，出现了一种“毛泽东热”。这是很可喜的现象。毛主席在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不管他的错误多么严重，他的一生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革命领袖。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不管在家里或者到外地，除了工作就是读书。现在我们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总是认为要有出路就必须出国留学，一个时期出现了出国热。我不反对到外国深造。毛主席在入党以前，在湖南办《湘江评论》，组织新民学会，也送了一批革命青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他对这些同志讲，你们到外国学习很好，我留在中国，中国的事情搞不清楚，我不能出国，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办法，归根到底还在中国。他的家庭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个亲人。儿子从苏联回来，毛主席首先要他到农村，请劳动模范当教员，后来参加抗美援朝牺牲了。毛主席为中国革命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对于他的晚年，也要具体分析。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用心还是为了把革命继

续进行下去。“大跃进”犯了错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共产党员在“大跃进”中犯错误，是认真的犯错误，可是我们一旦认识了错误，也一定能够认真改正错误。最近《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闻迪的文章，说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媚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大国，没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没有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我们在世界上就站不住。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可是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他无比坚定。抗日战争，我们和日本侵略者交锋，打败了它。抗美援朝，我们又和美国侵略者较量，也打败了它。美国到处横行霸道，向我们施加压力，进行封锁。毛主席多次讲，一个美帝国主义算什么，十个都不在话下。他们现在不和我们建交，总有一天要到我们这里来，登门拜访。到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就来了。那个时候苏联也封锁我们。不久，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艾森豪威尔的女儿来中国访问，商谈中美关系怎么改善。在会谈中，毛主席说了一句话：你们可不要踩着中国人的肩膀去跑莫斯科。这句话弄得基辛格好长时间摸不着头脑。这意思就是说，你美国人不要想打中国牌，利用中国出卖中国。

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了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他说：“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sup>【1】</sup>他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时候，曾经向中央提出一个建议，说要从青年同志中发现选拔一批读过马列主义著作、相

信马列主义是真理的人,加以培养。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建议,提出要培养一批青年职业革命家,以利于把我们的革命事业一代一代传下去。希望同志们认真领会中央的精神。

作为职业革命家,除了要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念,或者说理论修养,并经过长期斗争实践的考验和锻炼。邓小平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接班,要求老干部、新干部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这样,才能加强我们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保证不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遵照邓小平同志指示,中宣部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了一些书,总题目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从马、恩、列、斯著作中选了若干篇,成为四本《马列著作选读》,约一百二十万字。还编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卷,约七十万字。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三十万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两本,七八十万字。还有《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六七十万字。这些著作合起来大约有四百万字左右。加上《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一共五六百万字。毛主席和其他老革命家的著作,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从中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教益。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志,要想成为职业革命家,需要学好、学懂这些书,这不但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学习理论,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最重要的是了解历史的规律。我们之所以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实现,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这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都在按照这一规律运行。恩格斯讲,马克思对人类有两大贡献,一个是发现了剩余价值,一个是创立了唯物史观。关于唯物史观,他说: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2】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要。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分化出一部分专门从事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脑力劳动者,这部分人后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但是,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唯心史观者那里被极大地夸张和歪曲了。

他们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即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谈得上从事意识形态工作。那些人完全脱离了唯物史观来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似乎从有人类历史以来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的阶层、领导的阶层，是历史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所以，他们竭力鼓吹所谓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相结合。听信这套理论，就会蔑视物质生产者，看不起劳动群众，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精神贵族。

马克思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这就抓住了资本主义的本质。马克思为此写了一部大著作，叫《资本论》。我劝同志们，如果有志于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又有阅读能力，最好把这部著作认真读一遍，必定会有很大的受益。鲁迅在《二心集》里讲过他思想转变的情形，说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后，得出一个看法：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不要看资本家多神气，从历史运动来说只是暂时现象，掌握人类历史前途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吹神了。只要读过《资本论》，这些神话都可以揭穿。

马克思写《资本论》到现在一百多年了，连资产阶级中持公正态度的学者都承认它的价值，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战后又有了很大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我国解放战争时期到解放初期，在农村搞土改，后来又搞三大改造，为什么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愿意跟着共产党走？因为我们揭露了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



本质,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所以,学习马列著作,理解唯物史观,理解剩余价值学说,就知道共产党所做的是最正义的事业,共产党所从事的工作是为最大多数劳动者谋幸福的工作。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这个工作坚持做下去,最终一定能够成功。

下面讲一讲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当革命顺利发展的时候,一定要防止头脑发热,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革命受到挫折的时候,也不要丧失信心。当前国内国际我们都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们必须在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坚持奋斗下去。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四十年,大体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第二个时期是十月革命以后,都差不多七十年。前一个七十年,有一段是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到这个七十年的后期,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时期,容易出现修正主义或者叫右倾机会主义。那时流行的,是第二国际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这个七十年中间,有社会主义苏联的存在和发展,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大战以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巨大成就,也有六十年代以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和平发展。这些年来,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毛主席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说无产阶级同地主资产阶级斗争尖锐,以至兵刃相见的时候,容易犯“左”的错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结成某种统一战线的时期,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国

际范围内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前段日子一些同志讨论这个问题,形成一个看法,说上一次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出现了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企图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阻止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这次资本帝国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又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主张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附庸,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制度通过自我完善进一步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目前所谓“新思维”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急剧变化,有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有的政权落入反共力量手里。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在一些国家已经和正在得手。是不是社会主义从此就被消灭,共产党就被消灭,像他们说的那样到本世纪末共产主义要大失败呢?国际范围在议论这个问题,国内也在议论这个问题。东欧发生变化,西方国家高兴得太早了。事情还在变化之中。中国处境困难。我们面对外来的压力,顶得住顶不住?有困难,能不能克服?我想就对这个问题做点比较。

首先,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外来压力,同我们党的历史上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压力相比较。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正在走向胜利。蒋介石背信弃义,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把共产党打在地上,全国五万多党员剩下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在毛泽

东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领导下，针锋相对，发动武装斗争。我们党组织了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上了井冈山。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人提出了“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毛主席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变化和趋势，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来，开辟了赣东北、赣西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全国的红军达到三十万人。我们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只是党内发生王明冒险主义，才遭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被迫长征。这次失败，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党的力量几乎全被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牺牲。遵义会议扭转了被动局面，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胜利完成了长征，红军到达陕北。陕北根据地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斗争的立足点，也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这时全国的党员不到五万人，红军不过三万多人。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旗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打击侵略者。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经济被国民党封锁，他们还搞反共磨擦。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3】毛主席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主席向全党发出号召，自己动

手，丰衣足食，终于战胜了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我们，一九六〇年赫鲁晓夫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我们还债，我们又遇到很大困难。那时我们采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渡过了难关，还清了借苏联的外债，做到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到一九六四年，我们的经济和各项事业重新发展起来。一九六六年开始“文化大革命”，犯了很大的错误，发生内乱，我们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林彪的问题和“四人帮”的问题，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比党历史上遇到的困难要小得多。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历史。

这里讲一下我们和东欧国家主要有哪些不同：

(一) 它们历史上受社会民主党思想影响比较深，我们党从成立起这种影响就很小。所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东欧有市场，这是很自然的。在我国，不能说一点市场也没有，但比它们小多了。

(二) 东欧原先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也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但主要是靠苏联红军解放的。毛主席讲，苏联红军用铁犁和本国革命者相结合，把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犁掉了。在那个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不是这样，是自己打出来的。我们是自己打出来的，经过二十二年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革命战争，打下了天下。

(三) 我们的建设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但是没有照搬苏

联模式。我们的三大改造是按自己情况办的，工业建设没有经验，引进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但也结合了我们自己的情况。前些年报纸上宣传，讲我们经济体制是照搬苏联模式，这不合乎历史。

（四）苏联搞大国沙文主义，用老子党的态度对待东欧一些党。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曾经想用大国沙文主义的办法压迫中国。可是我们多次顶住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们要我们放弃抵抗，说如果我们不妥协，不让步，进行自卫战争，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我们不愿意打仗，可是蒋介石要打，硬把战争加到中国人民头上，我们坚决地进行自卫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临近胜利，苏联又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你们继续打下去，美国要出兵。我们曾经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蒋介石不签字，我们就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了解放大陆的胜利。那时斯大林说毛泽东好像第二个铁托。直到我们志愿军抗美援朝，这种怀疑才消除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地维护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尊严，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五）中国共产党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兄弟党的先进经验，但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又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再同苏联比较。

（一）苏共是在列宁领导下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同孟

什维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建立，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导，遵循着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又充分考虑到中国的特色，深深扎根在中国土地上，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在党内形成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我们批评过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们又清算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这就使我们党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永远保持蓬勃的生机。

（二）斯大林搞过肃反扩大化。从赫鲁晓夫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否定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甚至否定卫国战争。党内有人否定列宁、贬低列宁主义，有些反共分子对列宁也进行人身攻击。列宁、斯大林被攻击到这样的程度，竟说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是列宁的两个门徒。沙皇的国旗、军旗，在莫斯科的红场和列宁格勒游行队伍中打起来了。对待历史问题，对待革命领袖，我们同苏联采取的方针完全两样。毛主席在世时，中央已经说，斯大林三七开，功大于过。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我们党一九八一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我们党虽然也屡次搞政治运动，伤害了不该伤害的同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领导干部靠边站，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大批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干部保存下来了，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工作，使我们有可能较好地实行新老交替、新老合

作,革命事业能够继续,党的革命传统能够得到坚持和不断发扬光大。

(三)苏联和中国都是通过武装斗争取得政权的。苏联从城市武装斗争开始,然后转入农村。中国是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的反反复复的斗争,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好事多磨。一大批经过军事斗争、政治斗争、思想领域斗争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大批治军、治政、治文、治经的干部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在同国内敌人或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经受考验的干部成长起来了。

(四)苏共和我们党都是在一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行活动的,也都认识到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在农村影响不大,到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还说,中农占农民人口大多数,很大部分中农曾经支持革命的敌人。革命胜利初,实行余粮征集制,引起农民不满。列宁去世前提出合作社计划。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苏联搞集体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也存在命令主义、粗暴简单的错误,对农业生产造成损害。中国革命在农村发展起来,十分注意对农民进行具体分析,采取不同政策,占人口大多数的贫雇农始终是革命的中坚。我们的人民军队,多数成员是穿军装的农民。在以农村为根据地的长期武装斗争中,党同农民的关系是很好的。建国后统购统销,考虑到了历史形成的农产品价格。我们搞合作化,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发

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的逐步过渡的形式。农业合作化后期也有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的偏差，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又发生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进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最近有同志到河北农村调查回来说，尽管有去年的动乱暴乱，党在农村的基础仍然是很深厚的。这也说明，中国的工农联盟很巩固，广大农民和党坚定地站在一起。

（五）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在长期斗争中同人民建立了鱼水关系。党指挥枪，始终是我们的一条建军原则。从古田会议开始，毛主席就提出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支部建在连上。在军队内部，实行了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度。这样一支久经考验、百战百胜的军队，不愧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

（六）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就拿自然科学来讲，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解放后我们培养的专家，同群众结合，取得了举世承认的成就。一九六〇年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有原子弹、氢弹。美国人封锁，苏联人撤走专家，我们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卫星也上了天。新中国四十多年，我们培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就其才华和成就来说，不亚于任何国家。这些知识分子，现在是我们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从苏联东欧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一些知识分子由



于脱离群众,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也有极少数所谓精英,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看不起工人、农民、士兵。历史终究要抛弃他们。我们的广大知识分子,一定会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取得更大成绩。

(七) 苏联的改革不成功,经济没发展,人民生活没改善。我们改革开放十年,成绩举世公认。

我只是进行了一番轮廓式的比较。建议同志们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中国人受帝国主义欺负一百多年,一旦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要我们重新向他们叩头称臣,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人应该有志气,年轻人尤其要树立民族自尊心。我们要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榜样,继续举起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旗帜。现在旧的国际格局没有结束,新的国际格局没有形成,但是出现了多极化的倾向。多极化,就为我们提供了广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有很多朋友,特别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我们要坚持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不干涉别国内政,又积极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办好事情,特别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想要孤立我们,是办不到的。

最近,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党密切联系群众,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战胜。中央抓这个问题,是抓住了根本,抓住了关键。在贯彻落实中央这个决定的过程中,特别是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必须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付出艰苦的努力，做出显著的成绩。

我比在座的同志们年纪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完全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中，通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逐步成长起来，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想。

## 注 释

- 【1】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46页。
- 【2】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574页。
- 【3】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92页。

# 依靠集体，依靠党组织， 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人民群众\*

（一九九〇年五月十九日）

到会的同志都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家都感到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条件和环境比以前好多了。这不是说我们的责任小了、肩上的担子轻了，而是责任更大了、担子更重了。在这样一种形势下面，迫切需要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业务素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成为建设“四有”职工队伍的带头人。

党的方针早已确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就一个企业来讲，一个是要生产越来越多的好产品，另一个就是要培养越来越多的“四有”新人。有了这样一个“四有”的职工队伍，企业的生产建设、经营管理和各项工作都会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现在，政治思想战线确实有了新的转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六次年会上的讲话。

机。企业政工干部要做出样子，成为建设“四有”职工队伍的带头人，经过我们艰苦细致的工作，带出一支好的队伍。好多年以前，大庆的同志就讲过：大庆的职工是能够打硬仗的队伍，是过得硬的队伍。这个队伍是靠一批解放军的干部，包括红军时代、抗日时期的一批老干部，和广大职工同甘共苦逐渐建立起来的。直到今天，我们听了大庆同志的发言，证明他们还保持着当年会战时期的光荣传统。

要真正成为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带头人，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根据以往的经验，根据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要提高我们的政治素质，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努力：一要依靠集体，二要依靠党组织，三要依靠工人阶级，四要依靠人民群众。

## 关于依靠集体

先说一下“两心”即中心和核心的问题。据说，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见。中心地位、中心作用，如果指的是厂长（经理）在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技术开发中实行统一指挥和全面负责，这没有错，应该说是正确的。这样的中心作用和中心地位，同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核心作用或者叫核心领导作用，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这一点本来是清楚的，为什么又成了问题呢？这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有的同志对厂长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和中心作用做了不恰当的解释，贬低了企业党委的作用。还

说，鉴于苏联、东欧的经验，企业要实行党的书记兼职化、党的工作业余化、党的领导属地化，并要在一些地方、一些企业进行试点，一九八八年要求形成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正式规定党委书记兼副厂长。试行过程中间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厂长任命的副厂长选不上党委书记，或者厂长不愿意任命党内民主选出来的党委书记为副厂长。如果说过去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而现在有的同志则主张，走相反的道路，以政代党，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党政不分。尽管我们的条例规定企业党委要对企业实行保证、监督作用，实际上既难保证，更难监督。

列宁在讲到苏俄的企业要实行“一长制”的时候，曾经明确谈到，工厂的重大决策，要由群众进行广泛的民主讨论，要在领导层中间进行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作了决定以后，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厂长要全权负责，统一指挥。列宁讲的是苏俄的情况。

在资本主义现代化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中型企业中，一般说来，重大决策都是由董事会作出的，而且厂长、经理的周围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经营管理的或者技术管理的智囊团，厂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咨询机构。一个高明的厂长，他的成功的经验，就是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广泛听取各种智囊团和咨询机构的意见，研究各种各样的方案，然后提供董事会作出决定。道理很简单，愈是现代化企业，愈是科学技术发展，一个企业特别是大企业里面的问题就愈多，关系就愈复杂。光靠一个人的头脑，是不可能对什么事都作出正确决

定的，必须吸取别人的智慧，多听取各种内行、各种专家、各种机构的意见。

我国在五十年代曾经实行过“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日本的企业从这里得到启发，改进了他们的企业管理。据我所知，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大中型企业，在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之前，都要听各方面的意见，进行反复论证。愈是高明的、有经验的厂长，在这样的问题上愈谨慎、愈谦虚，愈懂得依靠集体智慧的重要。只有那些冒冒失失的、没有经验的人，以为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后，以为一当厂长，在企业里就大权在握，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搞一言堂，这没有不栽跟头的。

企业管理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是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里明确提出来的。小平同志讲了以后，在全国一百多个企业进行试点。当时阻力很大，不少同志不愿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为厂长负责制。一直拖到一九八四年，彭真同志报告了小平同志，认为还得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办，实行厂长负责制。他亲自领着一个调查组，从南方到北方做了周密的调查，起草了被称为“三加强”的三个条例，作为党中央的文件下达。我们要更好地实行厂长负责制。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动摇，以至于伤害厂长的积极性，对企业是不会有利的。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有责任支持厂长的工作，维护厂长在生产建设、经营管理、技术开发方面统一指挥的权威。

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说的是党委要对企业思想政

治工作进行领导；要对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进行领导；要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包括干部的培养、教育、考察和选拔；要对党政工团的关系进行协调，对企业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起保证监督作用。

行政领导和党委领导是两种不同的领导体制，实行不同的原则。在党委领导集体的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少数服从多数。按照毛主席的说法，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是党委会平等的一员，投票的时候同其他委员一样，只有平等的一票。这同实行行政领导的厂长负责制显然不同。在党委领导集体中，如果厂长是党委委员，他在党委会上也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因为是厂长，在党内、在党委会里比别人就高出一头。

五十年代初期一批同志曾到苏联，花了比较长的时间考察苏联的工厂领导体制，我参加过这次考察的材料的整理。当时他们行政领导上实行“一长制”的企业，厂长的权力比我们现在的厂长大得多，但是如果厂长是党员，不论是否选为党委委员，在党委、在党组织面前是守规矩的。

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里，尖锐地批评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指出普遍存在党组织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的毛病，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后来有了一九八二年的宪法，规定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企业法》规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也必须坚持。现在有些同志是否有点计较，究竟是厂长大还是党委书记大？我看，这没有必要

计较。

我们党的生活中间有这样一个现象，一个地区、部门、单位，往往有一个核心人物，这个核心人物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什么人捧起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际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毛主席和我们党老一代的领导同志，常常有这样的说法，谁有真理就服从谁，就跟谁走。在延安的时候，陶端予同志在杨家湾办了一个小学，河南根据地的夏陶然同志也办了一个小学，当时报上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杨家湾小学的经验，一篇是《走夏陶然的道路》。这两个办学的典型经验反映到中央以后，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怎么办像杨家湾那样的小学、夏陶然那样的小学，中央没有经验，在这个问题上，是他们领导了中央，中央要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总结经验，然后经中央推广他们的经验。毛主席在讲到领导方法的时候说得非常清楚：凡是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如此反复多次，使我们的认识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党委的工作者要这样办，厂长也得这样办。总之，不管是行政领导同志，还是党委的领导同志或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头脑里首先要牢牢地树立依靠集体这个重要观点。

## 关于依靠党组织

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都必须依靠党的组织。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资历深浅，都必须按照党



的原则办事。有的同志淡化党的领导，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提出要精减、撤销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压缩党的机构的编制。中央现在已经纠正了这个毛病。中央过去、现在都讲，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有精干的、专职的人员来做。但是，如果只靠少数人，即使是水平高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来承担，显然是难以完成任务的。企业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企业党的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不仅依靠企业内部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而且依靠企业党组织所属的全体党员干部、全体党员，依靠共青团和工会的积极分子。专职人员要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专职人员、积极分子的工作要和广大职工群众的互相帮助、自我教育相结合。

这次会上，我们听到很多在这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经验。无论大庆也好，刘庄煤矿也好，西安国棉五厂也好，苏州丝绸公司也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做这项工作的，不仅有专职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而且有各级党组织、各级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做行政工作的干部，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做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要向这些企业的同志学习，向他们取经。各级党组织的领导集体，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要同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一块来做。党政职能分开以后，党的各级党组织要适应新的情况，来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

按照党的原则，我们党领导群众不能用命令的方法，尤其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只能用说服的、吸引的方法。而

说服的、吸引的方法，提高群众觉悟的方法，促进群众自觉自愿起来行动的方法，只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效果。很多成功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我们遵循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工作就可以做得很好。

我们的党是个好党，我们多数共产党员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同时也要承认，确实存在一些不合格的党员、一些不合格的干部。现在很需要我们经过认真的调查，确实了解情况，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使我们的党有更大的凝聚力。在依靠共产党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我们党的组织，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还有一个如何帮助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不合格的干部进步的问题。这方面我们也取得了一些经验。老同志要回顾党的历史，年轻同志和中年同志要学习党的历史。我们党经历过艰难困苦，斗争、失败、再斗争，直到取得胜利。历史经验证明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党内如果发生了严重问题，要站得住，是很困难的。毛主席多次说过，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可是，共产党可以把共产党打倒。这是总结我们痛苦的教训、血的教训说出来的。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确实要提高警惕，接受教训，真正依靠党组织，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依靠党组织的全体人员，依靠各方面表现好的同志；另外一方面，也要帮助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不合格的干部，使我们的党更纯洁，使我们党的形象更好，使我们党的力量更强大。

我们必须十分明确：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和反对

“和平演变”，要制定一套完整的战略策略。其中，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好，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第一位和最重要的，是必须把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这一条是决定一切的。

## 关于依靠工人阶级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中，强调党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样的话，多年来很少讲了。工人群众听了以后，感到心情非常舒畅。我们再也不能忘记这句话。问题还不只是这句话，重要的是要按照这句话的精神，来改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包括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这个阶级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领导的。党章明确规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宣言》指出：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必须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在领导当前斗争的时候，同时代表运动的将来。这两条，从我们党成立以来，就是决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党的性质的基本的理论概括。我们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建立在什么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于什么样的出发点？在我看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这两条基本原理。

我们的会议上有的同志在介绍经验时讲到，“领导心中有工人，工人心中就有企业”。这是同志们从自己的工作中得出的深刻体会，也是宝贵经验。尊重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发挥他们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这是企业的党组织、行政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事事、时时、处处都必须充分考虑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些情况真是令人担心。本来党章也好，我们党的文件和领导同志的著作也好，都一再讲，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权是人民给我们的。可是，有的同志当了领导，当了干部，这样的观念就越来越淡薄了。在他那个单位、在他那个企业，往往把事情颠倒了，工人不是主人，而厂长、经理成了主人；经理人员、党的领导和职工之间本来是同志的、平等的、合作的、互助的关系，结果成为雇佣、被雇佣的关系。特别是在一些个人承包的企业或者租赁的企业里，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

为了发挥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我们党制定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凡是执行得比较好的企业，重要的情况及时向职工通报，重要问题的解决，事前征求职工的意见，企业的年度计划、企业中的重大决策，都要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接受和听取职工代表的审议和建议。代表会议有权对企业里的人事问题发表意见，对企业的领导，表现好的进行表扬；表现不好的进行批评，并且有权向上级领导提议撤换。代表会议对奖金包括企业领导人奖金的分配，对福利基金的使用、职工子女的就业、职工住宅的分配等，都有权

作出决定。福州铅笔厂实行的办法，我认为很好。厂里凡是要制订要求全厂职工和厂长遵守的条例的时候，都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作出决定，然后颁布执行。这样的办法应该推广。如果能够这样做，职工主人翁地位就大大提高了。

职工代表会议的条例，听说真正执行得好的占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少企业流于形式。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应该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八年在工会九大的致词中就讲了，现在不少企业还没有做到。要真正依靠工人阶级，我们的党政领导，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研究怎样认真落实这个条例，并且在实践中使条例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完善起来，使职工民主管理的精神和制度更加充实起来。

企业内部干群关系紧张，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是源于干部的以权谋私、任人唯亲。除了缺乏民主作风，这里还涉及利益分配问题。有些个人承包的或者租赁的企业，厂长、经理得到的收入高于工人的十倍，甚至于几十倍。这当然是少数，但是达到这样的严重程度，干群关系要搞好实在很难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分配中，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以按劳分配为主。真正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势必要拉开一些差距。上面说的那种悬殊，显然不是中央政策所规定的。这样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央和有关部门的注意。我有个建议，不知道是否能够实行，就是国营企业的厂长、党委书记，他们的职务工资最好由直属上级来规定，不要由厂长或者厂领导自己来规定。至于厂长、党委书

记、管理人员的奖金如何分配，职工代表会议已经作了规定，当然要维持。我问过上海金山化工厂厂长和党委书记，他们厂领导所得的奖金，相当于一线工人的中等数量。去年，我在杭州第二中药厂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厂长兼党委书记冯根生同志说，他的职务工资在全厂是最高的，可是奖金只领全厂平均奖金的百分之九十。去年还见到鲁冠球同志。他是一个集体企业的厂长，前几年根据合同可以分四十万元的收入。他把三十九万元作为这个集体企业的积累资金，只领了一万元。他说，管这个厂，一是抓职工的脑袋，一是抓职工的口袋，就是管职工的思想、管职工的收入。我说你这个办法很好，是不是可以补充一句，你抓职工的脑袋，抓职工的口袋，职工也看你的脑袋，看你的口袋。他表示同意。我们的厂长、书记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依靠工人阶级，要为本企业的职工谋福利，为整个工人阶级谋利益，厂长、书记的脑袋千万不要只想到自己的口袋，如果忘记了职工的脑袋，忘记了职工的口袋，只想到自己的口袋，总有一天站不住。

作为领导干部，他们的物质待遇，应该严格遵守制度，照章办事，做到清正廉明，决不能追求低级的、庸俗的享受。领导干部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说服别人，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如果你追求那种庸俗、低级的享受，人格的力量没有了。就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说，需要提倡什么呢？如果讲享受，我觉得所有的干部都应该像列宁所说的，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任务太重，

情况复杂，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光靠过去的经验已经远远不够，就要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这是真正有价值的、高尚的精神享受，应该在党员、干部中间广为提倡。

## 关于依靠人民群众

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做带头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已经作出重要决定，重申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强调这是我们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经验证明，在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时候，我们就取得胜利，党一旦脱离群众，我们的事业就要受到挫折甚至失败。经过去年春夏之交动乱、暴乱的考验，证明我们的党、人民和军队是好的，同时也暴露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有些干部脱离群众的情况相当严重。

这里，我想重述一下大家都熟悉的两个神话故事。

一个是斯大林讲过的。他在《联共党史》结束语中讲过一个希腊神话。英雄安泰是一个无敌的英雄，他能够战胜敌人，是因为他的母亲叫做“地母”，和敌人搏斗的时候，他往“地母”的身上一靠，就可以取得无穷的力量，把对手打败。可是他有个弱点，就是怕离开“地母”。有一次他的对手利用这个弱点，把他举在空中，使他无法接触“地母”，最终把他扼死了。

还有个故事，是毛主席在七大闭幕词上讲的，就是愚公

移山。愚公立了志向，要把王屋山、太行山从华北搬走，有个自认为很聪明的老头子，就讥笑他，山这么高，你年纪这么大，一天只能挖几锄头、担几担土，你有什么办法能把这山搬掉？愚公回答他说，我已下了决心把这两座山搬掉，我死了，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有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总有一天能把这两座山搬掉。愚公这样一种坚韧不拔、为民造福的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帝，上帝帮助他把这两座山搬走了。毛主席从这里引申出来，说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有两座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共产党员要立下志向，推翻这两座大山。我们要坚持下去，不断地做工作，我们一定能够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同我们一起把这两座大山搬掉。

讲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提这两个神话，可以说明人民群众是我们胜利的源泉，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没有打不倒的敌人。我们去年平暴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证明从总体上讲我们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使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去年，东欧几个国家在几个月中发生了突变，国家变了颜色，共产党被人家打败了，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些党脱离了人民群众。罗马尼亚的教训尤其惨痛。

千万不要以为平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我们要清醒地承认，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两大祸害。一个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这



里不是指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的人，而是指顽固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他们已经形成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另一个就是党内触犯刑律的腐败分子。按照我党过去的说法，就是蜕化变质分子。两者都是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我国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我们进行侵蚀的产物。有的同志说，这两大祸害可谓一母二子，一对孪生兄弟。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里面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sup>【1】</sup>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是被国际资产阶级政治上的糖衣炮弹所打中的，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政治代言人。腐败分子是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经济上的糖衣炮弹打中的。两兄弟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采用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企图使我们党的干部、特别是一部分没有出息的干部脱离群众。对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的党政领导、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我们的全体党员、全体干部，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于渗透和反渗透，颠覆和反颠覆，“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

我们平暴的胜利，东欧演变的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这个新生的事业要取得最终的胜利，必须经过曲折的、复杂的、长期的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的更迭，都不会是轻而易举

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转入奴隶社会，再转入封建社会，又转为资本主义社会，经过了好几千年，经过曲折的道路，无数血与火的斗争。私有制的建立尚且如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于进入共产主义，最后埋葬私有制。这里，既有同旧制度、旧思想长期影响的斗争，也有新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但是，要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以至进入共产主义，过去毛主席讲，要经过一百甚至二三百年的时间。究竟要经过多少年，现在很难说准。这里最困难的问题，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列宁说过，资产阶级被打倒了，但资产阶级社会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被打死的资本主义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败坏空气，毒化我们的生活，从各个方面用陈腐的死亡的东西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东西。毛主席也曾经说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不能说已经得到解决，还需要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继续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劳动人民也还肩负着旧社会加在身上的沉重包袱，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些论断并未过时，至今还保持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感动了上帝——我们的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人民对共产党、对解放军有无限深情。解放军进城，人民那

种热情欢迎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烈士，老一代革命家千辛万苦的奋斗，使我们取得胜利，赢得全中国人民的心。去年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进北京执行戒严任务，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煽动，指战员受到围攻，军车遭到堵截。这两种情景相比，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心情沉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应该下定什么决心？我们不能动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们应该冷静地、清醒地想到，正像毛主席讲的，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事业更伟大、更艰难，需要我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特别是要防止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败。不但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下二代，下三代，都要下定决心，挖山不止，把我们的斗争继续下去，直到把人类历史上罪恶最大的帝国主义制度这座大山彻底挖掉。

总结平暴的经验，总结东欧的教训，认识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们还没有到享清福的时候。下一代以至更下几代的共产党员，都不能贪图享受。这是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敌人杀我们头的时候，遇到糖衣炮弹袭来的时候，我们能够背弃自己的事业吗？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的先烈吗？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

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2】

让我们大家以此共勉。

### 注 释

-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8页。
- 【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97、1098页。

## 一次可贵的尝试\*

(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一日)

多年以来，特别是平暴以后，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做得不够好，这包括我自己在内。讲四项原则，有讲得好的，文章也有写得好的。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心很好，道理也不错，但是能够真正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解决得很好的不多，收效不大，这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自己发表的讲话。

因此，有一种愿望，除了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怎样改进自己的宣传工作外，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使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能够产生更好的效果，能够打动人心，能够使人们接受积极的影响。我希望创造出这种形式来，当然不限于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也正是出于这种愿望，当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和深圳宣传部的同志找到我说他们有一种想法，通过电视片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我听到后就表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电视片《世纪行》座谈会上的讲话。

示赞同，表示了支持。

今年四月，看到片头和四集中的一集，即《民族的脊梁》。从使用的资料上来讲，看到了许多我自己不知道的事儿，内容也使我深受感动，能够拍成这个样子，不简单。我为此感到高兴。后来，他们几位找我来谈，说四集都拍出来了，准备带到广州召开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年会上，请大家看，并征求意见，说到请我当总顾问的事。好像你们有的同志当时曾经提出，这个片子怎样反映我们的错误和失败，是否少涉及或避开。对这一点，我说不要回避，共产党经过多次失败，犯过多次错误嘛，这回避不了。问题是，共产党的可贵就在共产党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相信能依靠人民从失败走向胜利；失败了能够接受教训，重新再来，重新再干，干得比过去更好。

在广州，直接听到的，认为这片子好，也听到一些建议。大多数代表在各自的房间里看闭路电视，听到的反映也还可以，不是像今天这样一个会议，能够听到各种年龄的同志、各个方面的同志发表自己的观感。大家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也感到这个片子中间有不少不足的地方，这样听取意见是第一次。

总的来说，大家都希望这个片子早点发行，认为发行以后，会起好作用，团中央做学生工作的同志也认为学生可以看，能够看得下去。所有意见，对我都有启发。我们相当多的同志，是真心诚意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但一讲起话来往往是标语口号式的，没更多的新内容，更说不上多少新道

理。因此，很难说起多大作用，甚至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反感。有了这部片子以后，使我们改进宣传的愿望得到了支持。同志们讲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有益的尝试。这归功于全体参加制作的同志。我向你们表示感谢。同时，也像同志们所讲的，这只是一个起步，一个开端，但是有了路子，走出一条路了。

当然，这里要说到，在这以前已有一些片子，如《让历史告诉未来》，为《世纪行》的成功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还有一部《共和国之恋》以及其他类似的片子，都为现在这个片子的成功、这次尝试的成功起了先导的作用。他们走在前面了，为我们提供了经验。那些作为先导的片子，如有的同志说的，涉及的范围，涉及的历史，涉及的宽度，终究比直接以宣传四项原则为题目稍微窄了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纪行》用这样一种形式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它涉及到每个方面，古今中外，从马克思起，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到现在就有一百五十年了，更往前讲还有空想社会主义。从中国来讲，受人家的欺负也一百五十年了。这么长的历史跨度，涉及的方面有中国，又有外国，有这个阶级、那个阶级，有这个方面、那个方面，能够用两个半钟头的时问，把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通过这么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能够得到同志们的肯定，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和同志们一样，既认为是开端，就不要满足，也没有理由满足。摄制组的同志刚才说了还有很多遗憾的地方。是

啊！我们的历史这么长，共产党为中国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我们犯过那么多的错误，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才有今天，要反映的事情、要创作的题目实在太丰富了。同这些方面相比，我们这次做的一点工作，确实没有理由自满，没有理由到此止步。希望参加这个片子的制作人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片子放映以后，多多听取批评、建议，认真改正存在的缺点、差错。我们既然已经试探了，而且试探得不错，就有必要再考虑下一步干什么，抓住什么样的主题，发掘什么样的方面，努力搞得更好，更有成绩。同时也推动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朋友，自己接触的人，多方面进行探索，多方面进行创造，使得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路线、政策的指引下，不仅有很好的决定、很好的文章、很好的讲话，也有很多、很好的类似《让历史告诉未来》、《共和国之恋》、《共和国不会忘记》以及《世纪行》这样的片子，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越来越好的作用。



## 序 《她的中国心》

(一九九〇年九月)

反映乌云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她的中国心》在《中流》杂志发表后，立即引起文艺界、教育界、妇女界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应。我想，这首先不是因为主人公经历的传奇色彩，而是因为她的崇高的品格，因为她的品格给人们以深刻启示。

乌云是一位出生在日本、有着日本血统的女性。法西斯侵略者使她在幼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成为孤儿。中国人民用爱、正直、勤奋和忠诚养育了她。悲欢离合，曲折坎坷，造就了她的“中国心”。四十年之后，她在日本唯一幸存的亲人——哥哥，找到了她。这使她面临一次严峻的生活前途的抉择——回到日本，或是留在中国。我想，以她的身世和遭遇，无论做出何种抉择，都无可指责。回到出生地去，我们由衷地祝贺她与亲人的团聚。但是，她义无反顾地决定永远留在中国，和她的养母、亲友、同志、学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我很同意《中流》杂志短评所说的，这是一种超越血缘、超越物质条件的可贵选择。她当然了解，此时的中国，特别是她所在的库伦沟，还不富裕。她立志和那里的父老乡亲共同奋斗，改变尚不富裕的生活状况，全心全意地培养、教育下一代，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贡献一切。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在她身上，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又体现着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这就是：扎根基层，扎根群众，默默无闻，埋头苦干，把智慧和生命献给人民。她的道路，她的风范，和那些背弃祖国母亲、专事反祖国活动的所谓“知识精英”，形成鲜明对照。

宣传乌云精神、学习乌云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内蒙古人民养育了乌云，培植了乌云精神。这是内蒙古人民的骄傲，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贡献。内蒙古的文艺工作者写出了《她的中国心》，这是内蒙古文艺工作者的新成就。作为一名多年从事宣传工作的共产党员，我愿借此机会表示我的感谢和祝贺。

祝乌云精神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在广大人民中生根开花。祝更多的《她的中国心》这样的好作品问世。

# 注意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

(一九九〇年十月三十日)

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成立六年多来,会员不断增加,水平不断提高,成绩愈来愈多。你们的听众,所到地区的党组织,都欢迎你们。这也证明,你们确实为党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这次年会,是你们几年来成绩的一次检阅。会议开幕那天曲啸同志报告工作,说现在已有三百多会员,出版七百多种书,讲演两万多场次,听众五百几十万人次,还出版了《教育艺术》杂志。你们接触了很多先进人物,结交了很多朋友,帮助了不少落后的同志进步。所有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同志们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使研究的水平有新的提高,受到更多群众的支持和欢迎,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加强研究工作。每个会员都要在自己的范围内从事研究工作,相互之间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

要加强联系。在年会上，同志们交流经验，相互磋商，也能彼此促进。为了提高研究会的水平，我建议每个会员在自己所在地区找一个先进单位建立密切联系，经常了解这个单位事业的发展，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包括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要通过这样一种联系，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作为研究会，希望每年能同一至两个先进单位，建立密切联系，和那里的同志一起学习，一起总结经验，以此来推进我们的研究工作，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

你们去年到了大庆，不仅去讲演，而且去向他们学习。在大庆党委的领导下，大庆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康世恩同志对我说，大庆的经验，不仅是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专职人员讲，更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大庆的广大职工一起来讲，讲自己的成绩，讲自己的经验教训，讲自己的故事，进行最广泛的职工群众的自我教育活动。同这样的企业发生联系，对于我们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的同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提高机会，大庆也就成了研究会生活的源泉。听说你们又同辽宁《共产党员》杂志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员》杂志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仅帮助你们出了书，而且帮助你们解决了一些问题。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杂志社，取得了辽宁省委的支持。你们在辽宁省几个重要的城市开展讲演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地方工作是一种推动。地方工作的开展对我们研究会的工作也是一种支持，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这两个地方的经验，应很好研究。顺便介绍一点我多年

观察的经验。我们有的作家，原来是业余作家，那时写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内容充实，方向对头，创作的生命也很旺盛。可是，从业余作家变成了专业作家后，其中有的人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创作没有源泉了，思想空虚了，接受不良思想的影响，甚至在政治上走偏了方向。我希望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参加教育艺术研究会，进行“铸造人们灵魂”这样严肃的工作，要始终注意，使我们的思想、演讲、写作，能够经常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当群众的先生，必须先当群众的学生，这应成为我们永志不忘、身体力行的座右铭。

这里，我提一点希望。

希望研究会的同志都来关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问题，并通过你们的工作使更多的人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一九八八年我到广东调查，走了二十多个省市，到一个地方都顺便问一下干部情况，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县级的干部，几乎全是土改以后的了，只有地市级的干部中还有若干是土改中间出来的，或者是土改时的工作队员，或者是农民积极分子。这些经过土改锻炼成长起来的同志，年龄大体是五十五岁左右。按照男同志六十岁退休，女同志五十五岁退休的规定，再有三五年的时间，土改时的干部几乎都要退下来了。再过三五年以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也先后要退下来。他们都退下来以后，新上来的同志怎么样，能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的班接下来，这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一个很严肃、很紧迫的

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关注这个问题。

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有一句话，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这个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不完全准确。回顾一下历史，大家都知道，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下厂、到部队，当了农民、工人、士兵，前后延续将近八年。怎样看待这件事情？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要做具体分析。从城里下去，耽误了文化学习，但也得到了另一方面的收获。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了工人，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士兵。从长远看，知识分子要想有所作为，同工农兵相结合是一门基本的功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毛主席讲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是跟工农相结合。同工农兵相脱离的知识分子，不管他自以为多么高明，工人、农民、士兵是不会欢迎他们的，对我们的国家、社会也不会有多大贡献。动乱“精英”必然要垮台，非垮台不可，就是因为他们眼睛里没有工农兵。“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些人制造出了一种舆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间的最优秀的一部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是社会的领导阶层，只有他们才能领导社会前进。“精英”参政就是他们的纲领。看看他们的文章，听听他们的讲演，没有一个是讲工农兵的。我们社会的主体是工农。动乱“精英”是完全脱离工农的，理想就是追求资产阶级的超人地位。动乱“精英”是民族败类、洋人走狗。这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自己写下的结论。知识分子中如果有人下定决心跟他们走一条路，下场也是不美妙的。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站在时代前列的

人只有同工农兵相结合，结合越好，成就越大。中国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是工农兵。在这个国家进行活动，如果不把自己的全部身心贡献给工农兵，贡献给最广大的人民，对这样的人，工农兵为什么要爱戴他？为什么要尊敬他？过去的地主老爷已被推翻，现在有什么理由再把这些新老爷供在人民的头上，让工农兵在他们面前下跪、叩头、三呼万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九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据教委同志讲，在三四年里考入大学的，多半是曾经下乡、下厂、到部队的青年，他们大多数学习成绩好、作风好、政治思想好。参加各部门工作的，多数也是好的。后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些青年中有些人成了自由化分子，或者成了自由化分子的俘虏。但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各条战线的新生力量。

总之，这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几次考验，有相当一批成为各条战线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如果我们党的各级组织，经过扎实的了解，经过群众中的考查，在这些人中间发现、选拔干部，是大有人在的。

我很希望今后能够吸收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到我们研究会里头来。你们做文字宣传也好，口头讲演也好，希望能关注这个问题，有意识地注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

从毛主席一九六四年提出培养接班人以后，“文化大革命”中间走了弯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先是大批恢复各个历史时期老干部在各级组织中的领导任务，随后按照“四化”标准，培养、选拔了成千成万的中青年干部。今天以

前,从全党来说,基本上保证了干部队伍的老中青梯级结构。这是十多年来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组织基础。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除极少数以外,都将先后退出领导岗位,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的二十几年内由什么人来掌握领导权,现在已成为极其紧迫的问题。鉴于外国党的痛苦教训,这个问题更应十分重视。

接班人的标准是什么?扼要地说,必须是共产主义的战士,就是为我们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奋斗的忠诚战士,当前为着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想着为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纲领而奋斗。

请我们研究会的同志关心这件事,发现这样的人,宣传他们的品德,介绍他们的事迹,让人民了解他们,相信他们,同时让人们监督这支队伍,保证他们真正成为毛主席讲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陈云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讲党的建设时说,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这是共产党员自愿宣誓要干的事,也是党对每个共产党员的要求。陈云同志还说,人一生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共产党员的可贵,就在于各种各样的考验都能经得住,到死的时候,一身干净,问心无愧。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参加共产党是为了什么?一定不是为了做官、发财、出名。这在我们党内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去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东欧的演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国站住了,东欧一些国家变了颜色。毛主席活着的时候多次讲过,如果共产党的领导层中间出现了修正主义,



就可能亡党亡国。现在这个话在东欧一些国家应验了。中国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社会主义站住了。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个历史现象，国际范围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两种不同的结果，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有朋友问，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包围圈是不是越缩越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共同语言的是不是越来越少了？邓小平同志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有信心。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前途光明。这比列宁、斯大林时期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情况好得多了。那个时候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间取得了坚持社会主义的胜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打败了希特勒。现在有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以社会主义苏联为生力军，打败了希特勒，不仅救了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救了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社会制度，怎么能没有前途？那个时候只有苏联一亿多人口，现在中国就有十一亿多人口。当然，我们应该正视现实的问题，要组织我们的力量，把经济搞上去，做好各项工作。我们要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这个口号，在东欧已被一些人勾销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要继续高呼这个口号，高举这面旗帜，为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进行毕生的奋斗。

## 关于编写《无产阶级革命家 风范》丛书的几点建议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四日)

编写这套《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费很多心血，不应该搞急就章，不可能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一点，请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志，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全力以赴，打一场硬仗。做好这件事，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有重要意义。认识到了它的意义，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就有决心去做，日思夜想，千方百计，为伊憔悴终不悔。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山南海北，我们的读者千千万万，各种各样思想，各种各样层次。这套书出版后，自然会有各种各样问题提出，各种各样反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接受社会检验。我们的主观愿望，是要起好的作用，正面影响。但我们的美好动机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转化到现实中去，这确实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辛勤的劳动。这里没有取巧余地，终南捷径，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就是要用你们形

象的笔,把实实在在的东西反映出来,深刻揭示时代的必然性,感人至深地撞击读者的心弦,使人们在价值观、伦理道德观、审美情趣等的取向上有一个正确的引导,而在社会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情操、爱国主义、正义感等等方面都有所回归和增强。要能做到这样,除了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素材外,在写作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同志多商量,多请教,写出稿子以后,还要多听取有关同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一定不要怕麻烦。

人们常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历来的经验就是这样,写东西必须经过多次反复,不可能一次完成。毛泽东文章写得非常精彩、漂亮,是写文章的高手。但是,他的文章,都是改过多少遍的。看他的草稿,改过来改过去,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有细心的勾画,有大刀阔斧的删削,前填后补,纵横交错。我们写东西难道就不需要多改几遍?写过文章的都有体验,文章真要下决心改,总是有得改的。而且一般都会改得更出色,质量更高,千锤百炼,百炼成钢。

同志们从事写作的时间都比较长了,写出了一些好作品。可是,对这套丛书撰写的要求比以往的更高。这套书的编写出版,人民出版社要负责任,作者要负责任,我们所有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都要负责任。你们的稿子,我起码看一遍,尽可能提出意见,共同负责,先把毛泽东的这本书写好。

你们看的材料多,我不可能像你们那样看许多东西。所以,不可能在材料问题上提许多具体意见。我所知道的事

情，一定无保留地提供给你们。但能否帮助得法，帮到点子上，这也不是容易的，绝不夸口，只是各司其责，我也来尽一份责任，献出一点绵薄的力量。本着这点精神，在你们动手之前，根据最近几年自己接触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些想法，希望你们在写作中能多少有所考虑，站得高一点。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写东西都有一个高度问题。这个高度不是生造的，是客观存在的。就像屹立着的泰山，就那么高，我们应当攀登上去，站在峰巅上，一览众山小。要有这个气魄。这样我们也许能下笔如泉涌了，感情一来，兴之所致，话也就来了嘛。因此，我说：

第一，在写这部书的时候，不管你们各自写哪一部分，都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问题。毛泽东是一个划时代的世界性的伟大人物，这一点连许多有政治头脑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巨大的智慧，有许多为人所不及的创见和政治远见，这越往后越看得清楚。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毛泽东生前考察世界性的问题，曾多次警告我们党，如果我们的事情搞不好，很可能亡党、亡国、亡头。这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证明不是。一九八九年的动乱和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某些领导人在其间的表现，说明真有这种危险。我们闯过了这个险关。由于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党中央的多数同志，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健在，经过严峻的斗争，我们没有亡国，也没有亡党，暴乱在几天内平息。事情发生得比我们国

家还晚的东欧那些国家（除了波兰事情发生得比较早些外），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以后，先后都亡了党，社会主义国家变了颜色，干部、领导人普遍遭到迫害，有的被审判。这样的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第一回，令人触目惊心。毛泽东的预见，不幸成为现实。

危险普遍存在，这是一方面。但是，两相对比（先不说苏联），我们能够平息暴乱，东欧国家却经不起，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党和国家都变了颜色。这又是一方面。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想一下：原因是什么？教训是什么？找出一些启发我们写毛泽东、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事迹的思想和原则来，哪些东西是经过历史考验，证明确实有益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也同样有益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要把这些宝贵的东西，挖掘得深一点，写得更好一点，表达得更令人信服，使人从中得到教益。

存在决定意识。其实这一问题，不仅我们想到了，一般群众中、青年中的不少人，以至于参加过动乱的一些青年学生、青年教师，也都认识到了。我听到一种反映，原来对平暴意见很大的一些人中，有的在发生东欧事件之后，冷静了。说，是呀，如果我们继续闹下去，闹得与东欧一样，那我们的国家将会是怎样一种局面？我们自己又会是怎么样的呢？后果确实不堪设想。事实使人们不寒而栗。

东欧国家目前的情况，确实惨极了。像原来的民主德国，人们曾幻想德国统一后什么都会好起来。结果没想到，原有的东西都丧失了，新的东西没有得着。一个原来工业基

础较好的民主德国现已弄得百业凋零。失业成为严重威胁。原有的企业破产的破产，停顿的停顿。原党政机关和科研单位的几十万人“待业”或提前退休。整个原民主德国地区九百万左右的职工中，已有四百多万实际失业。“还乡团”一个跟一个回来，进行反攻倒算，要回企业，要回房子。东德人成为二等公民，受到歧视和限制。克伦茨接替昂纳克担任总书记，是昂纳克把他扶上来的。没想到这人那么糟糕，现在也靠卖稿子为生，而且是在一些很低级的刊物上卖文。不少人抚今追昔，追悔莫及。有人说“两德之间的边界墙拆除了，但一条穷富界墙却在不断加高加厚”。

参加过一九八九年动乱的青年人，有一些确属幼稚、没有经验。他们的出发点不一定坏，如对腐败现象不满意，很希望切实地反腐败。对腐败现象，当然不能满意，要反对。可是，他们的行动不对头。那样个闹法，闹得全社会不得安生，整个国家不稳定，以至于很可能把我们多少先烈浴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葬送。怎么能这样呢？他们原以为这样闹闹，促进促进，事情就会好起来。他们不知道一闹起来，怎么个发展，怎么个走向，那就由不得个人的愿望了。

回过头来，我们考察一下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的实践、毛泽东的理论，是怎样使我们赢得胜利，怎样使我们在如此惊心动魄的动乱、暴乱中坚持下来？我们可以为之骄傲和珍视的是些什么？这里边范围广原因多，一一论述有很多文章可做，任何个人都包不下来。概括地讲，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形成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从而走出了一条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其中包括了如何建设一个好的党、如何建设一支好的军队、如何组织一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等重要问题的解决，这才使我们从千难万险中走过来，最后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领导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里，每一条都有极大的容量，可以写出许多动人的篇章。我挂一漏万，只想集中说一点，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也好，对苏联也好，对斯大林也好，在处理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上，在处理中国党和苏联党的关系上，在处理和斯大林的关系上，与东欧各国的党不一样，与其他国家的党不一样。所以，我们党比较地经得起风浪，站得住立得稳，履险若夷。

在延安时期，我参加了整风，知道一些事。党内三十年代的“左”倾以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应该说都来自共产国际。但是，在整风中，毛泽东不主张去强调客观原因。他说，不管共产国际是对还是错，中国人执行了，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损失，负责任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如果一推了事，我们自己毫无责任，那什么教训也得不到，改正错误，接受教训，就成为空话。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在延安整风中，开展批评，总结经验，重点放在我们党自身上，强调内因，强调主观方面。同样是共产国际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同志中，有的执行起来能够有分析，

对的很好执行，不对的就不照着办；而有些人就不加分析，没有批判，笼而统之，认为共产国际的都是对的，照抄照搬，结果错的错了，对的也没执行好。用毛泽东提倡的方法和态度总结经验批评错误，将问题置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下来研究和分析，得到的教训更深刻，更有利于团结进步。这些道理清楚了以后，特别是看到毛泽东的主张、方法实行的结果，我们感觉到毛泽东确实与众不同。

例如，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明路线，但是，他始终掌握住分寸。当时，我们想，六届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下命令召开的，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也是共产国际定的，四中全会的错误那么严重，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那么大，王明这错那错，既然这样，四中全会是否合法？王明等人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叫不叫篡党？说四中全会的召开是非法的，王明等人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是篡党，这样的问题一提出来，那就不止是中国党自身的问题了，而且问题的性质也变了。我参加了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的揭发、批判会，那场面可不得了。特别是那些参加了革命根据地艰苦创建的同志，上台揭发批判尤其激烈。他们的气大了。是啊，我们原来搞得好好的，你们来了，你们的路线来了，局面完全改变，根据地被搞垮，红军被打散，许多同志牺牲，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不但认定这些人在政治路线上有问题，思想路线上有问题，而且怀疑这些人是不是特务，是不是国民党奸细。毛泽东看到了，认为这样的会不能再開，继续开下去非“炸”了不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及时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指出，我们



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上讲，只要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我们也要承认它是合法的。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毛泽东创建了中央红军，创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指挥一、二、三次反“围剿”打了胜仗，第四次反“围剿”虽然不是他指挥的，但也是按照他的战略去打和打胜的。第五次反“围剿”时，却把他排挤出外，“左”倾领导者不允许他参加军事领导，结果中央苏区丧失殆尽，来了个大撤退。撤退时，也不和他商量。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心理，他不生气？他不激愤？如果他也像一些人那样感情用事，中国的事将会怎样？革命会成功吗？所以不能感情用事。毛泽东豁达大度，头脑冷静。目光远大，没有感情用事。

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也是这样。在一九五六年《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讲，我们对斯大林有三肚子火：一是他支持王明“左”倾路线；一是解放战争开始前他不让我们反抗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说如果打内战，哪怕是被迫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一是中国革命胜利后，他又怀疑我们的胜利是所谓“铁托式”的胜利，直到抗美援朝后他才把给我们戴的“铁托帽子”去掉。一想起这些事就让人生气。但是，我们对斯大林作了“三七”开的全面估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没有感情用事。我们不能因为斯大林曾经对我们党的态度不好，曾经给我们党的事业带来损害而分不清这些界限。要讲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摆老子党的恶劣态度，毛泽东从来最坚决。他的骨头很硬，决不低中国人的头、丢中国人的脸，在维护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丝毫不含糊。但另一方面，在当时还要照顾中苏团结，照顾各国共产党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个大局，毛泽东没有忽视。

在这些方面，我们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东欧一些国家的党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党同共产国际、同苏联共产党、同斯大林、以至同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建立的关系都很不正常，完全是毛泽东过去所批评的不平等关系。一直到这次东欧事件期间，仍然表现了这种关系。东欧国家吃了大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这里。别的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到人家的政治局去发号施令，强迫人家的总书记、主席退出第一线，强迫人家在西方资本主义进攻面前让步。东欧国家这次是受着两方面压力的。一方面是西方国家

资产阶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压力。他们对这两种压力都顶不住,投降、退却、妥协、让步,最后直至把国家把党把社会主义统统断送掉。只有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支军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几十年来经历多少严重的危险、曲折,始终站住了,发展前进。

这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的必然。这一历史必然,是同毛泽东他们这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长期的思想和实践分不开的。靠着这些思想和实践,锻炼了我们的党,培养了我们的干部,建设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了一整套好的传统和制度,使党和国家能够经得住各种风浪,承受得住任何方面的压力。毛泽东也好,党的其他领袖也好,还有我们的将帅们,我们要从他们的身上发掘这些宝贵的东西、优秀的品质、作风和传统,用以教育青年,教育后代。

第二,要从这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事实中去考虑一些问题。一九八九年发生的动乱和暴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到顶点的恶果。这种思潮和它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一切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产生妄想,使一切反动力量有可乘之机。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千万不能低估,不可小视。它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危险的思潮。我们国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苏联和东欧都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一种世界现象。东欧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即民主社会主义。这些国家的翻船、巨变,也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泛滥到顶点的恶果。

考察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的发展规律，我们看到各国的情况竟是那么相似。在中国，从“非毛化”开始，一直到攻击邓小平，全面否定历史。在苏联，从“非斯大林化”开始，最后也是全面否定历史，一无是处。他们否定苏联历史比赫鲁晓夫厉害得多。好在我们党在一九八一年作出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一个准绳在那里，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最终也很难乱我们。听到去苏联考察过的同志说，有整整一年半的时间，会议、报纸、刊物、各种小报，从上到下，以至穷乡僻壤，都搞所谓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就是什么谣言都可以散布，什么坏话都可讲，都不负责任。说斯大林迫害，夸张到这样程度，杀掉了五六千万人。斯大林的孙子就驳斥说，如果照他们计算，在德苏战争爆发前的苏联，能有两亿一千万人口就没法解释。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当然不对，应该批判、纠正。但纠正错误却搞成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的结论，这哪里是纠正错误？能有什么好结果？这样的“公开性”、“民主化”一来，就把一切不满的因素调动和聚集起来，那些被打击者的后代，很多人都成了反共反苏的急先锋。

说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话都可以不负责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团体，处在这种状况，怎么维持？最近我听联络部的同志说，苏联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大小不一，现有九万多个，党派林立，全国性的也有二三十个。结果当然不妙，天下大乱，各路诸侯旗幡飘摇。

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搞垮我们，

从否定历史人物开始，到否定历史，否定一切。他们搞的也是先破后立，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塌糊涂，然后再讲资本主义好，大肆贩卖一整套西方资产阶级的货色。

因此，我们编写这套丛书，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要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搞乱了的部分思想（不是全部也不可能全部）拨乱反正，还事物以本来面目。你“非毛化”，我们恢复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作正确评价。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对最起劲、最坚决、最厉害的地方，我们应用具体的、丰富的材料，运用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文字语言，把它驳倒。当然，也不能要求过高，太高了达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使那些曾受过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影响的人，看了我们的书，能够有所比较，原来那些人说的站不住，这才是有根有据的。就拿毛泽东与斯大林来说，毛泽东不同于斯大林。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导方针。我经历过这个运动，那时候叫“抢救失足者”，搞得草木皆兵。运动高潮时，我们那个单位中央政治研究室，被怀疑有问题的占到百分之二十，这还不算高的。有的单位，多数知识分子被怀疑。甚至有这样一种论调，说表现得最好的，问题是最严重的。几乎每个单位普遍提出这样要求，说抢救的对象太顽固，不愿坦白交代，明白向他们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可还是那样，什么办法都使了，不起作用，只有一个办法，枪毙他一两个，其他人就老实了，坦白交代了。这样的情绪和要求，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说一个也不能枪毙。只要哪一个单位枪毙了一

个，其他单位都要跟着效法，杀戒一开局面不可收拾。毛泽东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以后基本上成了党的内部审干中的一条原则。“文化大革命”虽然有一些很重要的同志被迫害死了，但由于这条原则起作用，还是保护了绝大多数被审查的同志，不至于像斯大林搞的那样，大开杀戒。头掉了再也装不上去，知道冤枉了难以挽回。只要人还在，冤枉的事，党总是要实事求是地给以纠正和平反的。

真正要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肃清，要作长期的斗争，要做许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就是从写书的角度，做一部分工作。现在需要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要从当前出现的“毛泽东热”现象中思考一些问题。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很有趣。对毛泽东、对邓小平、对共产党诽谤、否定到了那种程度，等到东欧事件发生后，在中国青年中却出现了一个“毛泽东热”。在出版社也反映出来，过去积压的书籍都陆续卖完了，读者还纷纷要求再版。实践给了人们很多回答，也推动人们寻求更多答案。中国有毛泽东打下的基础，没有出现东欧那样的历史逆转。东欧各国没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那里发生了问题。毛泽东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说得那么样，到底怎么样？

在青年中的“毛泽东热”，一个重要反映，就是真切地描写毛泽东、使毛泽东从神坛上走下来的书，即表明毛泽东不是神、也是人，是有血有肉可以亲近的人的书，传阅得最广。在这点上，权延赤的几本书是起了作用的。尽管他的书有缺点，但书中写的许多事，使青年人了解到，毛泽东并非

不可想像，他和大家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接近的，他仍然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参观过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不禁深有感慨。有的人没去以前，“云里雾里”，总以为毛泽东多么挥霍浪费，生活怎样作威作福，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就是那样造谣诽谤的；一参观，“落地”了，平平凡凡，普普通通，毛泽东穿的、住的、用的，屋里的摆设，没有特别。毛泽东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严，装是装不出来的。他不追求身外之物。他稿费多，逝世前存有一笔钱。据我所知，他从未把钱用于生活奢侈品上，而是经常接济别人。对子女，包括对江青，他是不大方的。他交待，在他逝世后，他的稿费交给党。他有爱好，他一生最喜欢读书，写诗写词写字，欣赏字帖。他追求的是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张贻久写的《毛泽东和诗》、《毛泽东的书房》，逢先知等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等，对此都作了反映。这些固然属于个人爱好，但更重要的是他一辈子想到的都是人民。

“毛泽东热”在青年中唤起对毛泽东的感情，唤起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热情，要看写他的书，为什么？究竟青年人喜欢以至于崇拜毛泽东的哪些方面的品质？哪些东西对他们的成长会起好的作用和已经起到了好的作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写东西总要考虑读者需要。现成的事实已经作了初步的回答，这种现象已经有一二年了。这等于是一种社会调查，等于是一种民意测验。因为这种现象不是人为的，是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在经过了中国的事态和世界的大变化之后，了解和研究“毛泽东热”的社会现象，对我们的写

作有好处。

当然，有的人对“毛泽东热”现象作过研究和分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当中包含青年人的一种怀旧情绪。说它“怀旧”是不确切的。因为这种所谓“怀旧”，就是指对现实不满，对腐败、以权谋私、贿赂风行等情况看不惯，但自己又无能为力，只好把感情寄托到过去。毛泽东当年搞“三反”、“五反”那么坚决，毛泽东的生活那么节俭、刻苦，要是这样多好啊。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这方面，全在于我们如何引导，怎样工作。如果我们党不能够解决反腐败的问题，不能够整顿好党的队伍，不能够纠正干部以权谋私的坏作风，甚至让其更发展、更厉害了，那怎么能让人满意？对我们党来说，通过“毛泽东热”的现象敲一下警钟也有好处。而且，青年中出现“毛泽东热”，正好说明这是可以引导的。引导他们学习毛泽东，引导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丑恶现象进行坚决的持久的斗争，不灰心丧气，而且明白丑恶的东西总是要被克服的。毛泽东领导我们把三座大山都推翻了，我们就不能战胜这些丑恶的东西？只要人民觉悟了，党员觉悟了，各种问题总有一天能够解决。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毛泽东热”现象中好好地想一想，应该写些什么，可以写些什么，哪些是能够被青年人接受和值得珍视的。

第四，应该通过海湾战争这件事想一想问题。海湾战争发生后，多数人预计到伊拉克非败不可，美国也一定要打赢这一仗。道理很简单，一个伊拉克怎么抵挡得住拥有高科技



的多国武装的进攻，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一致向一个无助的国家开战，战争的结局可想而知。这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不一样。当年朝鲜人民进行的战争和越南人民进行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是正义之战，而且还有中国和苏联作为后盾，同中国的国界又挨着。而伊拉克确实输了理，侵略了科威特，道义上站不住。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所要形成的结果。美国利用了这面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旗帜，去干他想干的事。就是尼克松讲的，既不是为人权，也不是为自由，而是为石油。能够看清楚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全球霸权主义与地区霸权主义之争的，开始人不多，现在看出这点的人多了。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战争本身怎样，而是这样一搞，美国巩固了他充当“世界宪兵”的地位。有了这个先例，哪个地方他想侵略，他想争夺，他就会找个借口照此办理。老实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上，美国一直在做文章，在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

所以，通过海湾战争，我们在观察世界的形势，观察资本主义国家的动向和政策，应该坚持什么样的观点，要好好想一想。没有别的，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复杂的国际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想的也好，做的也好，不致迷失方向。放弃阶级斗争的学说，不用阶级斗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对待世界问题，我们就会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以至于在政策上、行动上犯严重错误。

在国际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阶级分析方法。他观察

世界，观察资本主义，观察第三世界国家，观察社会主义国家，在每一重大事件中得出的结论，采取的措施，都经过阶级分析。对于我们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尊严等，毛泽东非常敏感，非常敏锐。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斗争，他是无所畏惧的。表现在对朝鲜战争问题上、对台湾问题上、对越南战争问题上、对印度问题上、对柬埔寨问题上、对苏联问题上，对赫鲁晓夫问题上，概莫能外。他处理国际关系的问题时，是将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看成完全一致的，坚持认为侵犯或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的利益，就是侵犯或损害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他在这类问题上处理非常高明。

大概一九七四年底，我刚从“干校”出来，那时我国正调整对外关系政策，尼克松、田中先后来过中国，中美已恢复建交，基辛格再次访华时，毛泽东接见他，谈了些苏联的情况，谈得很融洽，但毛泽东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美国是不是有一种打算，想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弄得基辛格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半天没回过味来，非常尴尬。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尽管中美关系改善了，但他对美国的用心，从来没有丧失警惕。他是要告诉基辛格，你们要想利用我们，打“中国牌”，那是不行的。中美关系是什么样关系，我们心里有数，你们心里也有数。毛泽东通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方针，一直到今天，对于我们决定对外政策、对外关系，还有指导意义。这次我们被“封锁”，与我们关系好的还是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有一百多个。

我讲这些，提供同志们思考。你们选材、下笔、做提纲时可有所考虑。但并不是要你们把它们作为写毛泽东这部书的格局和部署，没有这个意思。

同志们谈到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怎么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同意逢先知的意见，不写，完全避开，不一定好。但应该采取两面的写法，例如，毛泽东是怎样对待犯错误的，是怎样采取办法纠正错误的。人嘛，都是会有过失的。这当中，个人的看法、脾气、性格等，都会起作用。毛泽东晚年犯错误，主要是由于他对形势的判断有失误的一面和越来越不能听取不同意见。但他也不是全部都不对，有的是因为做得过分了。我们知道，真理往前再迈出一步，会变成谬误。例如，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毛泽东敏锐地看到了。但是，他把当时中国和党内的实际情况估计得那么严重，以致采取“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却造成了内乱。

## 注 释

- 【1】 毛泽东：《学习与时局》。《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938页。

# 在北方地区城郊经济 研讨会上的讲话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一日)

城郊经济是这些年来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提出来一个很有生气的经济形态。同志们都是实践者,有丰富的经验和认识,有许多真知灼见。我在这个问题上知之不多,只能根据了解的情况,说点意见。

## 一、城郊经济和菜篮子问题

这些年,全国大中城市能够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副食品供应比较充足,原因之一是建立了菜篮子工程。在菜篮子工程的系统管理和调节下,避免了过去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或因某些品种经营管理不当而糟蹋的状况。商品短缺和经营管理不当,往往使物价波动很大,大起大落,损害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有利生产,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投入了巨额补贴。蔬菜价格有淡季和旺季的问题,应该随行就市,随淡季、旺季而有所波动。这完全是正常的。这些年来,一些城市菜篮子工程搞得好的,

这个问题也解决得相当好。在气候比较正常、没有重大灾害的情况下，蔬菜副食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平衡。旺季便宜一些，但不损伤生产者的利益；淡季贵一些，消费者也能承受得了。各地政府也因此减轻了许多补贴的负担。大家都得益匪浅。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城市建设、郊区建设中的一个很大成绩。

我认为，菜篮子工程问题很值得认真总结和研究。过去成功在什么地方？今后应该如何改进？我看在确保总量平衡的前提下，菜篮子工程应该扩大，不要只是着眼于蔬菜和肉类，只是狭义地去理解它，而要打开视野，打开思路，扩大范围，扩大内容。比如说，还有奶类、奶制品，水果、水果饮料，地方特色的食品，包括传统名牌产品和新产品，等等。总之，人们生活中所有吃的、喝的，都可以考虑进去，根据自己的地方条件和地方特点加以发展和开辟，满足人们生活中的第一需要。这是郊区建设中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这样来考虑问题，城郊经济的发展就大有可为，前途无量。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必要同营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我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许多地方已经到了小康的生活水平，甚至更富裕，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讲究一点营养学呢？事实上，现在许多城市的消费者已经不满足于数量的要求，开始追求均衡供应，饮食讲究多品种、高质量、无污染、营养型。讲究营养是一门科学，对人们是大有益处的，它可以指导消费，指导生产。

现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一种趋势，不仅东方在借鉴西

方的饮食方式，西方也在借鉴东方的饮食方式。过去西欧、美国等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以肉食、蛋类、奶类和乳制品为主，即所谓高蛋白型的饮食方式。现在他们经过研究，证明这种高蛋白型的饮食方式也有缺点，过多地吸收高蛋白，对人的体质、智力、寿命等的增长并不有利。他们发现，像中国这样主要是纤维型的饮食方式，即蔬菜、素食比重大，肉、蛋、奶比重较小，对体质、智力、寿命的增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他们研究的结果，说要取东西方两者的长处，既不要吃肉太多，也不要只吃蔬菜、素食，肉食太少。像日本这样国家的饮食，蔬菜不少，肉类也有一定水平，吃鱼较多，比较合适。

看来，我们的菜篮子工程，要保证城市副食品多种多样的供应，也应借助营养学的研究来加以改进。这中间，也可以结合高科技中的一些项目，搞生物工程，发展生物技术。不只是工业有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农业、种植业、养殖业同样有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营养学是个现代化的问题，生物工程更是一个现代化的问题。

对生物工程，世界上都在研究，不断地有奇迹般的新成果出来。我不太知道生物工程在我国已有怎样的发展和成就，但是无论怎样，应该引起我们重视。我们郊区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了，文化水平也有提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集聚一些搞生物学的、搞农学的、搞农业经济的各种科技人员，根据各地的情况，逐渐开展起生物工程的研究或推广应用是可能的。通过它可以逐步向高科技方面发展，减轻劳动

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改进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总之，我们的菜篮子工程，在“科技兴菜”方面需要多做文章，包括采用新的、科学的养殖方法和种植技术，也包括结合高科技搞生物工程等。例如，我在前几年听到的，北京的郊区实行网箱养鱼，投资的确比较大，但是收效也高。还有无土栽培。宁夏无土栽培育秧，是成功的经验。前年我在深圳看了一个国营农场，专门参观了他们的无土栽培种黄瓜试验。这种试验就是定期地向根部输送配好的营养液，结果黄瓜长势很好，收获很高，质量不差。关于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估计前途很大，困难不少，值得大家特别是科技人员重视。希望在有条件的城郊经济中有所考虑，使得在“科技兴菜”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 二、关于城市工业的扩散问题

城市里的工业不能过多，要扩散出去。向哪里扩散？最近的地方自然就是郊区。过去我们城郊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是依靠城市工业的扩散，在城市工业扩散的基础上发展起郊区各种门类的产品和经济。我想，今后城郊经济的发展仍然要借助这一条。如果说，菜篮子工程主要是郊区支持城区的话，那末，城市工业向郊区扩散也可说主要是城区支援郊区。当然，城区和郊区是一体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你支持我还是我支持你，不好截然划分。发展菜篮子工程也需要城区来支持郊区，郊区的工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同样是对城区的支持。所以，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损

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城郊经济的发展应继续借助城市工业的扩散。刚才江苏的同志讲的城郊经济要与城市工业结亲的问题，就是这个意思。城市，根据世界的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不能够任其扩大。城市太大，负担太重，而且对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因此，城市要发展、要进步，有一个朝着什么方向去发展和进步的问题。上海早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考虑，主要应向高、精、尖的方向去发展。不过我们国家大，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各个城市向高、精、尖的方向有它各自的过程。而且全社会也不可能只搞高、精、尖。陈云同志说过多次，要有不同程度的、不同水平的经济和经济发展。这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我们的国情出发。就拿工业来讲，有自动化的半自动化的，有机械化的半机械化的，甚至什么机械化也没有而只依靠人力、畜力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完全改变这种状态，不少城市还是这种状态。所以，在城市工业逐步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时候，一个工厂也好，整个城市也好，有必要把原有的工业逐步地向郊区、或者是县区扩散。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经验。就是同样建设一个工厂，所需要的开支农村比城市便宜得多，而且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过去农民如果不种地，只能跑到城里去找工作，也就是说只有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他才能离开土地，离开乡村。后来农村办了乡镇企业，情况大不相同，不种地也可以不离开乡村，这叫做“离土不离乡”。许多地



方，在乡镇企业里工作的人，收入比城市里的工人还要高，生活情况比城市里的工人还要好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已成为我们工业中间的一支新生力量。特别是江苏等地的乡镇企业，显示出了很大的优越性。所以，邓小平同志称它是异军突起。这种乡镇企业，在开始的时候，许多都是靠城市工业更新换代后转移到农村的老设备发展起来的。也有不是用城市里的转移设备，而是用我国自己制造的新机械新设备发展起来的。

经过这几年的改革，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乡镇企业的有九千多万。转移了这么多，仍然还是有剩余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也要发展，也要扩大规模，增加产品数量，改进产品质量。在这发展和改进的时候，就应考虑到，哪些事情在城里办，哪些事情可以在城郊乡村办。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很好的道路，对城乡都有利，对工农结合、城乡结合都有益处。所以，希望大中城市政府机关，包括工业、科研战线的同志，在考虑城市发展的时候，要充分利用时机把技术、资金、设备等向郊区农村扩散或辐射出去。恩格斯早就说过，城市发展很快，农村落后很远，这种情况只会造成农村和城市的严重对立，而且给城市本身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原来的城市发展已经遇到这个问题，要是现在不注意，等到问题成堆，改就难了，要费很大的事。特别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根据现在的估计，到二十世纪末，尽管乡镇企业和城市的发展会吸收一些农村劳动力，但农村仍将有一亿剩余劳动力安排不了。

因此,中国农村的劳动力应朝着哪个方向走,怎样发挥他们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这是各级领导同志、专家、学者都需要好好研究的重大问题。

### 三、正确看待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等问题

现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都有了“两户”经营,即个体经济户和私营经济户。在对这两种经济户怎么看的问题上,由于人们思想没有统一,有不少糊涂和错误认识。如有的说,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了,已经把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了,为什么现在又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走回头路?有的提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的甚至认为,五十年代的“三大改造”错了,整个路线、方针、政策全错了。这最后一种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大改造”是正确还是错误,在理论界、思想界也曾引起重大争论。

讨论任何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五十年代我国实行“三大改造”的评价也是如此。那时候,中国的小农经济似汪洋大海,能不能把亿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再则,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理论,结合中国实际,采取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道路,是一个成功的创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我们还把改造企业和改造人结合起来,

不但顺利地赎买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且顺利地把原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来消灭资产阶级也是一个创举。“三大改造”固然也有某些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等缺点，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如果没有“三大改造”的成功，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巩固，我国的经济也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在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帝国主义对我们封锁和包围的形势下，我们就会经不起风浪。现在，我们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是党的正确方针。因为我们实行了“三大改造”，有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又因为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有了公有制这个坚实的主体，所以能够率领其他经济成分，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有机的、协调的繁荣发展。应该看到，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全民的也好，集体的也好，尽管有很大发展，但是要把所有的问题完全包下来，确实有困难。特别是刚才说到的，农村这么多剩余劳动力，都要吸收到全民的和集体的企业中来，国家没有这个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鼓励个体经济适当发展，把私营经济的路子适当放开，从全局来讲，从公有制的本身来讲，都是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即使这样，现在工业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私营的，还有外资的、合资的、三来一补的，统统算在一起，只占百分之八的比重。商业中多一点。所以，对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经营应继续适当发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当然，个体经济发展了，私营经济发展了，会带来很多新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果出现问题以后，就认为个体经济不要搞，私营经济不能搞，那是片面的。关键在于，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全局在胸，要有预见，要对发现了的问题想办法及时解决，进行正确的引导。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要继续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有益发展，支持他们守法经营、勤劳致富，要继续吸引外资，要搞合资企业，这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但在坚持这一方针、政策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发展的时候，在和外商搞合作的时候，在同他们打种种交道当中，怎样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共产党员的党性，保持国家干部的民族气节，坚决按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办事，廉洁自爱，就十分重要了。

总之，只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去办，加上我们精心的工作，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于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相信，是可以处理好的，并且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 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一九九一年六月)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中的《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一文，是专门讲思想方法的，就是“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这六个字是陈云同志在延安就讲过的。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云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已经作了解释。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对这六个字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要看到正面，还要看反面；不仅要听正面的意见，也要听反面的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sup>【1】</sup>

这里，陈云同志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认识的辩证法。

陈云同志讲，在延安的时候，听了毛泽东同志所做的整风报告，看到毛泽东同志给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他就反复考虑，怎么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除了“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以外，他还归纳了九个字，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精辟地表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所谓“不唯上”，当然不是说对上级的指示不要研究，不要执行，而是说，任何下级的同志接到上级指示的时候，都要考虑怎么样结合实际情况贯彻执行，不是机械照搬，当收发室。

所谓“不唯书”，当然不是说不读书。在延安的时候有两个读书小组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其中一个就是陈云同志的读书小组。他们这个小组，认真读了《马恩丛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志把三卷《资本论》读了三遍。我亲自听他讲，说他在后来的几年，把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著作，从《列宁全集》第26卷开始，反复读了好多遍。陈云同志一贯主张认真读书，并且身体力行。他说不唯书，不是说不读书，而是说，读书的时候要认真领会精神实质，要结合实际，看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陈云同志讲，列宁十月革命以后的几卷著作，他最注意的就是列宁怎么样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作风，保证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他在读书的同时，认真总结我们党的经验，对照毛泽东

同志所犯的错误的以及“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民主生活可以说没有了，一个人说了算。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给李先念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说寄希望于新的中央，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说这个问题最大，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将无法估量。

所谓“只唯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列宁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2】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在一九七七年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陈云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就是“实事求是”这么个题目。他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和实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上也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九个字，“全面、比较、反复”这六个字，并不难懂，问题是做起来很不容易。陈云同志主持的一些会，小会也好，大会也好，他经常讲，我们现在是讨论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错误的意见也可以大胆地讲，错误的意见“左”可以“左”到“左”倾冒险主义，右可以右到右倾机会主义，都可以讲，讲了以后都不记账，这都不算错误，讨论问题嘛！不能够只准讲正确的意见，因为在什么叫正确、什么叫不正确都还没有辩论清

楚的情况下，只准讲正确意见，那问题就不可能深入讨论了，各种意见就展不开了，思路就狭窄了，头脑就闭塞了。

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陈云同志一向的方法是，他即使有了一个意见，也不先发表，而是引导同志们讲各种意见，特别是有意识地引导同志们来反驳、批评他自己脑子里头已经形成的意见，从这方面攻，从那方面攻。这样攻的结果，很可能把原来设想的意见中不完全的部分加以补充了，某些不正确的部分被驳倒了，就可以下决心放弃它。陈云同志在讲到商业工作时说：“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3】还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4】陈云同志这里虽然是讲商业工作，但包含着很深刻的辩证法的哲理，是有普遍的意义。

还有一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而陈云同志做得最好，就是要讨论一个问题，决定一个问题的时候，要把最坏的方面，最困难的方面估计够。把最坏的可能性想到了，就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没有来到，那很好；如果这种最困难的局面来到了，我事先有精神准备，那就有办法应付，不至于惊慌失措。

五十年代陈云同志管经济工作的时候，外贸部、商业部有几个同志不那么心服。陈云同志的正确意见他们也不太



赞成，明明作了决定，可是执行起来不照着决定办，结果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于是，有的同志就说，你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不听陈云同志的话，不按照和陈云同志一起作出的决定办事，反对陈云同志嘛！这也反映出我们党内存在着的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谁有了错误以后，跟着就说，你的错误最严重的就是公开的、秘密的、当面的、背后的反对某某同志。陈云同志说，是非是应该分清楚的，但是说这几个同志反对他，他没有感觉到。他不赞成这样来批评这几个同志，更不赞成把这种指责写在这几个同志的结论中。陈云同志对别的同志一向持这种态度。在讨论哪个同志的错误的时候，他也提出批评，但他总是要讲，不要随便说人家反对这个反对那个，不要说人家这个是反党那个是反社会主义，同志嘛，是非分清就行了。

对照着陈云同志讲的九个字和六个字，来检查我们自己，差得太远了。陈云同志确实是我们的模范，不仅思想方法是我们的模范，他的道德和胸怀，他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也都是我们每个同志的模范。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同志，心胸狭窄，头脑闭塞，思想僵化，什么东西都进不到脑子里去。不用说他的意见是对的，别人反对了他，对这种反对他的人要整；就是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批评他的意见是对的，也是记仇啊，总想找个机会来打击报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恶劣作风可以说发展到了顶点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因为你批了我，我批了你，耿耿于怀，相互之间不以诚相见，这

对党的团结妨害极大。

陈云同志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模范，就是因为他处理每个问题的时候，总是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5】如果离开调查研究，尽管把实事求是念它一千遍一万遍，也做不到实事求是。《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有一段话，最好能够背下来，光是背下来还不够，还要真正照着这个话去做。这段话对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我们全党的作风，对于我们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实在太大了。这段话是：“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6】我们不常常就是这样吗？不少人成天开会，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现在一个单位的副职很多，“长”多了，按道理讲，总可以一部分人处理日常工作，另外一部分人用全部时间去做调查研究嘛。可是不，有的人会也不参加，只是在文件上划圈。在一个单位的范围内，很小的一件事，也得十几个人划圈，一个人压一天，十几天就过去了，非误事不可。

不搞调查就匆忙决定这个决定那个，这不叫主观主义叫什么？再也不能这样做下去了。

这里，我想就陈云同志是怎么样做调查研究的，给同志们作点介绍。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收集了青浦农村的三篇调查报告。陈云同志那个时候是政治局的常委，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同志们可以看看，陈云同志是怎么做农村调查的。

青浦农村调查是三个问题。一个是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一个是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一个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这是一个结论。陈云同志调查了一个公社十五个养猪场中的十个，然后又向嘉兴地区、苏州地区若干公社的干部进行调查，证明了这些地区的情况同他在十个养猪场调查的情况相同。经过调查，他说，私养母猪养得好，苗猪产得多，私养比公养的好处有六条。然后又讲到，无论母猪或者肉猪，私养比公养还有几条好处。算了细账，算了收入，同时也问了私养猪有什么缺点，好处调查了，缺点也调查了。经过这样细致的调查，得出结论说，母猪不下放，就不能恢复和发展养猪业，无论肉猪还是母猪都应该以私养为主。可是，陈云同志又讲，这个结论不能到处照搬，有的地方情况不同，就要有不同的办法。调查报告中讲到，上海市郊区蔬菜产区有十个公社，农民过去缺乏养猪的经验，他们不会养母猪，还不可能把大部分母猪下放给社员私养。这就不是一刀切。调查报告还讲，母猪要私养，肉猪要私养，私养就有个猪的品种问题，

所以，在一般的农村，为了改进猪的品种，公社、大队应该饲养良种的公猪和一部分良种的母猪。

我记得一九五九年或者是一九六〇年，陈云同志专门召集一些同志谈怎么样发展农村养猪事业的问题，开了两个星期的会议，对养猪的事情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个座谈会，我从头到尾都参加了。陈云同志所进行的调查是非常细致的。好比说，小猪刚生下来，除了喂奶以外，到了什么时候该喂什么东西，长架子的时候该喂什么东西，架子长起来了后，要育肥了，又该喂什么东西。一头猪从出生到出售，一共需要多少粮食，多少青饲料。在集体养猪的时候，精饲料就只好用粮食，而在私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泔水，都有剩菜剩饭，只是到了架子长成了，要催肥的时候，需要一些粮食。这么两相比较，国营养、集体养和私人养相差的粮食是多少？然后算账，国营养、集体养，要这么多精饲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有多少钱，搜集这么多的青饲料，需要花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钱？而私养需要花多少。经这么一算，私养显然要省得多。然后又算，喂一头猪要烧多少柴。农民私养烧柴，大人小孩从地里回来顺便捎带一点就够了，而要大规模地集体养猪，就需要专门供应烧柴，或者烧煤炭。从用工来说，集体养猪要专门有人来干，私人养猪就是老太太、小孩子附带地就干了。当时他还算了一笔账，私人养猪可以积肥，把这部分肥料卖给集体可以增加多少工分。这样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最后说，看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私养为主、公养为辅。你看，最后确定

的方针就是八个字啊，八个字说起来不过一秒钟，但是确定这么一条方针，是经过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后来根据这个会议上的决定，起草一个文件，那也不过是一两天吧。可是，得出私养为主、公养为辅这么一个决策，陈云同志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调查研究。一直到今天，二十年了，我们还是应该执行这个方针，因为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方针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地方限制社员养猪，结果没有肉吃。去年以来我们的猪肉供应大为增加，全国绝大部分大中城市敞开供应，是靠私养供应的，还是靠公养供应的？主要是靠社员私养供应的。

《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这篇调查，也是非常细致的。调查的结果，他说全面算账，种双季稻比种单季稻每亩多收稻谷二百二十斤，但是，种双季稻的各项损失加在一起，折合三百一十斤至三百三十斤稻谷，两相比较，种双季稻显然是得不偿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以后，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不能种双季稻。陈云同志指出，作物安排必须因地制宜。历史上长期形成的耕作习惯，不要轻易变动。不研究客观条件，主观地把单季稻改双季稻，把这作为增产粮食的主要措施，是不切实际的。他说，种不种双季稻，种多少，主要决定于无霜期的长短，以及人口和耕地的比例等因素。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地区，如果耕地每人不到一亩，可以种较多的双季稻；每人一亩半左右，就只能种少量的双季稻；如果每人二亩半左右，则以不种双季稻为宜。偏北地区，例如无锡，即使每人不到一亩，

种双季稻也不一定适宜。列宁把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7】斯大林也说过：“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8】陈云同志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都是这样做的。

搞农业一定要注意因地制宜。法国西部靠英吉利海峡的一片地区，原来种粮食，每亩地大概一年收二百来斤。后来，他们的农业科学家经过调查研究，根据那个地方的土壤、气候条件，提出改种牧草，发展畜牧业。这样一改，收入比种粮食大大增加。而法国东部这一部分地区，宜于种粮食，他们就多种粮食。地中海北岸，包括法国的南部、意大利的南部、希腊的南部，那里的土地很贫脊，而且不平坦，坡度相当大，他们不搞什么水平梯田，而是种葡萄，用葡萄酿酒，农民的收入很高。那个地方适合于种葡萄，他就不去种粮食，也不去花很大的气力改造什么地形啊，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益地去搞这个搞那个。可是收入很多，人们的生活很好。我们过去往往是一个命令下来，不分东南西北，不看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一律规定种这个种那个，结果经济效果很差。一种方法，尽管在这个地方是成功的经验，是完全可以增产的，可是别的地方在采取这种办法的时候，还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看那样搞法在我这个地方适合还是不适合。但是，我们往往并没有这样做。本来农民对这些事情是很懂得的，我们又不问农民。所以，农民就发牢骚，说他们种了几辈子的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种地了，全县只有县委书记一个人知道该怎么种地。今天该犁田了，该播种

了，该锄草了，该收割了，一个电话会议，一齐开工。这样管农业，作出的决定有什么根据啊！这样来管经济，怎么能够使经济繁荣起来，使国家富强，使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呢？

还有一篇是关于自留地的调查，题目是《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同志那个时候就提出，农民的自留地不仅不应该比高级社时期少，还应该比高级社的时候多一点。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四川的一些地方自留地扩大了以后，农民收入增加了，原来的集体耕地因为扩大自留地而减少了，可是产量却仍然有增加。四川是这样做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要反复跟农民商量，根据当地的条件，像陈云同志那样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要一个命令，说四川扩大多少，我们也照样扩大多少。各地有各地的条件，各地有各地的农民的需要，而且决定权应该在农民。“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五七干校”，地点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郊区的农村，叫做东营大队。他们老早就是自留地集体种，不分给每家每户。最近，那个大队有几个干部到我家里来，我问，许多地方自留地都下放了，划给社员自己种了，你们那个地方自留地是继续维持原来集体耕种的办法，还是也下放了？他们说，在社员中反复讨论了多少次，他们不赞成把自留地分到各家各户，现在还是把自留地单独划出来，集体种，大家觉得这样比分到每家每户更好。我问，是真的吗？他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他们那个大队一九七九年每人平均收入二百二十七块钱，一

九八〇年每人平均到了二百七十块钱了，一年增加了四十三块钱。全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户都盖了新房子；前些年盖的新房子，有的也重新改建了。我问，粮食的收入占你们整个收入的多少？他们说，占百分之四十五，其他的多种经营的收入，包括工副业，占到百分之五十五，超过了粮食的收入。果木树，我们在那里的时候还没有人高，果结的很少，去年光是水果这一项收入，纳入分配的就有十二万块钱。全国大多数农民是要求把自留地下放的，这个队就不愿意下放，分给社员，社员不要。中国的情况特别复杂，无论干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搞一刀切，不能用一个公式、一个模式到处去套，一定要因地制宜。

下面，我们再看看陈云同志对几个部门的调查。

先说一九五九年关于落实钢铁指标问题的调查。这个调查，花了三个来月时间。陈云同志调查了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从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到炼铁、炼钢、轧钢设备以及运输能力，都做了详尽的调查。调查完了以后，开政治局会议汇报，大概讲了一个多钟头。在这之前，钢的生产指标几经压缩，已经定为一千五百万吨。陈云同志经过调查研究，认真算账，主张钢的生产指标定为一千三百万吨。即使如此，他还是有保留的。他说，这次对钢铁生产指标的研究，只限于钢铁工业内部的各个环节，还没有对钢铁工业和其他工业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更没有对整个工业同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关系进行全面研究。仅仅就钢铁论钢铁，来规定钢和钢材的生产指标，还不可能完全妥当。因为



钢铁只是整个工业和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钢铁指标定得是否确当，经过综合研究以后才会看得更清楚。你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就钢铁生产内部的环节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还要特别说明，他调查了什么，什么没有调查。那一年，到了年底确实只生产了一千三百多万吨钢，这是花了很大代价才达到的。陈云同志事先就说得很明白，提出一千三百万吨这个数字，只是初步的，只是提供政治局进行考虑，还不希望做出最后决定。这说明，陈云同志实际上是有保留的。现在看来，当时不搞一千三百万吨钢更好，当时为了保钢铁，确实挤了其他部门，造成比例失调。假如不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降到一千三百万吨，还搞一千五百万吨甚至更多，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再说关于发展氮肥工业的调查。陈云同志是赞成大中小结合和土洋结合的。他还讲，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要长期并存，不然解决不了我们的劳动力就业的问题。但是，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一种倾向，就是片面强调“小土群”，甚至认为越小越好，越土越好。那时候搞了很多小化肥厂，陈云同志经过调查，认为小化肥厂技术上没有过关，经济上不合算，不能搞，应该搞大化肥厂。他不受任何现成公式的局限，经过调查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氮肥厂建设的规模、部署，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并且一条一条落实。比如，进口重要材料，定点制造设备，成套供应氮肥设备，以及国内材料的供应等等，都要落实。还指出要消除设备制造中的薄弱环节，严守基本建设的程

序。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为了使氮肥工业能够得到发展。可是他又讲，不应该也不可能用挤掉其他部门的建设的办法，来加快氮肥工业的建设，而必须在整个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全面安排的基础上，正确部署氮肥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建设。既要照顾氮肥工业建设的需要，又要照顾其他部门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站稳脚跟，在巩固的阵地上前进，使氮肥工业的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氮肥工业的发展应该这样，其他部门的发展也应该这样。一个部门的发展不能够脱离全局。我们管这个部门的，管那个部门的，常常是只顾自己，很少考虑全局，不考虑综合平衡。结果，既影响了全局，最终本部门也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

再说关于煤炭工业的调查。陈云同志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找了煤炭部的负责同志和下面的同志，反复交谈。在这以前，我记得有一位同志自告奋勇，说由他来管煤炭工业，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另外一位同志又出来，说他来管煤炭工业，还没有解决问题。原因就是没有对煤炭工业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后来，陈云同志调查了一个多月，把煤炭工业内部、外部的问题搞得清清楚楚了，煤炭工业的发展才算比较落实了。曾经管过煤炭工业的同志说，煤炭部有两个矿搞得很好，就是因为这两个矿不是实行计件工资而是实行计时工资的。那时候发生了关于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的争论，那个同志是不赞成计件工资的。陈云同志经过调查，揭穿了这个谜，原来那两个搞得最好的矿恰好是实行计件工资的。因此，陈云同志主张，在煤炭工业部门实

行计件工资。

《陈云同志文稿选编》倒数第二篇文章《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是对于国民经济全局和总体的调查。前边讲了，这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报告是作了历史的调查，典型的调查，部门的调查，一句话，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且总结了多年的经验教训才提出来的。

从陈云同志关于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每个同志都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犯错误的经验。是不是可以说，凡是我们的哪件事情办得比较好，都是从实际出发，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哪件事情办得不好，出了纰漏，使人民受到了损失，都是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我们讲实事求是的道理，如果不切实做周密的细致的调查研究，那只能是落空的。我们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面临着许多很复杂的问题，更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如果浮在上面，光是开会听汇报，据以决定方针、政策，甚至凭灵感，拍脑袋，想当然，这样处理问题，只能把事情搞坏。

我们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而犯的错误、受的损失也不能说少。广大群众在肯定我们的成绩的同时，也会原谅我们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失误。但是，我们自己对犯的错误应该感到内疚。我们今后一定要竭力避免再犯重大的错误，否则就太对不起人

民群众了。

### 注 释

- 【1】 陈云：《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11—212页。新版（1995年版）《陈云文选》第3卷将“全面”改为“交换”。
- 【2】 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第142页。
- 【3】 陈云：《做好商业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
- 【4】 同上。
- 【5】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4页。
- 【6】 陈云：《做好商业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4页。
- 【7】 列宁：《“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44页。
- 【8】 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430页。

## 记住垄断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的两句话\*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我想谈一点意见,就是要从世界历史变化的角度,或者说放在世界大舞台上,或者说以世界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零九年的历史,是资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侵略、掠夺、奴役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反对掠夺、反对奴役的历史。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受过帝国主义欺负、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可是,我们的青年一代,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已经接近中年的同志,对这一百来年的历史,就没有亲身感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先后或同时来欺侮我们、掠夺我们,使我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那是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个什么滋味，青年们并不了解。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无动于衷，似乎与己无关，打动不了感情。甚至有这样的人说什么，中国要发展，最好还要经过三百年殖民地的历史。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假如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愤慨，就实在很值得深思。

过去我们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著作很多。我希望有一部著作不讲别的，专讲从鸦片战争以来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签订不平等条约，屠杀我们的人民，掠夺我们的资产，侵占我们的领土，包括反动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各个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勾结，出卖我们的主权，出卖国家的利益，等等。要很详细、很具体、很切实地集中写出这段历史。江泽民总书记提出要对青少年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很有现实意义，也给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志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中国的一部近代史，确实是血淋淋的。在帝国主义侵略期间，我们牺牲的、被屠杀的人民难以数计，光是抗日战争中就有两千多万。一百多年来，究竟多少中国人民被屠杀，牺牲了多少英雄豪杰？帝国主义通过赔款、割地、开采我们的矿产等等，到底掠夺了我们多少资财？光是不平等条约，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每个条约究竟使我们的民族、使我们的国家受到什么样的损失？很需要有全面、翔实、具体的材料，用以进行教育和宣传。

中国共产党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三元里、太平天国、反洋教运动、义和团以及康梁变法、辛亥革命等等，

记载着中国人民不甘屈辱的历史。但是,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和先进思想的指导,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是,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历史本身要求新的领导阶级和先进思想。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帝国主义日益加深的侵略,首先在知识分子中激起反抗,然后扩展到全国的工人阶级、全国的各阶层,爆发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深刻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具备起来。当时特别重要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如毛主席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接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共产国际对我们的援助,我们党的成立,起码还要推迟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国内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关系,与国际共产主义的支持和援助的关系,本身就是应该很好研究的课题。

我们研究党史、国史,不能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内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不能离开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从最近的情况看,有两句话特别需要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主义同情者很好地思考,牢牢地记住。一句话是尼克松谈到西方援助苏联问题讲的:西方不是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第二句

话是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最近讲的：中国拒绝放弃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对美国和太平洋地区各国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这两句话代表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当前政治形势的估量，以及基于这种估量正在采取的重大决策。

尼克松讲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苏联内部还有人配合他们一道做。苏联的评论家说，最近，俄罗斯共和国大选的结果表明共产党实际上已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我们不仅要看到俄罗斯共和国已经形成的政治局面，而且还要想到下一步全苏范围内局势会如何发展。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值得关注。

苏联军队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取消了宪法中党领导的条款，也就全面否定了列宁亲自制定的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建军第一原则。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政治部门不再执行党领导军队的职能，而是作为军事行政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归各级军事指挥员领导，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虽然目前由于军队中健康力量的坚持，党的组织仍然保留着，但不再具有对军队的领导权，而是与其他合法政党一样，是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反共势力紧紧抓住“法制国家的军队应国家化”这一关键问题，坚决反对苏共组织在军队里存在。而当局在这一要害问题上又做了让步，表示“一切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军队里存在”。目前，反共势力已从极力拉拢军人参加社会上的政治组织，转向在军队内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最近发表文章指出：“各种党派同苏共争夺军队的斗争已经开始。”他们现在



正在酝酿取消苏联共产党在军队里的活动，党员个人还保留党籍，但是党的组织不再存在。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实现军队的非政治化。

东欧六个国家已经发生剧变，南斯拉夫现在处于分裂的状态。东欧各国发生的严重变化，确实证明社会主义处于低潮。

所以，我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要考虑到国外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要对这种思潮进行研究，在内部加强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我们必须严重关注事态的发展，提高觉悟，踏踏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使其尽可能缩小到最低程度。我们研究党史、国史的同志在这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提高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免疫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我们有不少同志早已看出，海湾战争以后，美国必然要挥师东向，想方设法对付中国。所谓挥师东向，并不是调兵遣将，而是要把它的注意力、把它的外交政策、对外活动的重点之一转向中国。首先遇到的就是一个最惠国待遇问题。布什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比较高明的代表，他的策略尤其值得我们研究。开头他不讲话，让那些公开的反华分子、所谓“鹰派”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政府，提出多种方案，其中有多种附带条件，有的附带条件非常苛刻。他们说，只有中国接受了这些条件，才继续保持最惠国

待遇，不接受就不给最惠国待遇。他们通过他们的政府来转达这样的条件，施加压力，寄希望于我们屈服。在这个问题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态度非常明确，策略也很灵活。像李鹏同志讲的，我们争取维持最惠国待遇，同时也准备最坏的可能，你不给，我们照样活得下去。明明白白地讲，最惠国待遇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赐，而是互惠的，我们得到好处，你们同样得到好处。你停止了，我们受到损失，你们同样受到损失。再三讲，决不接受任何附带条件。你要继续，我们欢迎；你要停止，我们也不怕。在这种情况下，布什出来讲话，还要继续。后来又一再讲，不附带条件，而且向国会做工作，做工作的道理之一，说美国在中国有一千多个公司，有四十亿美元的投资，这关系到美国的利益。如果去掉最惠国待遇，美国这些利益就要受到损失，美国的就业人口也要跟着减少。此外，还讲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停止了最惠国待遇，同中国断了联系，就没有办法到中国去了，没有办法接触了。这是政治战略上的考虑，也就是从通过各种往来来影响、来渗透、来颠覆、来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上来考虑的。布什自己说：“最惠国待遇是外部世界影响中国的一种途径”，“实行一种最可能改变中国的政策，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以，在这一点上，布什比那些“鹰派”高明。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决不可低估。他们在东欧已经得手，在苏联正在得手。有人估计，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很可能把“和平演变”的重点逐步

放在中国。对于美国当局的这类战略意图，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清醒，不要只看表面现象，不要只看到一时的缓和姿态，只听到一些友好的话，被这些所迷惑。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看来还没有下到最低谷，还在继续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地得手，他们得意忘形，迫切地加紧进行攻击。尼克松说，一九九九年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说，这个世纪末，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失败。布什当选总统以后就抛出了一个超越遏制的战略，步步进逼，打开了他们进入东欧的通道。

我们研究党史、国史时，必须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对形势要有明确的深刻的认识，精神上做好准备。做好了准备，事情就好办。十一亿人口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形势朝好的方面发展下去，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就有希望，就没有理由悲观。“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著名作家魏巍用毛主席《咏梅》中的诗句，来比喻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斗争的目前形势，是非常恰当、意义深远的。

## 调查必须真实\*

(一九九一年九月六日)

我作为丛书的顾问，要感谢今天在座的专家学者看了这部丛书，对它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既有鼓励，也有批评，还有建议。我们希望这部丛书继续出下去，能够继续得到在座的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的关注，随时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性的意见，使这套丛书不至于开头几本还不错，出到后来却不怎么样了，勉强充数了。应该相反，要一本比一本强，后来居上。这就需要专家学者的关心，需要专家学者的批评。

这套丛书，就规模来讲，已经具备。第一批出了，第二批正在进行，第三批马上要布置。按照原来计划，一百个县市各出一本书。这个计划看来有把握完成。今天开会，也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从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来讲，我看也考虑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成果鉴定暨成果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今后我们这套丛书不仅要如期完成,而且要高质量地完成,保证这一百本书在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调查中,真正成为高质量的丛书。这是关系到我们这套书影响好坏的问题。

在这方面,丛书编委会提出了八字要求。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真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在“大跃进”时期,吃亏吃得最大的是“浮夸”,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未能真实地了解情况产生的。人民公社化以后,毛主席曾建议全国编一本书,反映农村人民公社的情况,并布置了一百个公社的调查,分到各省市有多有少。各地都很积极,到时候把调查材料都送来了。由胡乔木主持编,胡绳好像也参加了。我们很热情地阅看,但看完后,觉得篇篇都是民歌,满篇都是想像。它们充分反映了当时的热情,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一种幻想。可是,究竟这个公社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工作进行怎么样,没有踏踏实实材料,也没有多少经过核实的数字,看不出每个公社真实面貌是什么。这本书就只好放弃,没有编成。

经历过“大跃进”,看到过“浮夸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同志,在座的很多。回想一下,说了假话,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是认识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总之都由于没有真实地反映情况,给我们的各项事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我们这套书已经出的,希望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些材料不太真实。今后出的书,第一条一定要保证我们用的材料、用的数字,包括语言,要保证高度的真实、完全的真实。

如果有些事情一时搞不清楚，就老老实实地说这个事情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等到下次搞清楚。因为这种调查对于做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决策的依据。如果这些书的材料不真实，是假的，依据了它来决策，怎么能够成功呢！非失败不可。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来讲，这些调查材料是他们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根据不真实的书所提供的假材料来发议论，进行研究工作，当然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不真实，害人也害己，而且还要害后代。书是留传给人看的。不仅我们要看，后人还要看；中国人要看，外国人也要看。刚才，孙越生同志讲，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书给国外的中国学研究提供比较真实的材料，使正直的学者能够掌握这些材料，能够得出正确的意见，有利于中外关系的改进。我赞成。说来说去，以后每一本书，参加调查的人、参加整理的人、参加审稿的人、参加编辑的人，都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保证真正的真实、完全的真实。有了这个以后，其他的事情都好办。即使写文章或作判断可能有不太正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不至于发生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从而非把人家引到错误路上不可。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部丛书，从今以后，第一位的问题是怎样保证质量，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真实。

# 反“和平演变”三论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 论自由化的阶级实质

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有的国家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从根本上看，性质是一样的。这种思潮在一些国家泛滥的程度比我们要厉害得多。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取得成就的同时，确也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而且没有很好地加以总结。这就给那些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包括接受西方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借口，使他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加以夸大和编造，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武器。我们国家，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比他们处理得好，不仅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伟大的，失误是第二位的，而且都是由我们自己郑重地改正了错误。有些国家犯了错误，长期不改正，末了，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来了个全盘否定。有个同志从苏联访问回来讲，在文学领域里，他们把高尔基

等被历史肯定了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无产阶级作家打倒了；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涌现出的，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一大批进步作家、革命作家都被否定了，文化战线完全是一种复旧、复古。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人批判鲁迅，批判郭沫若等，但是我们抵制了它，使正确的东西仍然占着优势，处于主导地位。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的《河殤》一出来，立刻激起人们的义愤，遭到了强烈的正当批评。所以，中国的情况同他们的情况大不一样。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纲领，就是以政治多元化否定党的领导，以经济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以思想多元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有的国家，不光有这种主张，而且已变为现实；不光搞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天天在宣传、在煽动，包括党的某些领导人也天天在搞这种宣传和煽动。说什么，共产党的领导权不需要用宪法来规定，要靠自己的工作努力来争取。这话听起来动听，实际上坏大事。中央不用说，地方的各级组织绝大多数因此在政权机关失去了领导地位。所以，从他们的情况来看就可以知道，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危险性是什么，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些人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掀起这种思潮，目的是搞乱人们的思想，最后乘乱夺取政权。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这一点到了动乱期间就很清楚了，动乱“精英”成为夺权“精英”。有的国家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做的，也是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想要做的。绝不要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



危险，绝不要把他们看成只是写写文章、发发议论；他们有他们的目的，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在我国就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陈云同志在一九八九年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现在这些人，在国内的收敛了一下，但心并不死；在国外的就天天张牙舞爪，大叫大喊。最近，方励之出了一本书，叫《推倒长城》。你看，连老祖宗都不认了，哪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这些“精英”自以为高明，说是独立的政治力量，是历史前进的领导力量，但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可以什么都不顾。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由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花钱豢养的一批奴才！他们如果建立起他们所要建立的国家，那只能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只能使中国重新丧失独立的地位，重新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绝不仅仅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一个党同这些买办势力的斗争，而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同这些民族败类的斗争。

这种斗争，不是这几年才开始发生的，实际上由来已久。在这个问题上，很需要读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毛泽东同志曾说，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不想建立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要实行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寡头的专政；他们的这个目的是实现不了的，因为工人、农民不允许，国际条件不允许。毛泽东同志又讲，他们要实现这样的野心，只能联合一批西方的帝国主义势力，如果这样做，只能使他们垮台得更早。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是软弱的，生来在外国

人面前就没有独立的品格，生来就奴颜婢膝。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看来好像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实际上早就有，只不过名词不一样，阶级性质是一样的。他们的这种阶级性质同一九五七年的真正的右派一脉相承，其中像王若望、刘宾雁，一九五七年就是真正的右派。

无论是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是在中国，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或改造完成以后，究竟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不是随着私有制问题的解决也就跟着消失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国家是不是马上开始消亡，还需要不需要提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好。我们在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段不长的时间里，也没有解决好。但是，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比较快，修正我们的错误也比较快。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后来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又重新说明，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实现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意识形态领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所以，完成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要认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还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就是要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针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可是，当把这样的认识付诸实施的时候，曾经犯过“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维护、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保证我们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期间，我们也犯过“一手硬、一手软”的错误，犯过右的错误。经过不断地实践，不断地斗争，不断地总结，我们的认识逐步深入，理论本身也逐渐成熟。在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中，我们平息暴乱，站住了，证明我们党的理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然而，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种实践和认识的准备，或者准备不够，结果一些国家变了颜色，资本主义复辟成为现实。所以，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根据这几十年来经验，一定要放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放在“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长期的斗争中，作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来认识、来观察、来处理。

## 论反“和平演变”的正义性

在一九八九年以前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也好，讲话也好，几乎不谈“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到了一九八九年以后，实践教育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个问题，不能低估这个问题。这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野心很大，他们公开宣称，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共产主义。他们的步骤很急，妄图在这个世纪末就消灭世界上的共产主义。布热津斯基就说，等到下个世纪的二〇一七年，要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建立一个博物馆，讲过去的一百年中间共产主义怎样开始实验，到世纪末又如何遭到全面的失败。迫不及待呀！他们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从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外交各个领域着手，使用了各种手法，确实有一整套的策略和手段来加以实施。他们的“和平演变”策略，发展到一定条件下，可能不和平，这场无硝烟的战争最终要冒出火药味来。彭真同志说得好，根据中国的情况，根据有些国家的情况，“和平演变”并不和平。当他们使用的“和平演变”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间遇到工人阶级的抵抗、革命政党的抵抗的时候，他们就要考虑动武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要把他们看得太善良了。

帝国主义进行武装侵略、武装演变，是反动的，是非正义的；我们反对武装侵略、武装演变是革命的，是正义的。帝国主义进行“和平渗透”、“和平演变”，也是反动的、非正义的。对这两方面，我们也必须坚持革命的、正义的斗争。不知怎么的，当帝国主义转变为搞“和平演变”的时候，我们有些人竟然在这个起码的问题上有一段时间不清楚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不用说，他们是欢迎“和平演变”的。问题是我们有些人，甚至糊涂地认为，“和平演变”也并不见得坏。好像从武装的演变改变成为“和平”的演变以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了。武装演变是赤裸裸的侵略和屠杀，而改为“和平演变”呢，可以念“民主、自由、人权”的经，好像这些念经的人心也慈了，手段也正当了。由此面对“和平演变”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演变不演变变得无所谓了。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认识到，他们进行武装侵略也好，“和平演变”也好，都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都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重新拖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难道不是历史的反动、历史的倒退吗？我们要揭露他们的这些欺骗，要让我们的人们认识到，“和平演变”的结果绝不是什么进步，而是一种历史的反动。有些国家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有一个被西方吞并了的社会主义国家，那里的共产党改名为民主社会党。这个党的领导人最近分析他们国家的人民的心理状态时讲，在被改变之前同被改变之后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改变以前，人们不用担心这、担心

那，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现在心理状况完全变了，没有安定的感觉。过去这家这户遇到困难时就会有组织走上门来关照；现在不管你有多大困难，都没有人管。资产阶级拼命散布这样一种舆论，说社会主义国家退回到资本主义制度，这不叫反动，而叫进步。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本质上，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发展的规律上，把它讲清楚。在我们国内，同样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鲁迅在三十年代说，蒋介石的“国度”里有一种字典，它的名词解释，跟我们大家平时理解的完全相反，认为进步就是反动，反动就是进步，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革命。鲁迅深刻地揭露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故意制造的是非颠倒和概念混乱。今天，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也有意识地在制造这种颠倒和混乱。而我们一些同志竟然不觉察，往往在这个问题上马马虎虎，随声附和，毫无警惕。他们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叫保守，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叫革新；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谁的思想就是僵化；谁跟着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谁的思想就是解放。而且什么叫“左”什么叫右，相当一段时期都给搞糊涂了。在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作斗争的时候，在我们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时候，在这些观念问题上，在这些是非颠倒、概念混乱的问题上，需要加以澄清。这样，我们的同志才能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和平演变”进行坚决的、清醒的、长期的斗争。

## 论反“和平演变”的策略

应该把毛泽东同志在统一战线方面的理论和政策当做重要的武器来掌握。为什么在一个时期中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我们大家的脑子里比较模糊了，而最近又重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跟毛泽东同志讲的道理有关系。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曾说，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左”倾的错误；而在同资产阶级进行联合的时候，又容易发生右倾的错误。这些年来，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外交、文化往来的过程中，我们有的同志只想到联合而忽视了斗争，人家对我们搞“和平演变”，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去反“和平演变”。毛泽东同志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既不能够同陈独秀一样，只联合不斗争，也不能同王明一样，只斗争不联合；而是应该把联合和斗争综合起来考虑，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毛泽东同志还讲过，在联合没有实现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的错误，因此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在联合实现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错误，则要注意反对投降主义。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段历史，西安事变由于我们党的努力，和平解决了，接着全国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紧跟着就是全民族抗战。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

曾讲过这样明显的话,而且制定了一个明白的政策,就是要通过容纳共产党,来达到溶化共产党的目的,并表示不达到这个目的,死不瞑目。他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掰,计算抗战中共产党的力量要消耗多少,国民党的力量要消耗多少,要保证这两个方面消耗到最后,国民党的力量大大优于共产党的力量,那时他就可以有把握地消灭共产党。这些话有在内部讲的,有公开讲的,甚至有的是对着我们党中央在长江局的代表王明讲的。可是王明怎么理解呢?他说,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是有诚意的,因为他说了,解决不了共产党的问题他死也不闭眼睛。而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就特别清醒,提出要三个坚持: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多次强调指出,坚持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坚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能够迁就、迎合资产阶级。在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有一个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还是资产阶级跟着无产阶级走的问题。我们要团结,同时,要坚持斗争,要以斗争来达到团结。接着就提出了要孤立顽固势力,团结中间势力,发展进步势力。在反摩擦斗争中,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些话一讲出来,使共产党员在同国民党斗争中的气概完全变了样。他还说,我们对于摩擦是要进行反摩擦的。但是,在反摩擦斗争中,一定要坚持自卫的原则,力求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所谓“有理”,就是要考虑大局。在那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们大部分国土,同国民党斗争,必须使我们自己,我们的



人民，包括国民党人能够看清楚，我们共产党是维护全国一致抗日的大局的，而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则是破坏这个大局的。自卫必须做到在斗争中不破坏统一战线，不破坏国共两党的团结。这是个全局的问题，是有理没有理的最重要标志，要在每次斗争中都使自己处于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有利”，这很清楚，每次斗争必须使自己不受损失。至于“有节”，是说斗争不能无限制地斗下去，斗到一定的程度就适可而止。我们运用这些原则，使得蒋介石这个集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经验之大成的人，同我们共产党斗一次败一次。历史证明，如果没有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我们就很可能像蒋介石所说的，力量消耗了，有那么一天，由他们来消灭我们。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结果跟蒋介石的愿望相反，抗日战争开始以前，我们的部队只有四万，等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我们的部队达到一百二十万；根据地的人口达到将近一亿。

搞统一战线，特别重要的就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对斗争的对象、团结的对象，都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进行分析和区别；对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也要分析和区别；对亲英美派中间的中央当权派和地方当权派还要分析和区别；中央当权派的亲英派与亲美派也并不完全一样。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建立不同的统一战线。在斗争的时候，又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对方。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

践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整个国民党的顽固派都成为革命的对象，可是，我们还坚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并不因为蒋介石变成反革命，并不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进攻进行了全面的自卫战争，就中止或者破裂在全国范围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由于对这个统一战线加上其他几个法宝的运用，我们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把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继续坚持了下来。毛泽东同志讲，这个统一战线要使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过三关。战争关已经过了，还要过土改关，过社会主义关。薄一波同志的文章里就讲到，我们是怎样在解放以后的“五反”斗争中，制服民族资产阶级中五毒俱全的那些“五反”对象的。这也是又团结又斗争。由于正确地坚持了统一战线，正确地坚持了团结、斗争的方针，使我们有可能在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用和平赎买的办法改造过来了，民族资产者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马克思原则上提出过这个设想，列宁试图对俄国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但是没有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把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和平改造过来的赎买设想，并且仍然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劳动人民和非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统一战线，含有这样两种内容：

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要建立拥护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还有拥护祖国统一的统一战线。并不因为历史的前进、阶级关系的变化,我们就放弃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而是根据历史的变化、力量的变化,使我们的统一战线适应不同的情况而不断地发展。就是说,统一战线不仅是我们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而且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法宝之一。

目前,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时期,我们要争取和平,维护和平,反对战争,而且尽可能缩小战争以至于推迟战争。我们在目前,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要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面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需要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资产阶级进行具体的分析,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有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中,也还要作进一步的分析。美国同西欧就不一样,美国同日本也不一样。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分析“和平演变”的危害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资产阶级内部就是铁板一块,好像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统统压到我们头上。不是这样。在他们的内部并不都一样。这就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和政策。我们一方面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同时,也要想到我们的前途并不是漆黑一团,没有出路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一九八九年我们平暴的时候,美国就迫使或者拉拢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对我们进行制裁，而第三世界的国家却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到今天为止，西欧的国家，还有日本，已经解除了对我国的制裁和封锁。坚持对我们制裁、封锁的只剩下一个美国。他们的阵线表面上看是一致的，实际上不可能一致。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处于低潮，但是，只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坚持我们的信仰，坚持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很好地运用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结合当前的实践，在当前的形势下加以应用，并不是没有前途的，并不是没有办法的。

毛泽东的著作，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著作，也没有过时。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来讲，全部是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其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由此所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在当前和今后的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结合当前实际很好地学习、很好地运用。中国出了毛泽东、有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党的幸运。尽管毛泽东同志也犯过错误，但是，对于我们全党来讲，对于我们全国来讲，他的功勋，正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讲的，是第一位的。他的这些学问、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宝贵的财富、重要的武器。

## 要正确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大家都关心苏联的情况。为什么它整个国家变了颜色？许多人感到震惊，感到突然，感到迷惑不解。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苏联现在的局面，有苏联的国内原因，也有国际原因。

国际上，西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越来越加紧进行。七月份我看到一个材料，讲美国人准备在九十年代头五年肢解苏联，后五年对付中国。结果，苏联的情况发展比他们所希望的还要快。经过八一九事件之后，苏联的状况一泻千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盟瓦解，苏联共产党被停止活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处于非法地位，列宁、斯大林受到公开攻击。其所以如此，有美国人的计划，更有苏联的内部原因——我们今天可以明确地讲，是由于苏联内部的修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正主义。他们讲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形态。由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党内自由化分子配合，使得美国的战略计划提前实现了。

苏联为什么变得那么快？戈尔巴乔夫是一九八五年上台的，到今年才六年的时间。六年的光景，就把一个希特勒的武力征服不了的社会主义苏联变成现在要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为此兴高采烈，并且做出他们的预言：苏联七十三年就垮台了，中国可能到不了七十三年。对这些问题该怎样解释？应如何对待？很需要进行讨论。

苏联这六年为什么变得这么快？原因很多。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的问题。如能正确对待，事情就不至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错误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也就不能正确地对待现在，必然会发生现在这样的问题。苏联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时期开始，直至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主义。这种对历史的否定，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不是这里一声、那里一声，零零碎碎的，而是有组织的。党的领导人苏共总书记，做了领头羊。当然，这件事的由来还长。

一九五六年后，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斯大林的攻击，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仅把斯大林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否定了，而且把他领导的整个时期否定了，把工业化否定了，把集体化否定了，甚至把卫国战争都否定了。

根据这前后的变化，我们痛切地感受到，对待历史人物

的态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弄不好就会自己打倒自己。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搞的就是自己反对自己，自己丑化自己，自己毁灭自己。戈尔巴乔夫说，他要“粉碎”、“摧毁”、“炸毁”斯大林的那一套。也就是说斯大林建设的党、军队，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统统都要“粉碎”，统统都要“摧毁”和“炸毁”。这种言论出自共产党的领袖、党的总书记之口。他不但带头来搞，而且煽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人物一齐来搞。有同志到苏联去考察，回来说：被戈尔巴乔夫动员起来同他一起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从列宁一直到斯大林时代，十月革命以后被革命打击的沙皇、贵族、地主、富农，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组织以及党内斗争的反对派。这些人中后来尽管也有平了反的，但是，在戈尔巴乔夫的纵容下，统统组织起来，在各个地方进行反共、反苏的活动。平反了还不行，还要彻底算总账，专门跟苏联共产党算总账。他们成为响应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成员。第二类人是实行私有化自由经济以后的投机分子。他们叫做“影子经济”。他们的经济力量，据说全国有一千五百亿卢布之多。第三种人是知识分子中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通过所谓的“公开性”、“民主化”，把原来的各级领导人一批批搞掉，进行“大换班”。管意识形态、管宣传的，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被整倒了。新起来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他们掌握了舆论工具，占领了思想阵地，进行背叛马列主义的舆论导向。戈尔巴乔夫就靠这三种

人推行反“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再加上无政府主义，全国乱得很。据说全国有七万个各种各样组织，说什么都行，提什么主张都可以。原来我们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为什么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建设，思想会乱到这种程度。了解情况以后，我们就比较地清楚了。戈尔巴乔夫不断地从中央散布，这三种人在下面跟着互相配合，终于造成了这样一种气候，即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不能讲，也不敢讲，宣传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会到处受到嘲弄。资产阶级自由化舆论的作用确实不可低估！

我们有个同志去年到苏联访问，到了列宁格勒。列宁格勒当年被德军围困九百天，后来建立了很庄严的纪念地。陪他去参观的一个苏联工作人员说，他是列宁格勒人，苏德战争期间，列宁格勒被围困的时候，他的几个亲属牺牲了。我们这位同志就问他：那么你现在对斯大林怎么看？他说：我也反对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指挥不正确，才牺牲这么大。牺牲确实很大，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死了二千七百万人。但是，这是谁的罪过呢？完全是因为希特勒入侵才造成的嘛！可是，在戈尔巴乔夫思想的引导下，这些人不是去清算法西斯的罪恶，也不把斯大林领导苏联红军最后取得的胜利引以为骄傲，反而说什么因为斯大林指挥不正确，才有这么大的牺牲；用这么大的牺牲，证明斯大林的无能，证明斯大林犯了错误。这些人不仇恨希特勒，却怨恨斯大林，思想变到这样的程度，简直无法想像！

以上情况不能不启发我们的深思。历史不能任人涂抹。



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要尊重我们的革命先烈,要尊重革命先烈所创造的事业。我们决不能走苏联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道路;也不能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历史、对待我们的历史人物。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立场,我们党在今天才能够站得住。

同志们可以回顾一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国内理论务虚会上也曾出现过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搞得相当厉害。在那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出来讲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情况好了一点。但是,否定毛泽东的思潮并没有完全制止,党内也还有不同意见。在讨论制定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个别同志的发言就很出格。好在就在这个时候,通过实践的检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决议》,我们才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把否定毛泽东同志的思潮抑制下去,全党在这个问题上才一致了。当时要是没有作这个《决议》,不采取这个方针,以后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们国内会乱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设想了。听任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随便出版书籍,随便发表他们的议论,到处进行讲演,我们也就会出现和苏联类似的情况。从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我们从事党史人物宣传的同志,在这十几个年头里,没有跟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走,而是跟着党中央走的。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的历史人物,尊重我们的历史人物所创造的业绩,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同志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

---

个基础上,我们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我们的思想,对于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的党史工作是有意义的,对现实斗争是有帮助的。将来我们的中国能不能站稳,与党史工作做得如何有很大的关系。党史工作切不可轻视,大家的责任重大。

---

# 正 确 认 识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否存在矛盾?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或模糊的。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作了肯定回答和精辟论述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似乎已经为人们所承认。但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上,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包括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事情恰如恩格斯所说,口头上承认辩证法是一回事,实际上把它运用到每一具体场合,则是另一回事。然而,唯物辩证法早已指明,无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证明: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和任何社会形态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内部

---

\* 这是邓力群同志为《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领导干部学习哲学札记》一书写的前言。

和外部充满着矛盾。矛盾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有它固有的发展逻辑。它不仅不以反动势力的愿望和意志而消失,同样也不以革命人民的愿望和意志而泯灭。我们只有勇敢地如实地承认它,正确地深刻地认识它,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才能应付种种复杂、严峻的局面,夺取斗争的胜利。否则,在客观存在的矛盾面前,我们就会丧失处理矛盾的主动权,陷入被动地位,甚至为矛盾的发展所吞噬。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哲学、用哲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这些矛盾,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情形是怎样的呢?这里仅对关系全局的若干矛盾略作论列。

我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由于剥削阶级作为完整的阶级已被消灭,因而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但是,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谁战胜谁”的矛盾,远未解决。在现阶段,这个矛盾集中为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不仅表现为我们与极少数敌对分子的阶级斗争,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人民内部一些阶层、一些人,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出来。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抽象的政治信条,而是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核心内容的理论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

义共和国。由于国际国内历史条件的变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和斗争，比新中国建立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思潮泛滥的势头得以遏制，但由于这股思潮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四项基本原则与自由化的矛盾和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应的，同时又有不相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因而需要改革。特别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兴起、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今天，就更加需要改革那些与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部分和环节了。我们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主动推进上述矛盾的解决。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总是精心玩弄诱导与逼迫两手策略，妄图把我国的改革开放引上资本主义轨道，融化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去，最终把中国变为西方大国的附庸。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与妄图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矛盾和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在上述矛盾的发展中毁灭。

由于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依然存在，

而且还将长期存在,在我国现阶段和将来的漫长历史阶段,它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我们应该发展商品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既有联系又有原则区别的两个范畴。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与多种所有制的存在相联系,有性质不同的多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其他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后面两类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制定和实行恰当的政策,就可以使后面两类商品经济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否则,它们的发展就可能冲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制度。除了必须分析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之间的矛盾外,还必须分析商品经济内在的矛盾、特别是后面两类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制定正确的政策,发挥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将其消极作用控制在最低限度。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一个孤立存在,而是处在整个世界联系网络之中。除了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在整个世界联系之网中的矛盾,特别是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这是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

领域的矛盾，与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矛盾，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妄图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个矛盾，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和命运。

以上论列的这些矛盾，不能不反映到党内来。党内出现矛盾和斗争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怪事，也并非就是坏事。毛泽东同志早就深刻地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

从历史总的进程来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并将人类引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但是，就某个社会主义国家、某一历史时期来说，社会主义却存在着胜利与失败两种可能，存在着历史暂时倒退的可能。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能否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到军事斗争问题时指出，军队丧失主动地位，下文就是失败。这个真理具有普遍意义。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居于诸多矛盾的中心位置，处于诸多矛盾的焦点，如果丧失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失去了驾驭矛盾发展的能力，就会被矛盾的发展所埋葬。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曲折所提供的教训，应该牢记。

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怎样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

呢?根据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要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矛盾,有一个清醒的深刻的认识,估计过头与估计不足,或者对矛盾性质判断失真,都会犯极大的错误。(2)工人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之前,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夺取政权以后,阶级斗争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列宁说: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党必须牢牢掌握国家政权。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巩固执政地位。这是非常正确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是主动权的物质基础。(3)必须与侵入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潮——西方反共思潮、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国内自由化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在根本政治原则上的统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只有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才能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掌握历史的主动权。近年来,我们党的正面经验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面经验,从正反两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

最后,我想引用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教导,作为这篇序文的结语。他说:“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



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2】

### 注 释

- 【1】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06页。
- 【2】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361—362页。

## 关于“毛泽东热”\*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问：您在《新闻出版报》刊登的讲话中，集中谈到了“毛泽东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毛泽东热”被国内外关注、思考、评估，已非一日。《中流》杂志创刊以来，就不止一次发表了这个方面的文章。不久前发表的《发现毛泽东》，就是北大一位研究生对“毛泽东热”的思考。最近，山西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毛泽东热”》，广泛探讨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作者也是一些年轻人。您的谈话，体现了老同志对年轻一代发展状况、对社会主义未来命运的密切关注，理所当然引起青年们的重视和尊敬。很多读者希望您能就这个问题稍为展开来谈谈。

答：我的那次讲话，只是顺便地谈到了“毛泽东热”，并

---

\* 1991年3月14日邓力群同志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风范》丛书”编写研究班上的讲话，集中谈到了“毛泽东热”。《新闻出版报》予以刊载。10月28日《中流》杂志社就“毛泽东热”问题采访了邓力群同志。这是邓力群同志接受《中流》杂志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未充分展开来谈。这当然不是什么“新发现”，只不过是肯定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热”不是什么人凭空想像出来的，更不是人为制造和渲染出来的“海市蜃楼”，而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真实存在。这个事实的产生和发展，又确实是发人深思的，我当时用了“很有趣”来加以表达。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否定、贬低、丑化、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进而攻击、诽谤邓小平同志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一种“时髦”。社会上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可是，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北京的政治风波，特别是经历了东欧逆转、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出现空前反共高潮，在有人宣布“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的一部分敏感的知识青年中，却出现了“毛泽东热”。这种“热”还有不断“升温”之势。这实在是社会主义中国、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非同寻常的，值得我们思考、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

问：记得一九九〇年的一月间，北京的《大学生》杂志召开的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座谈会上，有些年轻人就注意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作出解释。当时北大研究生辛鸣（即后来《发现毛泽东》的作者），在回答“你怎样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这个问题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在回答“你怎样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这个问题时，他又引用了毛泽东的另一诗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这种发人深思的解

释,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在以后的很多会议发言或文章中被引用、介绍。

答: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这种回答出自一个青年,更是难能可贵的。这表明,对“毛泽东热”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本身,而是开始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层的理性思考。的确,“妖雾重来”,即国际范围修正主义思潮的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滥的事实,恰恰就是“毛泽东热”产生和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和根据。

实际上,无论是“毛泽东热”这个现象本身,还是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解释,都有一个不断发展、提高和深化的过程。

应当承认,这一代的年轻人,对毛泽东同志和他一生革命的业绩,是缺乏亲身的感受的。这不仅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些人,有着跟随毛泽东同志进行革命斗争的亲身经历;不仅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曾放松了对他们进行这方面的有效教育;更因为一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特别是否定、丑化、贬低毛泽东同志的思潮,向青年灌输许多错误的、歪曲的事实和结论,对他们产生了十分有害的消极影响。他们的经历和年龄,又决定了他们对这些错误的、歪曲的东西缺乏足够的分辨和抵抗能力。因此,对他们来说,认识毛泽东同志的本来面目,认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他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化作他们自觉的认识,就不能不有一个“寻

找”和“发现”的过程。近几年，有些年轻人的文章或著作，被标以《寻找毛泽东》、《发现毛泽东》的题目，就说明了这一点。

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接踵而至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逆转，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巨大挫折陷入低潮的情况，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巨大冲击和震动，使不少青年人陷入思想的混乱、迷惘和苦闷。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不寻常的经历、严峻的历史现实，触发了他们思考、探索、解释这些问题的强烈要求，这自然就成了他们自觉地“寻找”、“发现”毛泽东的历史契机。

**问：**的确，许多青年是在面对复杂的、动荡的国内外形势，带着大量的“问号”，其中有的人经历了歧路和挫折后，开始了“寻找”和“发现”的过程的。

**答：**我曾说过，大多数的青年的“寻找”和“发现”，并不是从某些现成判断和结论入手。尽管早在一九八一年，我们党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正确评价。这种评价，在这些年的实际生活进程中，却遭到了一些人的漠视以至否定。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很难理解它。对毛泽东的“寻找”和“发现”，实际上是从一大批较早出现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回忆录、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他生活经历的小册子入手的。像《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一大批的小册子和文章的发表，这些读物成为广大青少年热心购买、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就形成了“毛泽东热”的最早的

潮头。一些根据毛泽东同志周围工作人员口授整理而成的读物，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甚至引起了某些争议，却在“寻找”和“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可抹煞的作用。正是这些第一手的材料，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与某些人别有用心地加以丑化、歪曲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不是神，但也绝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恶魔”，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味的、非常亲切的普通人。与此同时，从这些读物中也看到了具有高尚品格、情操和高度智慧、为人民革命事业无私贡献自己的一生的伟大革命家的形象。例如，六十年代初，当天灾和工作失误导致人民群众饿肚子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一家人同人民同甘苦，不吃肉，甚至因营养不足而闹浮肿的事实，就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大“发现”。这也使那些把毛泽东同志描绘成冷酷无情的“君主”、“帝王”的努力，不攻自破。

**问：**继这些读物之后，以这些读物为蓝本改编的电影、电视剧、话剧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轰动效应”，在年轻一代人中获得空前成功。例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和他的乡亲》、《开天辟地》等（其中也包括了像《地球的红飘带》这样的小说），就通过生动的形象，从不同侧面真实、感人地展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形象和面貌。在观看这些作品时所引起的“轰动”景象，也构成了“毛泽东热”的突出组成部分之一。

**答：**“寻找”、“发现”毛泽东的过程，从这些作品和读

物入手,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更是符合对人特别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的。这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从事实到理论概括、判断的上升过程。可惜的是,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对这个问题至今仍缺乏足够的自觉。我们从“毛泽东热”的发展过程中,应当得到启发,以便更好地改进我们的工作。倒是某些动乱的“精英”,却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一九八八年他们利用电视形象炮制的政论片《河殒》,就比他们的一百篇理论说教产生了更大蛊惑作用。

**问:**的确是这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思想教育往往满足于教科书式地向青少年灌输一些现成结论,不善于用确凿的事实、生动的形象和活泼的语言去进行教育。而我们的文艺界一些人中又出现了一种极力否定文艺的认识、教育作用的思潮。

**答:**这些读物、作品起到了一定作用。可是,如果仅仅给他们这样一些东西,那是很不够的。事实上,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许多青少年已经不以看这样的读物为满足了。他们从这里入手,不能不上升到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这就是,从认识毛泽东同志这个人,到认识整个的“毛泽东时代”,认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所展开的成功的大革命,并通过中国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理论,来寻找共产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答案。这就使得“毛泽东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年轻人热切地去找寻、阅读关于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其中包括美国人写的《西行漫

记》、《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外国人评价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著作。有许多热心的青年，利用假期，到韶山、井冈山、延安等地，追寻革命的足迹。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更成了全国千千万万人向往瞻仰的地方。最近，我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许多青年争相购买、阅读，也表明“毛泽东热”向纵深的发展。

正是通过对历史的追寻，他们“发现”了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的伟大形象。“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sup>【1】</sup>这种崇高的民族品格，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而引起千千万万青年人由衷的敬佩。

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大量出版，广大青年争相购买，进而通过直接地阅读毛泽东同志的原著，来认识毛泽东同志和领略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理论和思想，标志着“毛泽东热”进入了高一级的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直接的阅读，又确实得到了许多新的“发现”。当他们看到，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和平演变”警告，并提出了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是唯一对东欧、苏联目前发生的情况作过预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时候，他们逐渐认识到，正是毛泽东同志奠定了防止“和平演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当他们看到五十年代，毛泽东同志顶住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逆流，对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挽救作用的事实，也就更加理解到了进入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坚决顶住全盘



否定毛泽东的伟大决断的历史意义。青年人自觉地学习、研究、掌握毛泽东思想，直接通过他的思想和理论，寻求共产主义运动中现实问题的答案，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问：这些年来，我们国家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热”，像“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后来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这个“毛泽东热”会不会一阵风就过去呢？

答：我认为“毛泽东热”与以往的什么“弗洛伊德热”、“萨特热”、“现代派热”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出现上述这些“热”，不能说没有其特定的内在历史原因。但是，弗洛伊德的学说、存在主义的学说、“现代派”的理论和实践，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在我们中国是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的。尽管有些人当做一种“时髦”极力加以贩卖和鼓噪，因为它毕竟回答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解决不了我们历史前进中的历史课题，它折腾一阵子就风流云散，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它是直接产生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现象，是直接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无论怎么说，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都引起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仅空前地改变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而且肯定会极大地影响今后的历史。认识、总结这段历史，实际上成为我们前进的出发点之一。因此，作为一种“热”，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表现形式，但这股“毛泽东热”，是不会风流云散，丧失其历史影响和意义的，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已经成为

中国历史的永恒主题。

**问：**你可不可以对这种“毛泽东热”简单地作一个基本的总体的估计。

**答：**从总体上看，我认为这个“毛泽东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我们历史发展中的令人鼓舞的积极现象。

我不认为这种“毛泽东热”已经解决了青年中存在的所有问题，也不认为这当中不夹杂某些可能的消极因素。对“毛泽东热”作出过高的估计，既忽视了我们思想战线面临的艰巨任务，也降低了我们的责任。但是，整整这一代的青年，在这个特定的历史关头，唤起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情，唤起对他的著作学习的热情，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历史证明，仅仅凭课堂上的灌输，单靠书本，是造就不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像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处于国难当头的条件下，寻找中国和个人的出路，在比较中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现在这一代的青年，注定要在共产主义发生重大挫折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纪转换的关头，在人类历史的大风大浪中，通过思考、比较，去接近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所谓“毛泽东热”，难道不可以说是我们这一代青年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契机吗？在一定意义上，他们的思考、学习，对于革命接班人的培养，对于下世纪的中国，都将会产生持久、根本的影响。我们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相信共产主义的前途，也应该相信我们的多数青年能够在事实面前，在风云变幻的历史震荡之中，经过独立的思考和正反面的比较，牢牢掌握马克思

主义。这种在急剧变幻的社会条件下接受马克思主义，比在平常条件下仅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扎实得多。

当然，现在也有人认为，这股“毛泽东热”中，包含着一些青年人的“怀旧”情绪。所谓“怀旧”，指的是有些青年人对当前存在的腐败、以权谋私、贿赂成风等情况不满意，又无力加以改变，因此就把感情寄托到过去，怀念五十年代。他们希望今天能像五十年代搞“三反”、“五反”那样，坚决有力地清除种种腐败现象。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情绪还是希望我们党、我们的社会，保持廉洁、不搞腐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有的人可能有些偏激情绪，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可能利用这种情绪，制造青年和党的对立。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加以正确引导，更重要的则是应当认真地克服丑恶、腐败现象。我们如果有力地克服了腐败现象，在青年中树立起大公无私、廉洁奉公形象，就能够更好地团结亿万青年人；如果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从内部腐烂的“和平演变”，我们就会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广大青年。

总之，“毛泽东热”，从主导的方面看，是一种健康的、进步的、孕育着希望的现象，它是一种凝聚的因素、向心的因素、团结的因素、稳定的因素。一九九一年，我们遇到自然界的空前灾害，国际社会更是风云变幻，但我们的社会仍然出现了团结、稳定的局面。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我们党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和路线。“毛泽东热”也正是这种正确的方针和路线的产物。三十多年前，杜勒斯一厢情愿地提

出，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的青年人身上。后来他又预言，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终有一天会按照美国的方式思考问题。当前出现的“毛泽东热”，不正是对这种预言作出的有力回答吗？我们的责任，是对它进行正确的引导，使之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普及、提高的过程，为培养未来世纪的接班人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 注 释

- 【1】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

# 学习毛泽东，做坚定的革命者\*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

在座的老同志，上北大、参加“一二·九”运动时，与同学们现在风华正茂的年龄差不多。如今五十六年过去，我们都成了七老八十的人。我们生逢多事之秋，经历过的事情多得说不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看到蒋介石如何背叛革命，以阴谋手段起家，也看到他如何丧尽民心而垮台；看到英勇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横遭反革命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得道多助，依靠人民，领导人民，终于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帝国主义者怎样地对中国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和疯狂至极的掠夺，也看到它怎样地被中国人民的铁扫帚一家伙扫出去。在世界范围里，我们看到德国的法西斯曾怎样地不可一世，横扫欧洲，兵进到苏联的莫斯科城下，最后与德国人民为敌、与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大学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六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世界人民为敌的希特勒却以自杀告终；也看到斯大林怎样地在全世界享有殊荣，面对德国法西斯闪电般的侵略，领导苏联人民进行无畏的战斗，指挥红军直捣法西斯的最后巢穴。当时，不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拥护苏联，连资产阶级开明人士都称道苏联。没想到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正在发展之际，出了违背人民意志的修正主义，斯大林被否定。此风一长，推波助澜，年复一年，结果从斯大林到列宁，都遭到全面诋毁，三十五年后，苏联、东欧为之剧变。其结果，恐怕连背叛马克思主义、出卖社会主义、一手造成这般地步的人也始料未及。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者，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考茨基、伯恩斯坦，他们的最后破产也没有这么厉害过，把什么都输光，引入极大灾难。看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局势动荡，复杂多变，情况的发展还很难预料。

我们这些人五六十年或者六七十年来的事，大大小小，国内国外，可以说极为丰富多彩。有忧虑也有兴奋，有悲伤也有欢快。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我们这辈子的确不平淡，深感充实、幸福。谁也不曾有这样的后悔：悔不该投身革命运动，悔不该参加那么多革命斗争。而是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其乐无穷！

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不管世事怎样多变，归结到一点，就是只要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处变不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旦脱离群众，那就危险。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的结束语中引了一个希腊神话故事，说安泰是个战无不胜的英雄，他取胜的秘诀在于，每次同对手决斗时，竭力把身

体向大地靠，这就有了无穷的力量，所以，每次都能打败对手。新的敌人出来了，研究发现了这一点，使出绝招，把安泰举在空中，使之无法接触地母，最后掐死了他。这个故事很有哲理，是人类历史、自然斗争、社会斗争经验的形象概括。斯大林对此发挥说：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像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有一切把握，始终是不可战胜的。斯大林的这段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永远有着它的现实意义。

从五十年代起，帝国主义在侵朝、侵越中连连吃败仗。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毛泽东除了怕党内出问题、脱离群众之外，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神不怕，与这样的对手硬来是占不了便宜的。敌人实行了战略转变，从武装侵犯转变到搞“和平演变”，准确地说，就是要以武力为后盾，通过各种交往来促使内部变化，对社会主义国家或诱或压地进行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有那么一些人，就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他们力图通过这样的人来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共产党员，在中国培植复辟资本主义的力量。

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愿望相反，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社会主义的事业正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可喜

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了改革，只有中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也决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就没有缺点，没有失误。知识分子，特别是教师，确实困难不少，但同十几年前相比，总的水平也还是有所提高。能够这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正确，政策对头，工作得法，立足于人民利益，紧密地联系着群众，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所以，我们也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站得住，能前进。东欧、苏联的剧变，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严重脱离群众，因此“不用枪，不用炮，城头换旗号”。为什么苏联、东欧剧变，而我们能站住脚？我们应该进行认真的思考探讨，从中得出有益的共识，把好的坚持下来、发扬开去。我认为，我们在基本的方面固然是好的，但也有某些不如人意的事情，某些脱离群众的地方，所以，也应该很好地研究一下这方面的教训。在哪些问题上群众是不满意的？在哪些问题上我们非改不可？正反两方面的认真总结，有利于我们做得更好，更上一层楼。

刚才有同学讲，这些年来，社会上出现了“毛泽东热”的现象，“寻找毛泽东”，“发现毛泽东”。这种社会现象，总的来说应该是值得理解和高兴的。据了解，这种社会现象正在从读写毛泽东的书进到读毛泽东自己写的书，表明人们要进一步从毛泽东的著作中来真切地了解他的实践、他的思想。在这方面，我请同志们特别注意一下毛泽东经历中的这段情由，它值得我们很好回味。五四运动前后，很多有血性的知识青年，为了探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到法国去勤工俭



学。湖南也组织过一批又一批，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等都去了。毛泽东积极地参加了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热情欢送他们。他自己却没有准备去，决心留在国内，要很好地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他认为也应当有人来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一本应该读的“书”。如果连自己的国家都不了解，怎么谈得上改造它？那末，读中国这本“书”，浅尝辄止是不行的。他要潜下心来，集中精力学好这本“书”。翻过一页又一页，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他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去苏联访问，初次踏出国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整整二十八年，像以往的年月一样，毛泽东就是抱住中国这本“书”不放。有人曾讥笑他，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结果怎么样呢？的确与只会死啃书本、完全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一套、不顾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相反，毛泽东以他了解中国最正确、最深刻的功底，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很好地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方法，有效地指导了他研究和解决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因而取得最大成功。在这一点上，无人可与他相比。结果证明，毛泽东不仅是坚持马列主义的，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中国有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品格，那就是不信邪，任何困难都吓不住他、难不倒他。愈是困难，他要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的精力愈充沛、愈旺盛，他克服困难的决心愈大、愈坚定，从不悲观。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

量从近六万人骤减到近一万人，或者被杀、打散，或者动摇、自首，有的叛变、投敌。许多人思想混乱、迷惘，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万分严酷的情势底下，毛泽东没有屈服，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痛定思痛，冷静思索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在延安时就曾对此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就在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没有向党讲清楚蒋介石可能背叛革命，没有指明我们同他合作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而使全党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毫无思想准备，遭受惨重损失。毛泽东研究了蒋介石为什么能杀共产党，因为他手里有枪有刀。这个道理不是很简单吗？然而在当时的确很少有人认识。毛泽东的这个考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非常重要。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共产党同样可以拿起刀枪，进行自卫和反击。毛泽东在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上的原话是这样记载的：“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样，就有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有了秋收起义，就有了上井冈山。当然，动刀动枪也不是天生就会，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时，常打败仗。毛泽东就又研究起来，总结经验，研究如何才能不打败仗。经过三湾改编，仗愈打愈精，上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这时候以林彪为代表的怀疑论者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放眼世界，认为中国不像印度那样，是为一个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殖民地，而是由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侵略和争夺着的半殖民地。每一个帝国主义都支持一派军阀争地盘打内战，互相激烈厮杀。因此，我们就有矛盾可利用，就有空隙可周旋，在

反动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能够建立红色的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的一生证明，愈是困难的情况下，他愈能想办法，愈能充分发挥他的智慧。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时，陕北的人民军队只有两万多人，兵力仅及来犯敌军的十分之一，相差悬殊。当时，各根据地的同志对毛主席的安危都极其关心，纷纷打电报请他离开陕北根据地。然而他就是不离开，甚至对屡次劝他离开的同志发火。他说：“不把胡宗南打败，决不离开陕甘宁。”毛泽东根据陕北群众基础好、地势险峻、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采取打转转、“蘑菇”战术，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拖在自己的周围，拖在西北战场，减轻其他解放区战场的压力。毛泽东深深知道自己对敌人的吸引力，只要自己不走，敌人的几十万兵力就决不会他去。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辗转奋战，我们就争取了主动，西北战场和全国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了主动。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毛泽东才根据战略需要，东渡黄河，依恋地告别陕北人民，告别这个他如鱼得水的地方。

所以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依靠群众我们就能战胜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当然，在这中间也有因困难受严重挫折遭致失败的时候。革命者表现出的坚定性，就在于不为一时的困难、挫折、失败而动摇信心，始终依靠群众，努力从群众中去寻找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王震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好：战场上，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对方也困难，甚至比我们还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

就是胜利。特别是两军相峙、势均力敌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谁能多坚持一会谁就能获胜，这是很显然的。胜利往往是在多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人生的道路不会像铺平了的大马路。人的一生难免有困难，难免有坎坷。我们所做的任何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了克服困难，克服困难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前进的过程。同学们纪念“一二·九”，有愿望、有志向与工农结合，为共产主义奋斗一辈子。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应把困难放在计划之内，要想到今后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很多老同志就是舍命参加革命的，充分估计了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凶险，因而能跟着毛主席坚持革命。现在国际局势动荡，国内问题也不少，有人愁得不得了。这大可不必。要看到我们党中央有成熟的驾驭能力，要看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两年多的事实证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可以克服一个个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的存在和自身的发展，已表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它代表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可以高枕无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世界上的事很难打这种保票。

同志们现在二十一二岁，人生路上还有五六十年、六七十年，希望你们比我们活得更好。但是再说一句，一个人顺境、逆境都可能碰到，对于今后的风风雨雨，你们最好估计得充分一点，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什么事都不会有。鲁迅曾提醒人们，幻想得太多太好，将来非碰钉子不可。世界上并非到处充满爱。要看到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世界范围内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新变化。斗争的焦点，在一段时间内将会在欧洲，但总有一天会转向东方。西方政界要人最近公开讲中国是一个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政权。他们的所谓“潮流”，就是东欧剧变，苏联肢解，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而我们明白地讲要进行反“和平演变”、反渗透、反颠覆的长期斗争，他们自然不高兴。可他们又不能不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就企图在保持各种交往中，通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艺的、思想的、外交的等等领域，使用各种手法来传播他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传播他们资产阶级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争取斗争的胜利。来日方长！各种思潮、各种麻烦的事情都会来到你们面前，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希望大家立下这个志愿，同时希望大家做好准备，像毛泽东所说的，在斗争中，不能被困难压倒，而要压倒困难，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 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全世界写毛泽东的书和文章汗牛充栋。敌人在研究他,我们的朋友也在研究他。骂之者有,颂之者更多,或褒或贬都是为了斗争的需要。一般的学术性研究也不在少数,纵然是这样的研究,也没有离开现实十万八千里。作为世界的巨人,毛泽东没有作古,他在全世界面前所耸立的巍巍形象不可磨灭,他所奠造的事业在继续发展。看来,越往后去,毛泽东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接受了严酷的现实教育的人们,都需要了解毛泽东,学习毛泽东。

几年前,我向湖南同志建议,把世界范围里所写的有关毛泽东的书和文章收集起来。据说韶山纪念馆做这件事已经一年多了。这是在湖南。北京呢?中央文献研究室大概也有收集吧?还可以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献情报中心联系,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召开的毛泽东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委托他们帮助收集,按时摘要报道一下,如果能把值得翻译的翻译出来,当然更好。我们应该掌握国内外的“毛泽东热”,它的一些热点又在什么之上。

今年以来,特别最近几个月,有几位同志热情向我介绍,从一九八七年以来,在青年人中间出现了一股越来越热的“寻找毛泽东”、“发现毛泽东”的现象,持续四五年而不衰。中央文献研究室几位同志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张贻玖写的《毛主席的书房》、《毛泽东和诗》,逢先知写的《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李银桥写的《毛主席身边十五年》,还有权延赤和李银桥合作的几本书,一时洛阳纸贵,都成了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的书。

有的书,虽然也有些缺点,有的地方不那么真实,一些材料在几本书里反复出现。但是,总的来讲,是好书,是可贵的精神食粮,在青年人中间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从书里知道毛泽东其人其事,他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生活习惯、个人爱好、思想作风、朋友交往、亲属联系等等,打破了某些神秘观点。毛泽东是普通的人,但确实又和普通人不大一样;是平凡的人,又是伟大的人物;是可以亲近的,同时又是值得尊敬的。据说,这些书在青年人中推动起来的激情还方兴未艾。像这一类书,都发行得比较好,出来一本畅销一本。

青年们所看的书,开头一段主要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的部下、他的战友所写的或被采访整理出来的书。经过这么一段以后,有的青年已经不满足于此,而要进一步阅读毛泽

东自己写的书，进一步阅读理论书刊了。正好，《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适应了这部分青年的需要。这两本书发行量所以这样大，决不是偶然的。人们估计，这种从毛泽东身上寻求启发、寻求力量的状况，会在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时（一九九三年）达到高潮，然后还有可能持续下去。明后年要陆续出版《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前些年已经开始出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后每年还要一本两本继续出下去。这些书的出版，将会更好地适应学习毛泽东、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思潮的需要，并将促进这个思潮进一步发展。这是一件很值得我们高兴的事。

这种情况，和我们过去的思想转变相像。拿我来讲，思想的转变首先也是从阅读形象的作品开始，然后才进到阅读理论著作，探求理性的东西。这种从感性到理性、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往往是人们思想转变的过程，是合乎人们的认识规律的。

中国有希望，中国青年人有希望。从这件事里，可以得到证明。读毛泽东的书，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不仅使人增长智慧，而且会使人陡增追求真理的坚定性，为真理、为信念坚持斗争的坚定性。这个现象出现在这个时代，时代要求我们在毛泽东指引的道路上继续工作，继续奋斗，加上同志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必将产生应有的作用。你们撰写的书，对年轻人来讲，开头一段，他们可能读不进去；等到他们要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思想，阅读毛泽东



的著作，他们的认识进到这种阶段的时候，你们所写的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就不会曲高和寡，就会成为他们所喜爱的重要辅导读物。固然，毛泽东的著作是通俗好读的，但是，它里面包含的思想，在什么条件下的思想，如果没有辅导，有些人也不一定一下子都能看得清楚，领会得到。有了辅导以后，就能够更好地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著作里的深刻含意，特别是它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由此我也想到，理论读物也需要有通俗一点的，本儿薄一点的，不非要长篇大论、大部头的才过瘾。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接受了革命文艺的影响以后，就希望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尽管初期对于很深的理论读不进去，但是通俗的还是愿意读的，确实感到这比那种小说说明的问题更深刻一些，能接触和知道规律性的东西了。

所以，在出了那么多原著以后，怎么样辅导渴求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年轻人，或者使干部更好地了解、更深地了解，特别是在了解以后能够运用来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方面的辅导非常重要。这项工作需要有所分工，我现在一下还说不出具体的意见，请大家考虑。因为这确实是个问题。

对于研究问题，我想提出一点，希望能够很好地研究一下毛泽东是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毛泽东在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方面，与其他一些革命导师的经历不大相同，具有自己的特点，更深地植根于斗争的实际之中。这个特点，集中反映在他的《反对本本主义》里的一句话上：“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

义。”<sup>【1】</sup>毛泽东不曾有过纯学理的学习和研究，是中国的革命一步步推动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的学习和研究自始至终是在斗争需要的过程中进行的。他把马列主义的东西拿过来，不是照搬，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丰富，加以发展，加以落实，在中国真正生了根的。总之，毛泽东不是像王明等人那样，似乎先有了满腹的“马克思主义”，然后来颐指气使地指导一切。

我们常常说，中国党有个缺点，理论准备不够。这确实是的。但正因为这样，就逼得你要从干中来学，没有纸上谈兵的条件，也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一边干一边学，不是学好了以后再干。在斗争中学，斗争中用，斗争中发展，这就是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因此，离开每个时期的斗争来探讨、研究毛泽东是怎样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恐怕很难说清楚。现在我不知道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写《毛泽东传》时，有没有考虑和理清楚这一点。就是在每一斗争阶段毛泽东读了哪些马列著作，对于他当时解决革命实际问题起的作用最大的是什么书，不知道能不能有这样的材料。

据我的初步印象，在五四运动以前，毛泽东自己讲，他也曾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向西方寻求真理。哲学上也好，社会学上也好，都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寻求救国之道。后来证明不行。只有到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传到了中国，他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才觉得真的有路了。这个

马列主义,最初的了解是很粗浅的。毛泽东不是读了很多的马列著作,在理论上有了充分武装了,然后才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间,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间。他在学到马列著作以前,已经参加了斗争。开始看到的马列原著,也不过是有限的几本。《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本。他学了以后,用马列主义基本的东西来解决斗争中的问题,结果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面貌为之一新。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确实与别的人不一样,他不把马列主义作为教条,而作为指南。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通过自己亲身的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大革命时期,这两篇著作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代表作,是他在斗争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两个最重要问题的代表作,从而也就在中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又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回答了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以后又写了《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作用,确实了不起。

全国解放以后,到中国来的外国共产党人,普遍地提出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工人阶级的党?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成分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很少,尽管你打了几十年的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党,更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用他们的经验,用他们的生活同我们类比。我一九八一年去意大利,见

到他们的总书记，他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看来你们中国共产党农民的成分对你们的影响太大，眼界太小。我就用我们党的《古田会议决议》回答了他。我说，把我们《古田会议决议》同我们军队的生活、党内的生活来比较和印证，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党的成分、军队的成分，虽然大多数是农民，但是，他们的政治水平、思想水平、组织纪律性和战斗性，比哪一个国家的工人成分占多数的党都要高得多。也就是说，我们党是用工人阶级的意识来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农民出身的成分的。一个党是什么样性质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它的党员，使他们具有什么样的素质和修养。在这一点上，也不能唯成分论。

从毛泽东开始，后来还有刘少奇，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少奇同志曾经当面同我们讲过，我们党的贡献就在这一点上。这是我们中国党的独特之点。外国党解决了政治路线以后，党员是个什么观念，是个什么意识，在他们的文件里、决定里看不到。中国共产党不仅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还解决党员的修养问题。也就是毛泽东讲的，不仅组织上入党，而且要思想上入党；刘少奇讲的，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这是党内生活中最根本的一条。这一条太重要了。现在有些外国党垮了，而且垮得很惨，原因很多，其中恐怕也有一条，不注意党员的教育、党员的意识修养，真正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意识在党内进行思想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把我们军队建成这么强有力的军队，把军队里的党建设成这么坚强的党，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所以

我们党才会经久不衰，几十年一直坚持下来。古田会议要求反对平均主义，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个人主义，批评要讲事实，不要搞流寇主义，宣传应该怎么做，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应该怎么建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有整个的一套。今天有发展，但基本的轮廓还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规范。

大体上在到延安之前，毛泽东肯定读了一些很重要的马列著作，但应该说读得不算多。戎马倥偬的岁月，不可能坐下来读很多的书。他的过人之处，他的成功之道，在于认为哪本书对斗争有用，他就反复读，精读，真正地读通、读懂，能得于心而应于手，不是读完了就完了。不是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读了四十多遍吗？有一些是到了延安以后的事。

到了陕北读书的条件好多了。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读书比以前多一点。这在他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里反映出来了。他较多地运用了马列著作和其他一些无产阶级军事学著作，来说明问题和进行对比，总结十几年革命战争的经验。有了这些基础，毛泽东进而更深入地钻研马列主义哲学，写出了《矛盾论》、《实践论》。这同米丁他们的哲学论文、哲学著作是另外一种面貌。抗日战争打了十个月，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它是军事论文，可是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古今中外军事论文里包含这么丰富的哲学思想的，恐怕到现在还是数第一，前无古人。它对未来估计得那么准确，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向几乎一步不

差地应验。

毛泽东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善于运用，善于表达，因为他置身于实际斗争之中。所以，我建议同志们，在某一方面，或者在某个问题上，具体地来研究、领会和表述毛泽东与别人不同的这种方法。他说的公式，就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应该很好解剖，很好发掘深层次的内容，要搞清楚在哪一个问题上，在哪一个方面，毛泽东是怎么样进行的，他取得的成就及其影响为后人留下了什么，今天我们还不能不向他学习的是什么？这就可能不至于只是一种公式。因为他解决的问题很多，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从各种问题、各个方面、各个学科，或者各个时期进行探讨，写成文章或书。这样可把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毛泽东作风的研究等等，搞得更有战斗性，更生动活泼。

与此相同，为了搞得更有战斗性，更生动活泼，希望同志们所撰写的各种辅导材料一定要密切注视当前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斗争情况。因为我们学习毛泽东及其著作，都是为了解决当前的斗争，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一句话，我们的斗争需要毛泽东思想。准确地说，就是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始终坚持这样一条马列主义的认识：在国际范围里，存在着尖锐的两种制度的斗争，存在着两大阶级的斗争。我们党、我们的国家坚持了毛泽东对世界的形势的正确

分析，诸如两种制度、两大阶级、三个世界等观点，在外交上独立自主，在国家关系中要有来有往，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必须是又联合又斗争，决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更不能投降。这是我们过去取得胜利的基本方针，也是现在和今后仍然需要坚持的。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帝国主义天天都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消灭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但是就有那么一些人，对帝国主义抱着那么大的幻想，一句好话便受宠若惊，惟恐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欢心。

在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队伍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出现了一种思潮、一种倾向，说话、做事以能够受到帝国主义的拍手为荣。做一件事，说一句话，帝国主义夸奖了，自己就以为身价十倍。在苏联，出了一批这么厚颜无耻的人。中国也有，但是终究这种人在我们这里是少数，不占优势，而且受到人民、受到党员的唾弃。许多人经过一九八九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受到了很大教育。年轻人出现“毛泽东热”，希望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希望读毛泽东的书，也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实践、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比较和体会所产生出来的欲望和激情。他们觉得毛泽东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是值得重视的，可以使他们不至于走错路，而能走正路；按照毛泽东的去做，帝国主义的狂妄企图就休想得逞。现在，好多事情都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眼光远大，判断准确。想当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一露形，毛泽东就在全世界范围里敲起警钟，说要提高警

惕，这个思潮可危险！戈尔巴乔夫六年变化，现在看，也不是他一个人造成的，他的祖宗就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纲领，基本上是继承了赫鲁晓夫的纲领，国际上就是赫鲁晓夫的“三无”、“三和”那一套；国内就是全民党、全民国家、没有阶级等赫鲁晓夫路线的因袭。还有一个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做得极其露骨。所以，毛泽东一看到二十大的报告就知道这件事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害，这个思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险性，对苏联的危险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性。逢先知同志写了一篇《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的文章，就是重新解释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观点的。经过历史的再一次检验，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新学习，值得我们重新认真对待。

我们党在这么大的风浪里能够站得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们对毛泽东的一生功过作出了正确评价，肯定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邓小平同志讲：“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sup>【2】</sup>我们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也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留下了很多值得我们叹止、值得我们学习的思想，例如：正确外理十大关系；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队伍；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我们



从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来的。

这里我想说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仅仅当成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观念的争论。其实，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是通过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指导制度。它已经不限于学理问题，是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现实政治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不是简单地从观念上、学理上说这几条原则他们反对，而是要把我们宪法所确立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思想指导制度根本推翻，改变我们国家的性质。这里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正如邓小平同志郑重指出的：“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然就要反对危害四项基本原则、危害国家社会根本制度的现象，包括党内的一些腐败现象。腐败问题现在确实值得重视，看了一些材料确实令人担心。这个问题不解决，群众很难满意，这一条也是年轻人对毛泽东产生尊敬、怀念的重要原因。他们希望我们用毛泽东那样的魄力和决心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不仅在国际上，也包括国内，包括党内外，现实的生活里问题不少，都需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来把这些问题一个个解决。因此，学习毛泽东著作，不只是一个纯学科的学习，是现实的需要、斗

争的需要。我们学得好，对我们整个的事业有好处。

同志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如果能够通过同志们的研究、撰写、出版来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干部，把毛泽东思想结合到我们的实际中，来解决我们当前和今后的问题，那末这就是人民所需要的，党所需要的，功莫大焉！

## 注 释

- 【1】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11页。
- 【2】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47页。
- 【3】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73页。

# 谈谈四项基本原则的 现实基础\*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日)

有一种观点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政治概念,不要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和言论。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值得探讨。

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政治概念,有的是由于受到形式主义宣传的影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言论,绝大部分是联系实际、言之有物的,效果也是好的。但个别的也有形式主义的毛病,讲着讲着,四项基本原则似乎就成了一个抽象概念,讲的人自觉不自觉地这么说,有些听的人自然而然就这么理解。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难道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政治概念吗?当然,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政治概念、是个理论原则,但不只是政治概念、理论原则。从本质上说,它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是我国

---

\* 这是邓力群同志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十八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都不是空洞的抽象,而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谈四项基本原则,一定要联系四项基本原则所反映的实际。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实在在的。它首先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和发展着。难道只是个政治概念吗?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形式并存的方针,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些也都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平等互助的,这也不是抽象的。我们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这也是实在的。除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劳动保险、医疗卫生这样一些制度也是实在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占主体地位,还有小生产者性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它们之间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都不是主观自生的意念。所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我们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现实这个基础上的。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制度现在还没有成为现实的地方,那里的人们讲不放弃社会主义信念,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在中国,我们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已不再仅仅

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已是普遍建立的社会现实。我们要坚持的正是这个现实的制度，我们要不断发展完善的也是这个现实的制度。

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实实在在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讲我们的国家制度，这是已经实现了的。当然，我们的政治制度还要继续完善。从中央一直到县、乡，到工厂、学校，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哪一项都是实实在在的。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最广泛最充分的民主权利。我国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外还有地方的、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权，有汉族地区的政权，有民族地区的政权，有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各级人民政府，有各级政府领导的部门，领导的工作，领导的事业；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当我们讲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时候，能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中国只有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治概念而没有这个现实吗？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公安干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和坚强柱石；有强大的边防、海防、空防；有人民的检察院、法院、监狱等司法执法机关和相应的制度。这些难道都只是脑子里的抽象的政治概念吗？

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是实实在在的。党的领导是毛主席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科学概括，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规律的反映。它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我们中国共产党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

心。一八四〇年以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人以前的任何仁人志士,无产阶级政党以外的任何政党,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屈辱地位,都不能使中国走上民富国强之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第一次站立起来,受到尊敬。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地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每一件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就党本身来说,党的领导里有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党的各级机构,有党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及其所领导的各个部门;有党的各级组织;有五千多万党员,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分布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在那里起先锋模范作用。我们在讲坚持党的领导的时候,能够说党的领导只是个政治概念吗?

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实实在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中国历史客观规律的反映。就说毛泽东思想,难道它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正确反映吗?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是中国革命无数次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用改良主义的世界观看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失败了,用孙中山的二元论

指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没有成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个真理，不了解中国的实际，不分析中国的情况，几乎葬送了革命。这些事实反映到理论上，才有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才有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的著作。还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理论、中国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等等，这些都是伟大而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史的科学再现。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反映，显然也是实实在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其本身的内容是客观的，而且作为我们在工作中遵循的思想原则，它的载体也是客观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各级党组织，各级党校，各级宣传部门，各级舆论机构，各级出版部门，各级思想政治工作部门，宣传品、出版物，难道这些都是抽象的政治概念？

正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我们才把它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序言庄严地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

原则是《宪法》总的指导思想，是我们革命成果的记录。它记录了中国人民经过几十年奋斗取得的革命成果，记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的革命成果，所以，它已经不只是政治概念。有些很天真的人，以为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政治概念，写不写进《宪法》无关紧要；港台一些人也主张在我们的《宪法》里取消四项基本原则。事情果真那么简单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苏联的教训吧。当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有人主张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戈尔巴乔夫也说去掉这几个字没什么关系，去掉以后，共产党还进行工作，还继续奋斗，还可以争取实现党的领导。结果怎么样呢？一去掉《宪法》第六条，反对派、反共分子、帝国主义就打开了缺口，共产党被冲垮了，苏联被冲散了。

四项基本原则是实实在在的，而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发展的，而且也应该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在发展，党的领导在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常说，改革是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的内在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四项基本原则的发展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现实的和具体的，而不只是抽象观念。和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和部门以至不同的具体工作相结合，四项基本原则在发展的时候有其特殊性。所以，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这几十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但在实现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中间，各地有各地的特色，各地有各地



的贡献，各地有各地独有的实践。换句话说，四项基本原则的现实存在状态和现实发展状态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

总之，邓小平同志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决不仅仅是思想观念、政治概念的对立。如果只是思想观念、政治概念的对立，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包括同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在于，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我们革命的成果，反映了我们的现实制度，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就放弃了我们革命的成果，就放弃了我们的现实制度。这决不是概念游戏。有人说四项基本原则只是个政治概念，是人们的口头禅，少说为佳，而我们则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的现实，是我们的行动和生活。四项基本原则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能够不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吗？革命成果和现实制度必须维护，正确反映这种客观现实的理论原则必须坚持。